

# 倪柝聲傳(CFZ)

## 目錄：

編者的話	1
第一章 義人的後裔	3
第二章 母子先後蒙恩得救	9
第三章 福州大復興	13
第四章 環球復興禱告運動	19
第五章 受到弟兄會的影響	25
第六章 經歷神的醫治大能	37
第七章 娶了賢慧的妻子	45
第八章 獲得閩南一帶同工的支持	52
第九章 認識了史百克	56
第十章 職事的恢復	63
第十一章 中國的耶路撒冷	79
第十二章 在鼓嶺所見所聞	89
第十三章 在香港的部署	94
第十四章 遭到了挫折	106
第十五章 深入研究傳記人物	117
第十六章 隱秘的事知多少	126
第十七章 是一樁冤假錯案	139
第十八章 姊妹們的見證	157
第十九章 全球各地宣教士的見證	179
第二十章 末後的日子	206

## 編者的話

當我編寫了一系列的《屬靈偉人小傳》之後，本來有意撰寫《倪柝聲小傳》，誰料到手頭上積累的資料十分豐富，無從濃縮，遠超一本小傳所能容納，遂決定以正式傳記的方式付梓。

這些年來，倪柝聲弟兄在全球各地的教會中，越來越贏得眾多聖徒的尊敬，國際上許多權威的傳記作家更把倪柝聲譽為教會歷史上罕有的屬靈偉人。

在道格拉斯(J.D. Douglas)所著的《二十世紀的基督徒傳記辭典》(Twentieth-Century Dictionary of Christian

Biography) 中，倪柝聲 (Watchman Nee) 榜上有名；漢克斯 (Geoffrey Hanks) 這位舉世聞名的歷史學家，在其著作的《七十位基督教偉人》(70 Great Christians) 裡，也把倪柝聲的名字列入教會二千年來精選的傑出人物之中，將倪柝聲與馬丁路德、奧古斯丁、本仁約翰、司布真等聖人的名字並列。倪柝聲是唯一的華裔，享有如此殊榮。

至於內地會的賴恩融 (Leslie Lyall) 在其所著的《中國教會三巨人》(Three of China's Mighty Men) 一書中，更肯定了倪柝聲、王明道、楊紹唐三位弟兄曾對中國的教會作出極大的貢獻。

倪柝聲本人的著作，有不少已被譯成多種文字；其名著《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人的破碎與靈的出來》、《屬靈的權柄》、《聖潔無瑕疵》，都已售出數百萬冊，並都被許多地區列為屬靈經典著作。倪柝聲在文字工作上的成就，罕有人可以望其項背；他實在留給舉世的信徒一份極其豐厚的和珍貴的屬靈遺產。

在威廉·彼得遜 (William J. Petersen) 所發表的《改變世紀的一百本書》(100 Christian Books That Changed the Century)，威廉·彼得遜在補遺中，鄭重向讀者們致歉意，表示該書受到篇幅所限，只能列出一百本書，以致未能把倪柝聲弟兄所著的《正常基督徒生活》(The Normal Christian Life) 包括在內，但卻列在二十本可商榷的書目中。

這些年來，我一直受到弟兄們的壓力，要我編寫《倪柝聲傳》，本人考慮到先父 (陳則信) 已著有《倪柝聲弟兄簡史》，身為兒子的我，不敢掠美。另一方面，出版《倪柝聲傳》，勢必披露我的部分隱私。但為了使一些寶貴的史料不致從此湮沒，我只好在倉促中，草草寫成這本《倪柝聲傳》，並且應允讀者，日後必會善加修繕、增訂、補充。

在目前，由於時間倉促，許多不可多得的資料，一時無法盡錄，唯有暫且割愛，請讀者們原諒。

## 第一章 義人的後裔

正如箴言十一章二十一節所說的，「義人的後裔必得拯救。」

倪柝聲弟兄確實是義人的後裔。倪柝聲的祖父倪玉成，一八五三年就讀於美國公理會差會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The Congregational Church) 開辦的一所西式學堂，他在校時聽了福音而信主，四年之後在閩江受浸。

倪玉成蒙恩之後，非常熱心，在福州城內不停地傳福音，宣教士於是悉心栽培他，使他成為十九世紀中葉美國公理會在福州最初按立的一位華人牧師。當年因為在閩北各大公會的華人中，只有倪玉成一人被按立為牧師，其它大公會在主持聖禮時，時常把倪玉成輪流借用。倪玉成有解經的恩賜，在當時被譽為閩北三大佈道家之一。

一八七七年，倪玉成牧師誕下兒子倪文修。倪文修在家中排行第四，是第二代的基督徒。倪文修十三歲喪父，他發奮讀書，就讀於福州的美以美會書院，後來又接受傳統的儒家教育。清朝政府在福州設有全省性的科舉考試，以選拔人才，每三年有一次初試，每五年有一次複試。倪文修複試成功，獲得公職，並被調往廣東汕頭海關任職。

一八九九年十月，倪文修經過母親撮合，娶了林和平為妻。林和平從小就非常精明和聰慧，並具備領袖的才能。至於她的丈夫倪文修，則莊重含蓄，溫文爾雅，一派君子風度。倪柝聲從小就深受父母的

薰陶，兼得母親和父親的優點；不過，若要認真作一比較，則母親對他的影響，猶超過父親倪文修。林和平比倪文修小三歲，生於一八八〇年，生父是一個貧民，因家境困苦，且有重男輕女的偏見，把女兒送給一位林氏商人的側室為螟蛉女。林和平的養父在福州南台富商張鶴齡經營的福利洋行任職。當林和平六歲時，養父林氏得著怪病，張鶴齡請來一位美以美會牧師為林氏禱告，禱告後怪病忽然痊癒。病癒後林氏受洗加入美以美會。林和平則隨養母在聖公會受洗。林和平在自傳《恩愛標本》中如此感恩：

「神啊！此中真看見你的作為，我不能不感謝你和讚美你！正如經上所說的，我要憐憫誰，就憐憫誰，要恩待誰，就恩待誰。（羅九章十五節）你把我從母腹裡分別出來，又施恩作我的神，我向你敬拜！」林和平十一歲時，被養父送到福州美以美會所辦的毓英女塾去讀書。由於毓英女塾是教會學校，林和平有機會讀到聖經。有一次華雅各牧師來毓英女塾領會，林和平聽時受感動認罪，只是當時無人跟進，以致林和平對救恩仍未完全清楚。

林和平在十六歲時，有意到美國學醫，為此她向父親提出，先到上海習讀英文。十七歲時她終於告別福州，到上海中西女塾讀書。

林和平在中西女塾讀了兩年，到了她十八歲時，她母親恐怕她一旦到美國學醫，留在彼邦不再回國，立意為她辦婚事。其時，倪玉成師母正托人為兒子倪文修找物件，與林和平的母親一說即合。林和平雖心裡不情願，但在父母作主下，只好從上海折返福州成婚。婚後兩星期，林和平就隨夫前往汕頭，其時倪文修在汕頭海關作事。一九〇〇年，倪林和平生下長女閩臣，一九〇一年又生下次女閩貞。連生兩女之後，倪林和平的家婆倪玉成師母就嘀咕了，說媳婦只會生女孩子。倪林和平聽了婆婆的閒言閒語，心裡不舒服。家婆這種重男輕女的傳統陋習，使她精神上承受了重大的壓力。

當倪林和平第三度懷孕的時候，心裡實在害怕，她唯恐又如婆婆所說的只會生女孩子，再度應驗。

以下是倪林和平述說當年的經過：

「當我無路可走，有冤無處伸時，也會想到神是無所不能的，我要起來求告祂。在模糊中也會記得哈拿的故事。於是我就把我的心願傾吐於聽人禱告的神面前。我心裡也相信祂一定答應了我的禱告，接受了我的奉獻。到了產期，一九〇二年十一月四日果然生了一個男孩子。我的丈夫頭一個看見是男孩子，他立刻跑到我的耳邊說：『真的是男孩子，感謝神』。我聽了心裡欣喜，謝謝神聽了我的禱告，為我除去羞恥。心中覺得有說不出的喜樂。」

一代偉人倪柝聲就這樣誕生於廣東省汕頭市。剛生下來時，他的父母給他起名述祖，別名倣夫，英文名字是 Henry Nee（倪亨利）。後來他自己取名柝聲，意為報更者在深夜時所敲的梆柝的聲音，英文則取「守望者」（Watchman）為名。

由於倪柝聲的誕生是他母親效法哈拿向神許願，蒙神應允得來的，他一誕生就被神分別為聖，確定他長大後要獻身事奉神。讓我們重溫哈拿的許願，記載於撒母耳記上一章十一節：「萬軍之耶和華啊，你若垂顧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賜我一個兒子，我必使他終身歸與耶和華。」

接著我們再讀哈拿在生下孩子後怎樣莊重地宣讀誓言：「主啊！我敢在你面前起誓，從前在你這裡站著祈求耶和華的那婦人，就是我。我祈求為要得這孩子，耶和華已將我所求的賜給我了。所以我將這孩子歸與耶和華，使他終身歸與耶和華。」

倪林和平既把倪柝聲歸與神，神就應允她的許願和誓言，在倪柝聲的一生中，神不斷地裝備他，帶領他，鍛煉他，倪柝聲終於成為神使用的貴重器皿。

倪柝聲五歲時，因著父親調職蘇州海關，在蘇州住了一年。一年後，倪父向稅務司請假回福州照料家中老少，倪柝聲於是隨著父母回到福州。

在福州時，倪柝聲的父親倪文修請了一位舉人來教孩子們讀書，學習範圍包括書法、中國傳統文化的四書五經、詩詞歌賦等。

一九一二年，民國政府成立，孫中山在南京被選為第一任總統，宣導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為中國政制的指導思想。始自一九一一年革命軍起事，倪林和平即在福建省推動愛國運動。倪林和平在自傳《恩愛標本》中供稱：

「我極力幫助愛國運動。那時烈火炎炎，我不顧性命，到處演說。自己先把手飾、金手環奉獻國家，以身作則，自然也有許多男女跟隨。福建省政府以我成績可嘉，愛國可風，孫道仁都督特為請獎北京政府。結果蒙允給我二等勳章。此時我又通函各界婦女組織婦女愛國會。孫道仁都督夫人為會長，潘壽松夫人為副會長，我自己被舉為總幹事。」

倪林和平在社交上的成功，掩飾不了她此時在信仰上的迷惘和失落，她供述：「此時我多與不信的人接觸，不期然而從有名無實的基督徒，落到一個無信仰的地步中：愛名譽、地位、勢利、服裝……等。實在說起來，簡直是個浪子，已到了吃豆莢的光景中，還在那裡自高自大，目中無人，真是又愚昧又可憐！此時顛倒在竹林及電影院中，三朋四友，應酬無暇。」

孫中山到福建訪問時，省政府請倪林和平任特別招待員。而伴隨孫中山訪問的女秘書宋慶齡，正好是倪林和平在上海中西女塾讀書時的校友，兩位中國的傑出女性重逢，倍感親切。

倪林和平周旋於權貴之中，忘卻了父神。倪柝聲，目睹母親世俗化，貪愛虛榮，也因之目濡耳染，漸漸無心向主，當時也沒有人向他傳福音。

一九一六年，倪柝聲進入福州的三一書院（Trinity College）初中部讀書。該書院設有小學、初中、高中、師範及神學院等五個部門，是英國聖公會的差會（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主辦的，程度很高，雖無大學部，但高中畢業生若有意讀大學，書院可保送畢業生到上海聖公會開辦的聖約翰大學。

三一書院的教職員，大多來自愛爾蘭都柏林大學的福建差會（Dublin University Fukien Mission），故教職員富有濃厚的西方文化傳統，倪柝聲既受惠於西方開放的文化思想，又吸收革命時期的新文化思想，促使他文思敏捷，思路開拓。他生來聰明敏悟，在班內成績居於第一，只是他對聖經興趣索然，要靠作弊來及格。後來神憐憫他，使他成為中國最熟讀聖經的神僕之一，並被譽為中國最精深博大的查經家。

## 第二章母子先後蒙恩得救

餘慈度，一八七三年生於杭州。她父親原是一位軍醫，他在信主後獻身作傳道，後來被長老會按立為牧師。餘慈度一八八八年到蘇州的博習高等醫學堂讀醫科，一八八九年學成後，家裡再送她到英國深造，以便在醫學上有更高的造詣。當輪船停在法國的馬賽港時，她因著聖靈的感動和主愛的激勵，答

應了主的呼召，決定放棄前程，回國傳福音。余慈度通知船長她將離船，自行折返中國時，船長大為震怒，以為余慈度精神失常；但余慈度堅持到底，卒之她在馬賽換船回到中國。回國後，她踏著父親的腳印，委身傳道工作，不久她有差傳的負擔，動身往高麗的漢城作差傳工作。

倪林和平，在《恩愛標本》中，從前我在上海時曾經遇見她，且是非常佩服的；因她這是為主捨棄醫生的職業、名利，不受薪水，不作雇工，只專心傳道，靠主供給。在上海時，我見過她後，當時非常敬愛她，立即把母親的戒指轉送給她。起初她不肯收，說，你年輕，和我初次見面即給我戒指，日後母親知道了，懊悔也來不及；還是你留著吧！我聽了這些，真知道她是不愛財物只愛主的人，就流下淚來，一定要她收下，並且說：就是母親罵我打我也甘心。余慈度聽了我的話，就向我微微一笑說，既是如此，我只得收下，願神祝福你。事後，她就往高麗傳道去了。」

一九〇三年十月，余慈度從高麗回國，到處帶領奮興佈道會。一九一四年，余慈度開始重視禱告，認為教會要復興，工作要有果效，要實行代禱，每一個信徒要有負擔禱告。

一九二〇年二月中旬，余慈度來福州開復興大會。倪林和平與余慈度睽違二十二年，忽然聽到余慈度來福州領會，感觸萬分。她說，此中光景，只有過來人才知道。倪林和平在《恩愛標本》言及當時心中的感受：「若說歡喜她來，一想到自己對神的情形，實在不堪設想，連外面基督徒的殼子都沒有了。她是正直無私的，一定給我一個大釘子，那麼怎麼辦呢？若說不喜歡她來，她在基督徒中間又是我頂佩服的，這一種又喜又慚的情形，真是筆墨不能形容。」

倪林和平此時已經四十歲，在聽了余慈度幾次講道之後，聖靈在她裡面作工，使她心裡受感動。有一天，余慈度講到神的愛和主耶穌如何在十字架上親自替我們死，擔當我們罪的刑罰，使我們因祂的死不至滅亡。又說主耶穌為了愛世人，在十字架上如何受苦，如何受羞辱，甘心捨己來作人類的救主。倪林和平聽到這裡，正如她所見證的，她頑梗的心，不知不覺被這位可愛的主所融化了。她痛哭一頓，認罪悔改，並接受主耶穌作她個人的救主。倪林和平信主之後，她首先向丈夫認罪，承認已往所有虧欠丈夫的地方。接著神又光照她，要她去向她曾冤枉並責打過的兒子倪柝聲認罪。事關有一次家中一個貴重的花瓶被打破了，沒有一個孩子敢承認，因為一承認免不了要挨打。倪林和平就認定一定是家中最調皮的兒子倪柝聲所作的，就把倪柝聲打了一頓。之後她發現那個花瓶是另一個孩子打破的，但她礙于母親的面子和尊嚴，始終沒有向倪柝聲認罪。如今她得救了，這件事卻沒有對付，使她心裡一直不平安。

倪林和平述及這件事的經過：

「神也光照我應當向大兒子認罪，但我總不肯。有一天，我拿三塊錢去買詩歌和新約全書，要作家庭禮拜。我才把詩歌揀了一首，要彈唱的時候，主的靈有權柄在我心裡，不許我彈琴，要我先向我的大兒子認罪，方許唱詩敬拜祂。我就說：『神啊！我是母親，怎麼可以向兒子認罪呢？從今而後我在家庭中怎麼能過日子呢？』神頂清楚地說：『非認罪不可！』那時，我只得向神屈服。我的丈夫和兒子見我要彈琴又不彈，只見我兩眼流淚涔涔，不知為著何事。但是我轉過身來，抱住我的大兒子柝聲，誠懇懇地對他說：『我為主的緣故，向你認那一次冤打你，是得罪你，求你赦免我。』大家都稀奇我這樣作，但是大兒子對我說：『你那一次無故的打我，我的心真是恨你。』我說：『求你赦免我。』他就不開口了。正是那一夜，神也抓住了柝聲。第二天，他就告訴我說，他也願意去聽道，且願將心身奉獻

給神，作傳道的工作。」

那一天，即一九二〇年二月二十九日晚上，倪柝聲在福州天安堂聽餘慈度講道之後，回到家中，獨自在房間裡，心裡爭戰，跪下來禱告時，起初沒有話可禱告，但過些時候，他看見自己滿身污穢，知道自己是個罪人。他同時看見，只有主耶穌能把他拯救，只有主耶穌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寶血能把他潔淨。他仿佛看見主耶穌在十字架上，伸出祂被釘的雙手，在歡迎他，並對他說，我在這裡等候著接受你！這樣，主的愛終於折服了他。

讓我們聽一下倪柝聲自己的見證：

「以前我譏笑人家接受耶穌為救主，但那個晚上，我親身經歷了祂釘死流血的愛。我流淚認罪，求主赦免，接受了主耶穌作我個人的救主。許多人信主，是到蒙拯救脫離罪為止。然而對於我，問題是我還必須答應主，作祂的僕人事奉祂。我明明知道，這個代價太大，所以心裡起了掙扎。但主當晚不放過我，祂的愛折服了我，掙扎終於平息，我願意因著主這樣的大愛，一生跟從祂，一生事奉祂。我從得救那一晚開始，就知道我的得救必須是雙重的，一面接受基督作我的救主，一面要以祂為主，終身事奉祂。

「禱告以後，我嘗到了我從來沒有嘗過的喜樂和平安。當時，房間裡好像充滿了光。我就對主說，主啊！你實在恩待了我！」

### 第三章福州大復興

倪柝聲弟兄重生得救之後，也像他的母親倪林和平一樣，為自己的罪深深地憂傷痛哭，同時也很認真地對付已往所犯下的罪。倪柝聲不僅向校長承認已往考「聖經課程」時作過弊，並且在實際的行動上，勤奮讀聖經。他每個月至少讀一遍新約，或按次序每天定規讀十幾章聖經。過去，他在許多科目上都名列前茅，唯獨厭惡聖經，不喜歡讀「聖經課程」，如今他在學校突然如此改變，證明他有了新生命和新性情。學校的校長目睹他的改變，沒有為他曾經作弊的事而開除他。神從此賜給他講解聖經的恩賜，日後成為舉世聞名的查經家。

我的父親（陳則信）在所著的《倪柝聲弟兄簡史》中，這樣敘述：「沒有多久，倪柝聲就把新舊約讀了好幾遍。由於他的記憶力很強，理解力又非常豐富，所以他對聖經的事實記得很熟，對真理的認識也增加不少。倪柝聲作見證說，在他們傳福音之後，許多人蒙恩得救，大家都起來讀聖經。本來我們中國人一見面就問吃飯了沒有？但那個時候他們見面都不再問吃飯了沒有，而改問吃神的話了沒有？你問我，我問他，借此互相鼓勵，他們吃飯之前，總要先讀聖經。」

在倪柝聲得救的第一年，在倪家每星期二下午二時有查經聚會，請許則昭牧師帶領。許則昭查經時這樣說：什麼都要按照聖經而行。

一九二一年二月，有一天倪柝聲讀聖經，讀到主耶穌受浸時，祂來到約但河，說祂從水裡上來。幾天後，三月二十七日早晨，倪伯母——倪林和平，也因早前讀到聖經裡受浸的真理，與倪柝聲和次子倪懷祖到和受恩教士那裡（Miss Margaret Barher），母子三人同時在閩江的白牙潭河邊受浸。

三一書院因內戰干擾，暫時停課，倪柝聲就乘機隻身前往上海，進了餘慈度在上海江灣主辦的查經祈

禱處（Bible Study and Prayer House）學習事奉。此時他尚不能適應聖經學校的紀律生活，正如他所說，他貪吃美食、愛穿新衣、早晨貪睡起不了床。有一次餘慈度差派倪柝聲到上海市區去投寄信件，由於路途遙遠，交通阻塞，倪柝聲耽擱了時間回來，餘慈度誤會了他，客氣地請倪柝聲再回福州，到已複課的三一書院繼續讀書。倪柝聲述及此事時，完全沒有埋怨餘慈度，只怪自己平時給餘慈度印象不好，才導致這次的誤解。倪柝聲這樣坦承：

「這件事使我事奉主的心願，受了一次嚴重的打擊，我才知道我生命雖有重大的改變，我的生活卻不夠實際，不夠接受約束，我的天性似有許多地方需要改正。我既然要事奉神，就要作充分的準備，在各方面受到裝備。」

倪柝聲向餘慈度告別時，餘慈度的一句話抓住了倪柝聲：余慈度提起長者和受恩教士，說她比餘慈度本人，更適合帶領倪柝聲。

倪柝聲重返三一書院後，很熱心引領同學們歸向基督，他把同學們的姓名逐一寫在一張紙上，每天為他們禱告，一有機會就向同學傳講福音。主也真垂聽他的禱告，在列出的七十名同學中，除了一人之外，其餘的六十九名，都先後蒙恩得救。

一九二二年上半年，倪柝聲查考聖經時，注意到一點，即信徒該聚集擘餅，該常常紀念主。而當地的教堂，一年只有四次擘餅；並且來擘餅的人，水準十分參差，甚至未清楚得救的也有。倪柝聲就去找王載弟兄，對王弟兄說：聖經說，要擘餅紀念主，但是我得救以後，一次都沒有擘餅。我又注意到在教堂裡使我覺得有點為難。王載就拉著倪柝聲的手說，神所引導的，正是一樣，我昨夜整夜未眠，一直祈禱應否遵照聖經的原則和榜樣，即每逢七日的第一日，門徒都應該擘餅紀念主。到了主日，倪柝聲就到王載家裡，和王弟兄夫婦三人同擘餅，一同紀念主。倪柝聲這樣形容那次的擘餅聚會：

「實在太喜樂了，我告訴你們，天離地實在太近了！天近到一個地步，好像親手能摸得到一樣，我們三人都不禁流淚了！這一次我才知道擘餅紀念主有什麼意義。這一次，我才知道紀念主，是神所寶貴的。我們第一次才學習什麼叫敬拜，什麼叫紀念主。我們沒有別的話可說，我們只有讚美，只有感恩！從那天起，每逢主日，除非我病了，或者出門在路上，或者有意外阻擋，我總是擘餅。」

這幾個月，倪柝聲的母親也和他們一同擘餅了。

一九二三年一月，倪柝聲、王載弟兄等接著開始在王連俊弟兄家的亭子裡舉行傳福音聚會。弟兄們穿上福音背心，前面寫的是「你要死」，後面寫的是「信耶穌得救」，或其它傳福音的句子。倪柝聲在《往事的述說》一文中，對當時福州倉前山的復興實況，作了詳盡的敘述：

「我們手裡拿著旗子，口裡唱著詩，這樣遊行各處，看見的人真稀奇。就是這樣把許多人帶到聚會的地方來了。天天都是這樣遊行，天天都有人來聽福音。在亭子的外面，在廚房裡，在客堂裡，都坐滿了人。這樣每天三次聚會，都是各人自己帶凳子。每天下午，整個福州倉前山，只見人在搬凳子。年老的也有，男學生也有，女學生也有。員警見了，都有點稀奇。感謝主，祂特別的祝福，有幾百人得了救。這一次，把救恩的根基，打得很堅實。本來，在中國，許多信徒對救恩不大清楚。借著那次的傳福音聚會，許多人清楚了救恩。」

倪柝聲又述及那次的復興，並不局限于王連俊住宅的亭子裡的聚會，也影響到三一書院：「我從來沒有

見過比那次更大的復興。天天有人得救，好像無論什麼人，一碰到我們就得救。當時，我在福州三一書院讀書。每天早上五點鐘到學校，就看見無論在哪裡，都有人讀聖經，這樣的人有一百多個。本來在校中看小說是很時髦的，現在只好偷著看，而讀聖經，倒成為一件普通的和體面的事。我們的學校一共有八班，每班有正副班長各一人。稀奇的是，差不多每班的班長都得救了。連所有出名的運動員也得救了。每天總有六十多人拿旗子遊行，另有幾十人出去派單張。福州有十幾萬人，全城都被這些青年人震動了，我們按著當時聖靈的引導，開始聚會。後來得救的人數越過越多，工作便擴展到附近的鄉村」。

這時與倪柝聲一起聚會的青年人，包括王載、吳澹吾、王畏三、王連俊、王峙、繆紹訓、陸忠信等。幾個弟兄們覺得，王連俊家的亭子，不夠容納日益增多的會眾，就一起禱告商量，希望租一個聚會的地方。不久和受恩教士轉交一筆二十七元，是一位信徒奉獻弟兄們作為租會所之用。弟兄就以這筆款，在福州倉前山的十二間排，正式租了一間房作為聚會之用。

王載畢業于煙臺海軍學校，是海軍軍官。王載的妻子潘少容，婚前在女宣教士安汝慈（Ruth Paxon）的佈道會中信主。結婚後，潘少容帶領王載信主得救。王載信主後，接受主的呼召，毅然放棄在海軍的職位，憑信心回福州作宣教工作。

十二間排的聚會有七位同工，每禮拜五有一次同工聚會。同工們都很年輕，肉體沒有受到對付，聚會時倪柝聲和王載經常有爭辯。當時倪柝聲和王載出來事奉不久，都很主觀和自負，都還沒有受到磨練，個性都很強。同工聚會時，倪柝聲和王載一爭辯，其他五位同工只好坐在那裡聽他們爭辯。同工聚會的次天，即星期六，倪柝聲循例去看長者和受恩教士。倪柝聲向和受恩申訴了王載許多不是之處，希望和受恩訓斥王載。意想不到的，和受恩總是對倪柝聲說：「他比你大五歲，你要聽他；彼得前書五章五節說，你們年幼的，也要順服年長的。」倪柝聲承認和受恩是屬靈方面的長輩，使倪柝聲不得不勉強地接受，但再次面對著王載時，兩人間又再爆發了爭吵。爭吵局面持續了一年半，令神的工作受到虧損。王載當時的負擔是佈道；倪柝聲所要建立的是各處的聚會點。用倪柝聲的話，王載是挑擔子賣貨，倪柝聲是擺攤子賣貨。

這裡看到，儘管人的失敗和軟弱，使神的工作受到虧損；但是聖靈卻超越了人的失敗和軟弱，沒有停止作工，聖靈始終一直帶領神的兒女往前去。

#### 第四章環球復興禱告運動

在我所編著的《宋尚節小傳》第十二章，已經述及環球復興禱告運動對中國各地教會的影響，同時也述及神如何垂聽世界各地信徒為中國的禱告，在中國興起了許多神大用的器皿，他們包括宋尚節、王載、王明道、倪柝聲等。

故此在本書，再一次談及環球復興禱告運動。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在上海的美南長老會牧師林亨理博士（Dr. Henry M. Woods）的師母在參加一個晚上聚會時，聽到講員講到路加福音十六章，財主如何拒絕神的恩典，死了之後，如何可憐，渴望拉撒路用指頭尖蘸點水，涼涼財主的舌頭，因為財主在火焰裡，極其痛苦。林師母聽到這裡，心中大為震撼，



感受到拯救靈魂的迫切性。林師母回家後，整個星期輾轉難眠，吃不知味，林師母記起歌羅西書一章二十四節的話：「現在我為你們受苦，倒覺歡樂，並且為基督的身體，就是為教會，要在我肉身上補滿基督患難的缺欠。」

林亨利夫婦於是受到聖靈的催促，發信給在上海的二十多位同工，邀請他們於一九二四年元旦，到上海虹口狄思威路七百十五號的林宅，一起為全球性的復興禱告。除了少數人，接到信的大多數人，都推辭不來，說該日早有約會，希望林氏夫婦更換日期。但是林氏夫婦確定這是神所定規的日子，誰與神站在一起，誰就是大多數，神的應許絕不落空。因為主說，無論在哪裡，有兩三個人奉我的名聚會，那裡就有我在他們中間。(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節)

到了一九二四年元旦，每一個原先想改期的人，都改變了主意。到了指定的聚會時間，每一個被邀請的教牧同工，都到林亨利夫婦家裡，參加這次意義重大的禱告聚會。

參加聚會的，有餘慈度小姐、美北長老會的路崇德牧師 (Walter Lowrie)、美南浸信會的萬應遠牧師 (Robert Thomas Bryan) 及其夫人、美南長老會吳板橋牧師 (Samuel Woodbridge) 及其夫人，宣道會的伍思蘭小姐 (Ethel Woodberry) 和伍美蘭小姐 (Ora Woodberry)，伯特利教會的胡遵理小姐 (Jennie Hughes)、安汝慈小姐 (Ruth Paxon)、戴衛斯小姐 (Edith Davis)、內地會的巴拉師母 (Mrs. Ballard) 和梯碧小姐 (Miss. Tippet)，以及途經上海即將前往北京到馮玉祥部隊那裡佈道的戴衛斯牧師 (Rev. George Davis)。

當晚，在夜幕低垂時，當每人禱告完，從膝蓋上站起來時，每個人都感覺到聖靈在他們中間。這一天，環球復興禱告運動正式開始。

緊接著的日子，世界各地的信徒，包括美國、英國、印度，以及其它地方的信徒，紛紛加入了這個環球復興禱告運動。

福州十二間排的聚會，以及福州的復興，也成為代禱的項目之一。王載曾從十二間排寫一封信給林亨利師母，信末引述加拉太書二章二十節，並希望林安德夫人寄下數份《神為什麼使用慕迪》給福州十二間排的弟兄們。王載在信中又述及林師母透過石美玉醫生，曾奉獻二十美元給王載作路費，奉獻四十元給十二間排的聚會，作購置詩歌集之用。茲照錄英文原信如下：

Dear Mrs. Woods:

Praise God for His faithfulness. Thank you for your kind letter and the enclosed \$50-which reached me this morning, Dr. Mary Stone gave me your gift of \$ 20.-toward my traveling expenses and also \$ 40.-for the hymn books. I want to express my hearty thanks. I am still weak. God is my strength. I hope to hear from you again. Thanking you for the books you so kindly sent to me. Can you spare some copies of Why God Used D. L. Moody for my brothers in Foochow?

yours in His Love

Leland Wang (Gal. 2 : 20)

奇怪的是，細讀倪柝聲所作的見證，以及審閱倪的《往事的述說》，他竟從未提及環球復興禱告運動領導人林亨利師母，遑論述及她曾對十二間排聚會所需的詩歌集的奉獻。

一九二四，許多環球復興禱告運動的教牧同工，包括該內地會總監何斯德 (Dixon E. Horst) 和中國長老

會路崇德，分別回到原來的教堂或機構：只有伍爾牧師 (Rev. Earl Wookberry) 和其師母 (Ada Woodberry) 留在上海，推動整個運動，伍爾牧師是伍恩蘭姊妹的兄弟，是伍約翰 (John) 牧師的公子。

禱告運動一開始，余慈度小姐、安汝慈小姐、石美玉醫生等，就向林亨理伉儷提出，把當時中國最大的復興——倪柝聲和王載帶領的福州大復興，納入環球復興禱告運動的歷史軌跡。她們注意到，倪柝聲母子是余慈度小姐帶領得救的，而王載師母是安汝慈小姐帶領信主的，即王載間接地也是安汝慈的福音果子。

既然福州聚會一開始擘餅的三位信徒——倪柝聲和王載夫婦，都是余慈度和安汝慈所結的福音果子；如今余慈度、安汝慈都加入環球復興禱告運動，她們有意把十二間排的聚會，即當日中國最大的復興運動——福州大復興，納入環球復興禱告運動的軌跡，也是可以理解的。

而王載，除了與這個運動的主持人林亨理夫婦有直接聯繫外，又與這個復興禱告運動的伍家姊妹——上海宣道會守真堂的伍恩蘭和伍美蘭，常常討論福州十二間排聚會的路向問題。伍氏姊妹的父親伍約翰牧師 (Rev. John Woodberry) 是宣道會的資深牧師，任宣道會上海議會委辦長；伍約翰建議十二間排的聚會，建立教牧按立制度。

王載就把按立牧師的想法，正式向倪柝聲提出來，說伍約翰牧師若到福州，會先按立倪柝聲為牧師，按立王載為傳道，和按立王連俊為教師。

倪柝聲聽了，說他需要一兩星期讀聖經，才能答覆這問題。倪柝聲查考聖經時，讀到以弗所書四章十一節，「祂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教師。」倪柝聲於是說，牧師乃是基督給教會的恩賜，不是由人按立的。

有一個主日，倪柝聲講了一篇關於約櫃的信息，說神的見證是跟著約櫃的，約櫃實際上所預表的是基督。約櫃是神的子民敬拜的中心，約櫃在會幕裡的時候，神的榮耀也在那裡。倪柝聲並說，約櫃離開會幕時，會幕就空泛泛，失去了屬靈的實際，神的眼目也離開會幕，跟著約櫃而去。倪柝聲總結說，今天聚會的原則也是如此，不在於外面的會幕，即形式的基督教；神要看的，是那裡有沒有基督的見證，也即是約櫃所預表的，他強調應該跟隨的是約櫃，不是會幕。

倪柝聲反對按立制度，即是說，王載在短期間內，無望按立為牧師，王載因此就對倪柝聲很反感。很自然地，兩人不能同心。王載和環球復興禱告運動的關係，更加拉近；他跟倪柝聲的關係，則逐漸疏遠。

後來倪柝聲又寫信給同工們，說明他反對按立制度的原因，他又手印油墨複本，派發給每一位弟兄姊妹。沒有多久，倪柝聲被人邀請到杭州傳福音，福州的同工們就乘他不在時，因著倪柝聲所派發的信件，把他革除了。不少弟兄姊妹，站在倪柝聲一邊，反對王載等同工們所作的，此時十二間排的教會面臨分裂，弟兄姊妹們與同工們意見分歧，有些弟兄姊妹們打電報和寫信到杭州，告訴倪柝聲他被革除的事；然而同工們仍不讓步，堅決拒絕倪柝聲，尤其是帶領聚會的丁素心姊妹，她反對蒙頭，對倪柝聲成見很深。

當倪柝聲乘船回福州時，他原本打算回去表白，但是聖靈在他裡面作工，要他靜默，不許他自己表白。一九二四年七月，當倪柝聲到達福州時，許多弟兄姊妹到碼頭迎接他，說其它同工如何對他不公平，倪柝聲的血氣稍為激動，主就在裡面制止他。弟兄姊妹們等著他表明自己的態度；他答說，主不許可

他為自己表白，他叫弟兄姊妹們安靜。倪柝聲的態度令弟兄們非常失望，第二天，倪柝聲離開福州，往外地去，避開那個局面。哦！神的道路高過人的道路，神的意念高過人的意念。倪柝聲雖然沒有介入環球復興禱告運動，神卻保守他，使用他，他雖然和環球復興禱告運動保持距離，卻不知不覺地也因這禱告運動而蒙福。

一九二五年六月，環球復興禱告運動在上海蘇州路的新天安堂（Union Church），有十天的復興聚會，講員是日本福音團（Japan Evangelical Band）的總幹事魏克斯牧師（A .Paget Wikes），擔任翻譯的則是來自福州十二間排聚會處的王載。主持這次復興聚會的，除了餘慈度，還有汪佩真。汪佩真日後和倪柝聲在上海開始有聚會，成為倪柝聲的得力同工之一。那次上海的復興聚會，帶動了整個上海教會的復興，在這次復興聚會中被感動獻身的，有計志文、趙世光，他們後來被主大大使用。

由於十二間排聚會的同工沒有被宣道會上海議會的伍約翰牧師按立，福州聚會處沒有被納入宣道會的建制；但是宣道會一直視王載為同路人。一九二八年九月，在廣西宣道會協會主席翟輔民牧師（Robert Jaffray）的邀請下，王載擔任香港培靈研經會講員，後來更在翟輔民的支持下，王載出任中華國外佈道團團長，總部設在廣西梧州；翟輔民本人則表現得非常謙讓，自願屈居副團長。王載的弟弟王峙，亦受翟輔民邀請，出任《聖經報》主筆。

## 第五章受到弟兄會的影響

倪柝聲與福州同工們分手的一個潛在原因，是他的信仰，從一開始，就受到了弟兄會的影響。根據倪柝聲在《基督徒報》介紹《直道》時披露，一九二一年，當倪柝聲得救才一年的時候，有一位朋友送他好幾本屬靈書籍，其中有一本就是英文本的《直道》（Straight Paths-for the Children of God）。《直道》為弟兄會的亞力山大·馬歇爾（Alexander Marshall）所著。

亞力山大·馬歇爾出生於蘇格蘭（Scotland）一個敬虔的基督教家庭，十八歲在蘇格蘭的格拉斯哥（Glasgow）亞瑟公司（Arthur & Company）的貨倉任職。兩年後，亞力山大·馬歇爾在聽到一位弟兄會的傳道人福朗（Gordon Forlong）傳福音時得救。得救後，亞力山大·馬歇爾前往各地傳福音，包括挪威、瑞士、俄羅斯、加拿大、美國、法國等。亞力山大·馬歇爾除了有講道的恩賜之外，還有寫作的恩賜。他在文字上的貢獻是有目共睹的。光是他的小冊子《神救贖的妙法》（God 's Way of Salvation）就銷行了數百萬本，並已譯為多國文字，其中文本為聖教書會出版。在亞力山大·馬歇爾一生中，受他影響最深遠的讀者，恐怕就是在中國服事主的倪柝聲。

一九二五年倪柝聲在福建福州附近的羅星塔住下，出版定期刊物《基督徒報》。這期間，倪柝聲曾和南京的李淵如姊妹談過福州聚會分裂的事故，以及他反對被按立的原因。根據倪柝聲在《往事的述說》所透露的，李淵如當時的態度很強硬，並未被倪柝聲說服，因此他就索性不再向她提教會路線問題了。在這時期，李淵如和賈玉銘、高師竹在南京主持《靈光報》，她並且在明德女校任教。在一九二五年六月份的《靈光報》，王載的《晨更篇》和倪柝聲的《與主同死》都收編在《靈光報》內，相容並蓄，顯示李淵如並未偏頗王載或倪柝聲，而是對他們一視同仁，都視他們為主內同道。

到了一九二六年初，倪柝聲把《直道》再讀一遍，倪柝聲承認：「我又把這本書看一遍。何等的奇妙，

神在這幾年來引導我所思想的、所教訓的，和我所實行的，真是與此書的各項看法完全符合。」

倪柝聲於是馬上匯錢到倫敦弟兄會的出版社 Pickering & Inglis，買了十多本《直道》，贈送與他走同一道路的同工們。

一九二六年，倪柝聲在廈門患了重病，醫生說他只有幾個月的命。倪柝聲雖不怕死，但南京的成寄歸和李淵如，都寫信請他到南京休息，他於是到了南京，住在成寄歸家裡，帶病校對司可福（Cyrus Ingersoll scotland）的聖經函授課程。倪柝聲同時受賈玉銘聘請，在《靈光報》任編輯，與李淵如、汪佩真等女同工一起工作。

在南京時，倪柝聲把《直道》借給李淵如看，李淵如讀了《直道》之後，對教會的神學觀完全改變，完全認同弟兄會的作家亞力山大·馬歇爾在《直道》中所闡述的各項觀點。李淵如與倪柝聲在教會問題上的看法是如此一致，促使她下定決心要辭去《靈光報》編輯的職位，只是當時未被賈玉銘所接納。

一九二六年底，李淵如在南京已經和幾位姊妹有擘餅聚會，倪柝聲在南京很自然地也就和他們一同擘餅。一九二七年五月，《基督徒報》出版特刊，將《直道》全文發表，李淵如並親筆為特刊寫了序。

在序中，李淵如這樣說：「《直道》之內容，有不少優點，值得人注意的：第一，是能以簡單婉轉之筆，發揮屬靈的要道；第二是每一斷案，皆以經訓為本，且又證之以事實；第三，是打破遺傳的教訓，言人所不敢言，以領人直求真理。至若旁徵博引，巧譬善喻，真是妙語風生，知雋而又能發人深省者！

餘願《直道》的結果，不是領人推崇欣賞一本亞力山大·馬歇爾的著作，乃是帶領人一如喬治·懷特排（George Whitefield）所說的：『但願人名、宗派，及公會都失敗；惟有耶穌基督是一切，而又充滿一切！』」李淵如在序的末了，注明一五二七年四月十四日她居住於上海的寄廬。原因是一九二七年三月，南京被革命軍佔領，靈光報社的辦公室被一些反基督教的人搗毀，報社只好結束。李淵如到上海之後，就在辛家花園二十號汪佩真家裡，和上海的幾位弟兄姊妹們有擘餅聚會。（由於汪佩真比李淵如早一步離開南京，所以辛家花園的擘餅聚會早在一九二六年底已經開始。）

一九二七年下半年，在上海的擘餅聚會遷到賡慶裡舉行；不久，倪柝聲將他在福建羅星塔所辦的福音書局也遷到新聞路賡慶裡，改名福音書房，由李淵如負責編校工作，先後出版《復興報》，和《講經記錄》。這幾本基督教刊物很有屬靈的份量，質素很高，各地很多信徒因之得著供應。

一九二八年一月，倪柝聲、李淵如、汪佩真和加拿大一位傳教士祝康宥（Charles H. Judd），共同租下了哈同路二百四十弄文德里三十號一幢房屋，每週舉行講道、擘餅、禱告等聚會，這是上海基督徒聚會處的開始。

在那年間，祝康宥是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差派的傳教士。大家知道，內地會是由戴德生（Hudson Taylor）所創立。正如《戴德生小傳》所寫的，內地會的傳教士，來自不同的宗派，戴德生本人來自弟兄會；不約而同的，祝康宥也同樣來自弟兄會。倪柝聲經常到祝康宥家裡拜訪，祝康宥向倪柝聲介紹了許多弟兄會出版的書籍，同時也向倪柝聲分享了他多年來在中國差傳的經驗。

祝康宥每主日早晨，例必騎著腳踏車，從內地會在吳淞路的辦事處，到哈同路與倪柝聲、李淵如、汪佩真等信徒一同擘餅。祝康宥和倪柝聲的配搭時間不很久，就被調回加拿大。倪柝聲對祝康宥早期給他靈性上的幫助，從未忘懷，這從他一九三二年底在加拿大溫哥華探訪祝康宥，重溫在上海相聚的美好回憶，可茲證明。

在一九九五年出版的《我的百姓》(My People)，是弟兄會的作家貝利斯 (Robert Baylis) 所撰寫。該書是北美弟兄會的一部簡史，書內也報導了弟兄會的祝康宥加入內地會，到中國佈道的事蹟。

弟兄會有一本詩歌名為《小群詩歌》(Hymns for the Little Flock)，命名的出處來自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二節，在那處主耶穌說：「你們這小群。」

倪柝聲在哈同路文德裡編譯的詩集取名為《小群詩歌》，共一百六十四首，名稱是否效法弟兄會領袖達秘編纂的《小群詩歌》，或者如此起名純屬巧合，因時過境遷，無從稽考。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倪柝聲當年手頭肯定有一本英國弟兄會出版的《小群詩歌》，因為倪柝聲的詩集採用了英國弟兄會《小群詩歌》中達秘所創作的《聽哪，千萬聲音呼喊。》(Hark! Ten Thousand Voices Crying)、和《父啊，兒女稱頌你名》(Father, Thy Name Our Souls Would Bless)。自福音傳入中國一兩百多年來，這是中國首次有詩集收錄了這位弟兄會偉大詩人達秘的詩作。在《信徒造就》的《唱詩》這一篇，倪柝聲對達秘的詩《聽哪，千萬聲音呼喊》，讚不絕口，倪氏說：「我想，全世界，過去這一千九百多年之中，難得有一首詩像這首詩這麼偉大的。這首詩是達秘寫的……這首詩寫的是啟示錄四章五章的光景，是升天之後宇宙裡的情形，在這裡有各各他，有復活，又有升天，天上充滿了榮耀。」

還有，倪柝聲在哈同路講道時，又經常引述弟兄會解經家開雷 (William Kelly)、馬金多 (Charles Henry Mackintosh)、柏勒 (John Gifford Bellet)、寇迪 (C.A. Coates) 的信息內容，充分說明倪柝聲深入地研讀弟兄會各大解經家的書籍。即使在一九二八年的第一次得勝聚會，與會者也多次認真地學習倪柝聲所寫的《向讀直道特刊者先說幾句話》。倪柝聲借弟兄會的亞力山大·馬歇爾的信息，在得勝聚會期間，介紹了地方教會的概念：特刊的前言說：「凡不合乎真理的，是當破壞的。惟破壞的目的，是要領人順服真理，不是建立自己。我們知道什麼是罪惡，我們就當自己先脫離，也領人脫離；切不可空談教訓，定別人的罪，以致失去愛心！我們的元首是基督；我們這許多人——基督徒——不過是肢體，借著基督成為一身，互相聯絡作肢體。神的言語，是我們的亮光。」

一九二九年六月，在內地會傳教士祝康宥回加拿大之後不久，弟兄會發生了變故。在倫敦北部十一英里巴涅 (Barnet) 閉關弟兄會舉行的特別聚會中，來自美國的弟兄會領袖詹姆斯·戴勒 (James Taylor) 在講道時，竟否認基督是神的兒子並非由永世開始的，他說基督成為神的兒子，是從主耶穌道成肉身之後才真正開始的。早在一八九〇年十一月弟兄會的芮文 (F. E. Raven)，就因在聖子的解釋上出現錯誤，而被一些正統的閉關弟兄會的主流派開除出去。一九二九年這些芮文派 (The Ravenites) 的弟兄會，就追隨詹姆斯·戴勒的教導，是為芮文——戴勒聯盟 (The Raven-Taylor company)，或稱戴勒一黨的 (The Taylor faction)。

一九二九年閉關弟兄會 (Exclusive Brethren) 在英國的分裂範圍擴大，分裂情況出現在愛丁堡 (Edinburgh)、巴斯 (Bath)、伯明罕 (Birmingham)、倫敦等地的聚會。從此可見，詹姆斯·戴勒在閉關弟兄會之中，有一些追隨者，才使他的異端，有一定的市場。詹姆斯·戴勒著作甚豐，從一九〇八年至一九二九年，共出版七十六本書。他到過加拿大、法國、新西蘭各國，本人則坐鎮美國紐約。毫無疑問的，他的異端教訓，也給美國弟兄會帶來重大的衝擊和破壞。

話說回來，正如前文所說，倪柝聲於一九二六年，寫信到倫敦的 Pickering & Inglis 買《直道》時，曾在信中說出自己仰慕那些書的原因，即他佩服弟兄會對聖經的認識很深入和透徹，但是倪沒有意識到內

地會內部有人變質和蛻化。一九三〇年，芮文派擁戴詹姆斯·戴勒為領袖之後，芮文派的弟兄會，就有一位成員，到上海來看倪柝聲在哈同路的聚會。倪柝聲在《往事的述說》中也作過類似的敘述。

一方面芮文派有人與倪柝聲有接觸；另一方面，神借著弟兄會早期領袖柏勒（J. G. Bellet）的著作《神的兒子》（The Son of God），駁斥了芮文派頭目詹姆斯·戴勒的異端。歷史學家挪爾（Napoleon Noel）在《弟兄會歷史》（The History of the Brethren）一書中這樣說：「柏勒所著的《神的兒子》，被神大大使用，實在是神的憐憫，借這本書拯救弟兄們脫離異端，並持守神的真道。」

在哈同路的福音書房，及時地出版了《神的兒子》的節譯本，該書由繆安信姊妹翻譯，而倪柝聲則在一九三〇年十一月為該書寫了序言。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英國芮文派的查理·巴露（Charles Barlow），他任職的工程公司，正好差派他到香港辦事；芮文派就托他到上海哈同路看看聚會處的性質。查理·巴露聽見倪柝聲、張光榮和一班弟兄們，聲稱他們脫離了宗派，完全歸於主的名下。查理·巴露聽了，就覺得很稀奇，因為禁閉弟兄會（Exclusive Brethren）的芮文派，素來自稱「聖徒聚集以歸於主的名下」（Saints gathered to the Name of the Lord Jesus Christ）；有別於公開弟兄會（Open Brethren），他們一向確認自己為新約模式的基督徒聚會 New Testament Companies of Christians。

自從弟兄會的祝康宥離開上海之後，如今有另一弟兄會的查理·巴露到臨，正好彌補了倪所企盼的屬靈同伴的空缺。不同的是，祝康宥來自信仰純正的弟兄會，而查理·巴露卻來自新冒起的、散佈異端的、以詹姆斯·戴勒為首的芮文派。

倪柝聲這時仍未透徹瞭解到，弟兄會的內部派別林立、分門別類、派中有派。倪安排查理·巴露，每天下午四點，在哈同路聚會處，向四十多位信徒講道。查理·巴露講的內容屬一般性題目，乍看不偏不倚，並沒有涉及聖子的位格問題。至於英國那邊芮文派的信徒，接到查理·巴露的信件，獲悉中國也興起了一批同路人，大受鼓舞。

查理·巴露回到英國之後，將他在上海哈同路聚會處的所見所聞，發佈到英國和與他們芮文派有關的各地聚會。一九三二年十月二十三日，芮文派共有八位代表，抵達上海探訪哈同路的聚會，他們是，來自英國的查理·巴露和美佑夫婦（Mr. & Mrs. A. Mayo）；來自美國三藩市的鮑威爾博士（Dr. Powell）；來自澳洲的喬埃斯婦（Mr. & Mrs. Joyce）、菲力普斯（Mr. Phillips）和豪斯（Mr. W. J. House）。

在這八位芮文派弟兄會的代表參加擘餅之前，倪柝聲特別聲明，哈同路只接納他們個人，純是弟兄和弟兄之間的交通，並非弟兄會的芮文派和哈同路聚會處的交通。倪柝聲鄭重宣告，除了在眾聖徒所共有的交通，不願有另類的交通，就如所謂「黨外無黨，黨內無派。」

話雖然這麼說，倪柝聲對芮文派的接待，還是非常隆重的，他于同年十一月間，召開特別同工聚會，由查理·巴露和豪斯主講，倪柝聲任翻譯。

一九三三年六月，倪柝聲應邀訪問英國，參加芮文派的年會。在英國時，倪柝聲在查理·巴露的陪同下，訪問了芮文派散落在英國幾處的聚會，並會見了芮文派的領袖詹姆斯·戴勒。詹姆斯·戴勒並親自陪同倪柝聲，橫渡大西洋，到彼岸訪問芮文派在美國幾處的聚會，倪柝聲還應邀在西田（Westfield）的聚會中講道。

詹姆斯·戴勒和倪柝聲的多次談話，顯示了兩人在信仰上的差異。芮文派是閉關的，而倪柝聲在倫敦

時，則私下到倫敦貴橡路（Honor Oak Road）的基督徒團契中心（Christian Fellowship Center）聚會；在美國時，又到紐黑文（New Haven），在長老會傳教士單惠泉（Thornton Stearns）家裡參加擘餅聚會。

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四日，在倫敦的芮文派弟兄會寫信給哈同路的負責弟兄，指責倪柝聲在倫敦和紐約期間，違反閉關弟兄會的規則，和不同立場的基督教團體有交通，甚至和彼等一同擘餅，芮文派要求哈同路的負責弟兄給予一個適當的解釋。

緊接著，芮文派的負責人詹姆斯·戴勒，從美國紐約，直接寫一封私人信件給陸忠信，指出倪柝聲沒有認真恪守閉關弟兄會向來持守的嚴明立場。

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日，哈同路的負責弟兄，由杜忠臣、吳錫佑、張光榮具名，指出當年接待芮文派的八個代表在哈同路擘餅時，聚會處已經鄭重聲明那次的接納，是接納個人，而非確認兩個團體的合併。

芮文派接信後，非常不滿，向哈同路的聚會處發出最後通牒，威脅聚會處若不認錯，芮文派要與倪柝聲帶的聚會斷絕來往。為此，一九三五年七月二日，倪柝聲，和杜忠臣、吳錫佑、張光榮聯名，指出信徒只有道德上犯了罪，教會才可以拒絕信徒參與擘餅，至於有弟兄若對預言解釋不同，以及弟兄們和不同團體有接觸，不能作為排斥弟兄們擘餅的根據。

一九三五年七月三十日，倫敦芮文派召開大會，包括三名到過哈同路的弟兄，認為倪等的態度傲慢，無法接納；同時指出芮文派與貴橡路的基督徒交通中心的性質不同，不可能有屬靈的交通。一九三五年八月三十一日，倫敦芮文派由查理·巴露（Charles Barlow）、萊因（Percy Lyon）、加丁納（Alfred Gardiner）署名，正式割斷與哈同路聚會處的一切關係，並斷絕彼此之間的交通，不再相互接納一起擘餅。

有一點必須澄清的，即倪柝聲在一九三五年七月的《通問彙刊》第十二期，所登載的《覆倫敦羅區福街聚會信》，是發表給國內的弟兄姊妹看的。第一，沒有注明日期；第二，局外人不知道倫敦羅區福街英文何所指，明確一點，應是羅區福街二十五號，英文原信是 To the Saints at 25 Rochford Street and Elsewhere in London。末了，英文原信署名只有四位：分別時 D.C. Du（杜忠臣），Y. A. Wu（吳錫佑），W. Nee（倪柝聲），K. Y. Chang（張光榮）。而在《通問彙報》登載的，代表上海哈同路北四川路聚會的弟兄們，順序是杜忠臣、林光表、吳錫佑、張光榮。信件全文請查閱基督徒出版社出版的《倪柝聲書信集》。

從芮文派弟兄會和哈同路的手，看到了神實在恩待了中國的教會，使國內的教會不至陷入詹姆斯·戴勒所傳的異端裡。幾年後，弟兄會終於有人被神興起，把詹姆斯·戴勒一夥人從純正的弟兄會開除出去。

## 第六章 經歷神的醫治大能

倪柝聲從一九二四年開始，就得了肺結核病，這病斷斷續續，纏繞他達十年之久，至終肺結核得著醫治；但肺病期間，即一九二七年間，他又得了心絞痛，這心臟病如一根刺，在肺病痊癒後伴隨著他，至離世為止。

無論如何，倪柝聲的肺病，從人的眼光看來，嚴重到無法可醫，可說群醫束手無策，但是神卻在他身上彰顯了大能；甚至在數度傳出他因肺病去世的謠言之後，他仍然活在人間，不能不說是一項神蹟。

以下是倪柝聲所作的見證：

「一九二四年我在廈門時，開始患病。起初只有一點熱度，渾身覺得無力，胸部有點痛，只是不知道患上什麼病。該地的王和聲醫生對我說，我知道你有信心，相信神能醫治你，但你可否讓我檢查一下，看是什麼病？王和聲檢查我的胸肺後，就低聲對王燈明弟兄說了一些話，只是不向我明言。我向他們說，直談好了，我不怕，王和聲於是說，我患了嚴重的肺結核病，恐怕要長休息，以免病情急轉直下。

「當晚我輾轉難眠，無法入睡。想到工作未完，即將回去見主，似乎對主不起，心情未免沉重。我於是離開廈門，告別王燈明等同工，到福建鄉間休息，與主多有交通。我尋問主說，到底你在我身上的心意如何，是保留我生命，或是要我回天家見你？若是你要我為你捨命，我死也不畏懼。約有半年之久，我摸不著主的心意，但我心中有喜樂，相信主的定規總不會錯。那些日子全國各地多人來信，不是對我說勸慰的話，而是責備我工作不知節制，不愛惜自己的性命。有一位弟兄引用以弗所書五章二十九節的話責備我，該節經文是：『從來沒有人恨自己的身子，總是保養顧惜，正像基督待教會一樣。』

「不久，南京的成寄歸弟兄請我到他家，一面休息，一面幫助他翻譯司可福的聖經函授課程。日過一日，肺病未見痊癒，雖然勉強作一點文字與查經工作，但甚為吃力。每日下午發燒，晚間失眠，常出冷汗。有位弟兄勸我要多休息，我答說，我唯恐會休息到生鏽的地步，我想到自己橫豎活不長了，應當一面信靠神加我力量，一面為祂作工，我問主有否什麼未了的事要我作的。主若要我作未了的事，就求主留我的性命，不然，世界對我也沒有何可留戀的。我把司可福的函授課程只改了頭四卷，就痛得作不下去了。我本來還能起床，以後就不能了，有一次被人請去領傳福音聚會，我勉強起來，求主加我力量。我在赴聚會的途中，常常要抱住電燈柱稍為休息。我每次抱電燈柱休息時，我就對主說，主啊，我為你而死，實在是值得！有些弟兄知道我這種患病的情形，責怪我不懂愛惜自己的身體；但我總是說，我愛我的主耶穌，並且願意為祂捨命。

「經過了一個多月的禱告，我覺得應當將我在神面前所學習的寫成一本書。以前我以為一個人要到老年時才可以寫書；但那時我以為自己快要離世了，所以必須開始寫書。於是在江蘇省無錫城租了一個小房間，將自己關在裡面終日寫作。那時我的病開始加劇，連躺下來都不能。我寫的時候要坐在一張高背椅子上，胸部頂住桌子，以減輕胸部疼痛。撒但對我說，你既然快要死，何不死得舒服點，何必如此受苦？我說，是神要我這樣，你退去吧！經過了四個月，我寫完了三卷《屬靈人》，在寫作期間，不知流了多少血汗和眼淚；在生命無可指望中，神的恩典都將我帶領過去。每次寫作後，我都對自己說，這是我對教會最後的見證。雖然是在百般的艱苦中寫作，但我覺得神對我非常親近。人以為我是受神的折磨。成寄歸從南京來信對我說，你如此拼，終有一日會後悔。我回信說，我愛我的主。我在一九二七年整年的光景，正如我在《基督徒報》二十四期所述說的；『我這年中的身體軟弱，幾乎是到處知道了，並且，有三個地方竟有我地上帳棚已經毀壞了的訛傳，因此，我所得的代禱也比往常加多了。我真是感念著那些關心我身上事的人！自然，往日的精力好像衰敗許多，平易的工作好像也很快叫身體覺得其擔負；但是，感謝神，因為今年的日子究竟還是工作的日子。與其休息而生鏽，何如勞碌而信靠。應許的力量在必需的時候，還是沒有減少的，這是不能不感贊我主的。』

「《屬靈人》出版以後，我在神面前禱告說，如今請讓你僕人安然去世！那時我的病惡化了，夜間不能安睡，晚上醒來，在床上翻來覆去，骨瘦如柴，夜間盜汗，聲音嘶啞。人聽我說話時，將耳朵放在我



口邊也聽不見。有幾位姊妹輪班服事我，其中有一位是老練的護士，一見到我就哭起來。她作見證說，我看過很多病人，但從來沒有見過像他這樣可憐的光景，恐怕只能活三四天吧！有人將這事告訴我，我就說，就這樣苟延殘喘吧！我自己也知道快要死了，有一位弟兄打電報給各地教會說，我沒有希望了，不必再為我禱告。

「有一天我問神說，為什麼這麼快召我回去？我在神面前認罪，因怕我還有不忠的地方。同時我也告訴神，我沒有信心，那一天我專一地禁食禱告，也再一次將自己奉獻給神，答應神只作祂派定給我的工作。那一天我禁食，是由早晨起到下午三時，同時，在上海的同工們，也在李淵如姊妹家，為我迫切禱告。我向神禱告，求祂給我信心，祂就給我話語，是我一生不會忘記的。第一句：是羅馬書一章十七節，義人必因信而活；第二句：是哥林多後書一章二十四節，憑信而立；第三句是哥林多後書五章七節，因信而行。這幾句話使我充滿了喜樂，因為馬可福音九章二十三節說，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感謝讚美神，因祂已經給我話語，我相信神已經醫治我了。

「試驗立刻就緊跟著來。聖經說，憑信而立，但我還躺在床上。這時我心中交戰，是要起身站立，還是繼續躺臥在床？人到底是愛自己，以為躺在床上死，總比站著死舒服一點。但是神的話發出能力，我就不顧一切，穿上我一百七十六天未穿過的衣服。我下床要站立起來，出了很多汗，好像被雨淋透。撒但對我說，你連坐都不能，還想站立起來？我說，是神叫我站立。我就站起來，全身又出冷汗，幾乎倒下去。我一直說，憑信而立，憑信而立！我就走去拿褲子和襪子來穿，穿好了，我就坐下。一坐下，神的話又來了，叫我不只憑信而立，還要因信而行。我覺得我能起床，並走幾步去拿褲子和襪子來穿，已經是了不得了，我怎能希望再行走呢？我就問神，你要我往哪裡去？神說，你下樓梯到二百十五號李淵如姊妹的家裡去。那裡有一班弟兄姊妹，為你的病已經禁食了兩三天。我以為在房間裡走走也許可以，我怎能下樓梯？我禱告說，神啊，我憑信能站立，我因信也能行走下樓梯！我立刻走向通往樓梯的門，把門打開。我老實告訴你們，當我站在樓梯頂的時候，我看那是我一生所看見最高的一道樓梯。我對神說，你叫我走，我縱使死了，我也要走。但我接著對主說，主啊！我走不動，求你用手扶著我走。我扶著欄杆，一階一階地走下去。我的全身又冒出冷汗，我一面走，一面喊著說，因信而行，因信而行！我每走下一階，我都禱告說，主啊！是你叫我能走！在信心中，我似乎是與主手拉著手，直走完了那二十五階的樓梯。下到樓梯底時，我覺得很有力量，就快步跑到後門，開了門，一直向李淵如姊妹的家中走去。我對主說，從今以後，我因信而活著，不再是個躺著的病人了。我就像彼得在使徒行傳十二章裡那樣地叩門，只是沒有羅大出來應門。門一開，我走進去，七、八個弟兄姊妹注視著我，不出聲，也不動。大家安靜坐著，約有一小時，如同神出現在人間。我也坐在那裡，心中滿了感謝和讚美。以後我就作見證，向他們述說我蒙醫治的經過。大家靈裡暢快喜樂，高聲讚美神奇妙的作為。那天，我們租了一輛汽車，到郊外江灣去見著名女佈道家餘慈度。她看見我，覺得非常驚奇。因為她不久前才接到我快要去世的消息。我的出現，被當作是從死裡復活一樣。在主面前，我們又有一番的感謝和讚美。那一周的主日，我在講臺上足足講了三個小時。」

一九二八年七月，倪柝聲弟兄在《復興報》第四冊，雖然沒有向讀者詳述他大病得痊癒的整個過程和細節，卻在《公開的信》中，說出「在才過的日子中，我真是感覺前所未有的軟弱，真是叫我看見除了神的恩典之外，我們真是什麼都沒有。」

倪柝聲雖然在一九二八年可以和弟兄姊妹一起去拜訪餘慈度，見證神醫治的大能。但在該月的《復興報》第六冊，由李淵如執筆的《代啟》中，李淵如吐露了倪柝聲在那一時期的危急情形。

「在這個時期內，我們的弟兄倪柝聲，竟然是度著兵凶戰危的生活！當他寫《屬靈人》時，是如何在撒但的齒縫間度日；當《屬靈人》寫成之後，撒但更是竭其陰府的權勢，想把我們的弟兄打到一敗塗地，好使《屬靈人》的見證都歸於空虛而後已！這樣的戰爭，好像真是曠日持久，要使我們唱悲歌的了，但是，我們慈愛的父親，得勝的救主！就是在這樣危急的時候，領我們的弟兄在升天的地位裡，勝過了仇敵猛烈的攻擊！我們今天含著歡欣的淚向主感恩！」

倪柝聲病癒之後，聽到有一個德國醫生的家拍賣東西，他就到那裡去，一經查問，才發現這位醫生多年前曾為倪的肺部照 X 光。當年該醫生拍了三張菲林，並告訴倪沒有存活希望了。倪請該德國醫生再拍一次，醫生說，不需要了。醫生於是拿了一張另一個肺病人的 X 光片給倪看，說這個人的情形比你的情形好，但他拍這張 X 光片後回家，兩周內就死了。你不必再來見我，我不想賺你的錢。倪柝聲當年聽了就非常失望地回家去。事隔四年，倪柝聲在報紙上看到一則廣告，說某某德國名醫去世，要拍賣房子和傢俱。當他查問到這位德國名醫是拍過他肺病 X 光照片的那位時，倪柝聲這樣敘述：

「我舉起手來，讚美主說，這位醫生死了，他曾斷言，我將不久人世；現在，他反而先我而去，倒下來死了，主啊！你真是恩待我，我感謝你！靠著主的寶血，容讓我這樣說，在人眼目中，這位醫生比我強壯，可是他竟先我而死了；我倒因著神的醫治，仍然活著。」

倪柝聲對神醫治的大能，有透徹的認識和充分的經歷。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二日在鼓嶺時，他親自作見證：「我有肺病，腰子病、肝病、現在還有心臟病。一九二三年我頭一次患上腹膜炎，在床上躺了一個多月，一呼吸就發痛，熱度甚高，很是痛苦。那時繆紹訓弟兄請了一些弟兄姊妹來為我禱告。他禱告時我不覺得什麼。當和受恩教士禱告說，主啊，墳墓裡沒有人讚美你，弟兄若是死了就不能讚美你。她這樣一禱告，我心裡就通了，但熱度還是那麼高，裡面還是那麼痛，但我有了神的話，不看病狀，因神是信實的，第二天我就起身，走到羅星塔編了一期的《基督徒報》。」倪柝聲對於疾病，歸納為三點：若沒有神的話，就不能試探神；若有神的話，就不要看病狀；若有神的話而不是立刻醫治，則祂的恩典是夠你用的。不是難處除去，而是恩典加多。主沒有意思讓我們生病，又不給我們夠用的恩典。在鼓嶺的當晚，倪柝聲向同工們，引名佈道家斯敦利（Charles Stanley）為例。倪這樣說：「斯敦利只有三分之一的肺，但他卻作露天佈道的耗力工作。人少的時候，有兩三千人，人多的時候有六七千人，他傳了三十年。他有神的話，叫他能作這樣的工作，一點沒有問題。但若是沒有神的話，他這樣作，就是等於自殺。倪柝聲對疾病的結論是：保羅雖病，但他所作的工比任何人都多。疾病沒有限制保羅作工，疾病也絕不能攔阻我們事奉神。要學習簡單地把自己交托給那忠誠的、信實的主。主會按祂所認為好的來對待我們。」

## 第七章娶了賢慧的妻子

一九二〇年間，倪柝聲信主還沒有多久時，他覺得自己缺少聖靈的能力，他於是到白牙潭向和受恩教士請教。和受恩說，要毫無保留地、徹底地將自己奉獻給神。和受恩並向倪柝聲說了浦力金（Mr. Prigin）

的故事。浦力金在牧會期間，攻讀哲學博士的學位，認為以博士頭銜來事奉神，會叫神得榮耀；但是浦力金在面臨最後一次口試前，心裡一直不平安，一直得不著聖靈的充滿。到最後，浦力金向神降服，放棄博士學位，第二天講道時，只述說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結果全體會眾眼淚盈眶。浦力金成為神大用的僕人。

倪柝聲聽了這故事，徹底地對付罪，從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二年，向二、三百人認罪，以便除去自己與神之間の間隔，但他依然沒有得著聖靈的能力。

一九二二年一月，有一天，倪柝聲準備講章時，讀到詩篇第七十三篇二十五節，經文是：「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誰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沒有所愛慕的。」讀到這裡，倪柝聲承認自己內心另有愛慕。有一女孩子妨礙他和主耶穌有更密切的關係，這個女孩子叫張品蕙，十多年來，倪柝聲一直深愛著她。倪家和張家是三代的世交。在倪柝聲得救之後，就盡力地向張品蕙傳福音，張品蕙非但不接受主，還倒過來訕笑倪柝聲，取笑倪柝聲所傳的主耶穌，這使倪柝聲感到很沮喪。儘管如此，倪柝聲的內心仍深深地愛著張品蕙。張品蕙在倪柝聲的心裡一直佔有很重要的地位。張品蕙此時追逐時尚，既化妝，又打扮得很摩登，和當時聚會處的姊妹們的樸素作風，很不相稱。那一天，倪柝聲才發現，他口頭上說要徹底奉獻，心裡頭卻有所保留，在他心的深處，他仍無法放下她，他不能像詩人所說的，「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沒有所愛慕的。」那天，倪柝聲雖然硬著頭皮，上講臺講了一篇道，但是他不曉得自己講的是什麼。整整一星期，倪柝聲和神掙扎，他並確實知道，他對張品蕙的愛慕，成為他被聖靈充滿的攔阻。

一星期後，倪柝聲以沉重的心情求神改變祂的心意，允許他繼續愛慕仍未信主的女朋友，但是神堅持祂的要求，於是倪柝聲求基督的愛充滿他，他願意放下他心愛的人。

幾天後，當基督的愛摸著倪柝聲時，他真能如詩篇七十三篇二十五節那樣對主說：「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誰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沒有所愛慕的！」在這一天，倪柝聲出現了重大的改變，下面是他自己的見證：

「現在我願意將我的愛人放下，基督的愛那樣地激勵了我，使我決心將她放下。作了這決定之後，我能從心裡說出詩篇七十三篇二十五節的話來了，我裡面充滿了說不出來的喜樂。我雖然沒有上到第三層天，卻能說我已到達了第二層天，我真是充滿了喜樂。現在世界對我已經變得沒有價值了，我覺得我好像是飄浮在雲彩上面。在我得救的那一夜，我的罪擔脫落了；而這一天——一九二二年二月十三日，在我心裡所有與主之間的障礙都挪開了。在這一天之後，我得著了聖靈的能力，許多人相繼被我帶領得救了。」

在倪柝聲放下心愛的人張品蕙之後，他受感寫了一首詩歌。

一 主愛長、闊、高、深！ 實在不能推測！

不然像我這樣罪人， 怎能滿被恩澤？

二 我主出了重價， 買我回來歸祂；

我今願意背十字架 忠心一路跟祂。

三 我今撇下一切 為要得著基督；

生也死也想都不屑， 有何使我回顧。

四 親友、欲好、利名…… 於我夫復何用？

恩主為我變作苦貧， 我今為主亦窮。

五 我愛我的救主； 我求祂的稱是；

為她之故安逸變苦， 利益變為損失。

六 你是我的安慰， 我的恩主耶穌！

除你之外在天何歸？ 在地何所愛慕？

七 反對、艱苦、飄零， 我今一起不理；

只求我主用你愛情， 繞我靈、魂、身體。

八 主啊，我今求你， 施恩引導小子，

立在我旁常加我力， 過此黑暗罪世。

九 撒但、世界、肉體， 時常試探欺凌；

你若不加小子能力， 恐將貽羞你名。

十 現今時候不多， 求你使我脫塵；

你一再來，我即唱說：「阿利路亞！阿們！」

倪柝聲和張品蕙分手之後，倪柝聲多年時間在上海服事主，張品蕙則到北京燕京大學攻讀生物，並得碩士學位，幾年後品蕙學成回上海，也得救信了主。因著主的美意，張品蕙一直雲英未嫁，並於一九三四年參加上海的聚會，距離倪弟兄因舍她而作的《主愛長闊高深》，已相隔十二年。此時，倪柝聲認定，他為主的緣故所放下的，神重新賜給他作配偶。正如腓利門書十五節所說的，他暫時離開你，或者叫你永遠得著他。兩人於是談及婚事，只是張品蕙的姑母張美珍認為倪柝聲只是個窮傳道，高攀不上張品蕙，這使倪柝聲對婚事諸多顧慮，不敢冒然進行。在這關鍵時刻，倪柝聲的弟弟倪懷祖打電報到福州，給倪的父母倪文修夫婦，要他們不顧張美珍的阻撓，為倪柝聲主持婚事。倪氏一家人均關心倪柝聲的婚事，因他已是三十歲。

倪林和平姊妹一到上海，就去約見張品蕙的合法家長張汝霖，張汝霖與張美珍的態度正好相反，他說，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只要我侄女品蕙答應，我絕不反對。不過他關注地查問倪林和平有關倪柝聲的生理狀況，他說，風聞令郎身子不好，是否屬實？倪林和平據實地說，柝聲早年患過肺病，已經康復，不過他一直患有心絞痛，隨時有奪命的可能，只是我們是神的兒女，生命氣息掌握在神的手中。張汝霖聽了說，既然這樣，只得聽天由命吧！張汝霖並答應說，到了婚期，他就到杭州來主婚。張汝霖雖答應張品蕙的婚事，但倪林和平姊妹覺得還需要印證神的心意，她在《恩愛標本》一書中這樣敘述：

「我覺得我應當與這位未婚媳婦有相當的接觸，看她屬靈的情形到底如何。我也祈求神，若是祂的旨意叫她作我的媳婦，就求神使我能愛她過於愛我自己的女兒。因此我就向張家請求，要品蕙告假與我一同到杭州去參加即將召開的得勝特別聚會。感謝神，祂成就了我的心願，我有機會與品蕙在杭州同臥一房達一星期之久，我們同宿同禱告。有一天，在我們禱告的時候，神給我看見她真是神所預備給我兒子作妻子的，我感謝祂，到了十月十九日，他們兩人就結婚了。這日子正是我丈夫與我結婚的日子。」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七日，杭州得勝聚會結束。兩日後，倪柝聲舉行結婚。婚禮是由男方家長倪文修和

女方家長張汝霖主婚，證婚人是來自長春的老弟兄田品方。參加婚禮的有二百多人。

我的父親（陳則信）也在杭州參加婚禮，他在《倪柝聲弟兄簡史》裡，對於這樁婚事作了詳盡的敘述，說倪柝聲的婚事使倪遇到不少的難處，後來甚至弄得滿城風雨，叫許多弟兄姊妹都受到影響，在《簡史》中，我們得知張品蕙的姑母張美珍，把張品蕙從小撫養大，有意將張品蕙許配給一個世界上有名望、有財富、有地位的人。所以倪柝聲雖然對張品蕙有感情，為了不拂逆張美珍的意思，一直拖延這樁婚事。

當初倪柝聲知道母親決定在杭州特別聚會結束的日子為他舉行婚禮時，倪柝聲大吃一驚。他深知在張美珍的反對下，一旦與張品蕙結婚，一定會掀起軒然大波，他於是打算一領完聚會，就逃婚。但是有幾位同工反對倪逃婚，有一個同工聲色俱厲地對倪說：「你若逃婚，對你沒有問題，可是你要想到，張品蕙姊妹在結婚的日子，新郎跑掉了，那是多麼丟臉的一件事。」這位同工又警告倪弟兄說：「如果你走掉的話，我們就不與你同工了。」

家父在《簡史》中，又這樣憶述：「倪弟兄不得不接受環境的安排，舉行了婚禮，他事先毫無準備，他穿了一件長袍，後面還破了一個小洞洞，他講道時穿的是那一件，結婚的時候穿的還是那一件。婚禮完畢，倪柝聲夫婦就回到了上海。」

倪柝聲回到上海後，張美珍威脅說，倪柝聲若不按風俗禮儀去拜訪她，她就要用辦法對付倪柝聲。倪柝聲覺得不能在威脅下屈服，也就沒有去拜訪張美珍。

結果張美珍不惜金錢，在上海最大的報紙《申報》，連續一星期刊登啟示詆毀倪柝聲的品德，從各方面徹底譏諷倪柝聲，她又在眾信徒之間廣泛派發單張，破壞倪柝聲的名譽，使倪柝聲精神上深受打擊，幾乎抬不起頭來。他被迫攜帶新婚的妻子，遠離上海，退隱在遠地，有幾個月停止了公開的講道。在事態稍為平息後，倪柝聲跟大約十位同工，在杭州西湖，查讀了雅歌書兩星期，該次講道記錄後來輯印為《歌中之歌》。

## 第八章獲閩南一帶同工的支持

翻閱倪柝聲的生平，我們會發現，左右他一生的，是一批屬靈的女強人，包括倪的母親倪林和平、餘慈度、和受恩、李淵如、汪佩真等。

汪佩真從南京金陵神學院畢業後，就賓士各地傳福音。汪佩真經常在半夜三時起身守晨更。她屈下雙膝，跪在神的面前禱告，雖然年紀很輕，膝蓋已經變成瘀黑。她對主的忠貞至為感人。

一九二五年四月，汪佩真應邀到山東煙臺美南浸信會禮拜堂講道，有些年輕人對一位年僅二十五歲的年輕女傳道人傳福音，感到好奇。那天汪佩真講的是埃及的法老如何奴役和操縱以色列人，正如撒但今日如何奴役和霸佔世人。汪佩真的講道是如此帶有聖靈的能力，以致她的信息抓住了許多人，令他們受感動歸向了基督。

由於汪佩真對主忠心，在一切的事上都把榮耀歸給神。有一次她重回煙臺，見那裡的弟兄姊妹正在痛哭流淚，為病危的一個負責同工禱告，她們執意要求神醫治這個負責同工。

汪佩真看到這情況，不留情面地指責當地的負責弟兄們：「你們在神面前這樣表現是恰當的嗎？煙臺的

教會是私人的嗎？還是教會是神手中的工作？你們簡直以個人作為教會的偶像了！如果你們再不認罪痛悔，神也許會拿去你們的偶像，來復興煙臺的教會。」煙臺的教會的其它負責人一聽，就幡然醒悟，認罪悔改，不再認心目中的偶像求神醫治。

現在談一下倪柝聲一九二六年春天在福建南部一帶事奉的情況，底下是家父陳則信的敘述：

「主帶領他到廈門開特別聚會，然後又到漳州領會。那時我恰好在漳州的潯源中學讀書。他去的時候，年紀才二十四歲。我們的校長見他年輕，就看不起他，以為一個年僅二十四歲的青年人領什麼奮興會，作他的學生倒是差不多！倪弟兄未來之前，學校裡的祈禱聚會，常為他領奮興會的事禱告。……他步上講臺後，穿著藍布長衫，一坐下來就低著頭默禱，什麼都不看，只在那裡禱告。他倚靠的不是自己的口才，乃是神的話語。當他講了五分鐘道以後，會場的空氣就改變了！全體學生都聚精會神地留心聽。散會時，眾人都非常驚奇！因為他的講道，就如經上說：正像有權柄的人。……最末了一晚，就是讓這幾晚蒙恩得救者作見證的聚會，許多人爭先恐後地起來述說所蒙的洪恩。那時寫讚美稱謝的聲音，充滿了整個會場！漳州城的教會便有了空前的大復興！

「在那次漳州大復興時，漳州城四間禮拜堂的光景完全改變了。本來聚會死氣沉沉的，現在充滿了生命，許多信徒生活改變，靈性上有進步。」

家父陳則信從漳州潯源中學畢業後，就進入廈門的閩南聖道專門大學攻讀神學，裝備自己，以便日後出來事奉。

倪柝聲在自己的本家——福州，即他開始聚會的倉前山十二間排聚會處，受到王載等同工的排斥，卻在福建南部得到廣泛的同工們的支援。閩南一帶教會的同工，包括廈門的王燈明、先父陳則信，漳州的吳仁傑、韓進修，同安的陸忠信、鄧志誠、蔡志崇。

這些閩南的同工，始終站在倪柝聲一邊。即使在倪柝聲最困難的時期，他們也一直扶持倪柝聲，從來沒有背棄他。

當倪柝聲與李淵如、汪佩真等在上海有了新的起頭，而聚會處發源地的福州十二間排的聚會，卻逐步疏遠了倪柝聲。某些福州的同工，甚至一度斷絕了和倪的屬靈交通。因此，家父陳則信等閩南同工，這麼多年來的取態和立場，無疑地對倪是一種激勵和安慰。

一九三五年，倪柝聲在季永同、朱臣兩弟兄和汪佩真姊妹的陪同下，在福州南部漳州吳仁傑弟兄的大院子舉行特別聚會。根據先父陳則信的見證，那次特別聚會，蒙恩情形還超過已往在上海、杭州等地舉行的幾次得勝聚會。倪柝聲在那次泉州聚會之後，特別邀請家父陳則信到上海，從而進一步加強了倪柝聲和閩南一帶同工的關係。我們一家五口——父母親加上我哥哥、本人和大妹，於是於一九三五年底遷居上海。

到了一九三六年九月，因著汕頭聚會的主要負責弟兄姜子航出了事，我父親（陳則信）才攜眷離開上海，被倪柝聲安排到汕頭去服事教會。對倪柝聲本人來說，他生於汕頭，對汕頭一直有一份深厚的感情。倪安排先父一人兼顧閩南一帶和潮汕一帶的教會，顯示倪柝聲一直非常器重先父。

我們一家住在汕頭期間，由於倪伯母——倪柝聲的母親——有時從上海南下汕頭，在飲食上經常指定吃一些合她自己口味的菜肴，我的母親（陳張雅淑）有時覺得窮於應付，但母親說，她因此從倪伯母那裡學到不少廚藝。

一九四〇年，我父親到東南亞一帶佈道，之後足跡遍及印尼、菲律賓、馬來西亞、泰國一帶；二次世界大戰後他更把我們一家大小，帶到暹羅曼谷。

一九四八年十月，我父親從鼓嶺下山後，仍兼顧閩南一帶和泰國的各地教會。一年後，倪柝聲對香港的工作有了新的安排，被他電召到香港負責教會事工的，仍是閩南同工——我的父親。倪柝聲從不忘懷閩南一帶同工們對他堅定不移的支持。

## 第九章認識了史百克

史百克（Theodore Austin Sparks），一八八〇年生於蘇格蘭（Scotland）的丹倫（Dunoon）；父親是英格蘭人，母親是蘇格蘭人。不過，史百克從幼年開始，就自認是蘇格蘭人。他的父親是一個歌劇團的經理人（impresario），自小耳濡目染的是舞臺藝術、音樂演奏等等。至今沒有人查考到，他的父親是否重新得救，是否真正重生。

但是史百克的母親卻是一位真正敬虔的愛主的姊妹。她愛慕主，不斷地禱告，對主有無比的忠貞。她屬於蘇格蘭教會（Church of Scotland）中的艾文派（Irvingites）。

艾文派的稱謂，是對那些追隨艾文（Edward Irving）的信徒而說的。艾文實際上，一直被稱為靈恩運動（the father of charismatics）的父輩，他堅信教會是基督的身體。艾文對使徒行傳中記載的聖靈的澆灌深信不疑。在一八四〇年左右，艾文所帶起的復興運動擴及英格蘭和蘇格蘭一帶。

史百克從小看到母親定時參加禱告聚會，在母親的感染下，他堅信神的話語是一切信仰的根據，是最高的權威。史百克在十七歲那一年，仍未清楚得救，在一個主日下午，他走在格拉斯哥（Glasgow）的街道上，聽見一些青年人在作露天佈道。他聽了大受感動，母親多年來在他潛意識裡所播下的福音種子突然間綻開了。當晚，他接受主耶穌作他個人救主；他並將自己的一生，奉獻給主耶穌。重生後一星期，即下一主日，史百克就加入那些青年人，作露天傳福音的工作。

再過一兩星期，他開口作見證，簡述自己如何歸向基督。信主後，他看到了受浸的真理，就脫離蘇格蘭教會，接著他受了浸，後來他分別在浸信會和公理會被按立為牧師。在浸信會和公理會兩個宗派，他都被肯定為一個合格的牧師。

本人曾在《摩根小傳》中，述及坎培-摩根（Campbell Morgan）是二十世紀初葉最卓越的解經家，被變譽為「解經王子」。該書又述及摩根於倫敦威斯敏斯特教堂（Westminster Chapel）擔任主任牧師期間，每星期都主持解經聚會。當年參加解經聚會的，不乏年輕的教牧同工，內中就有史百克。史百克可說是摩根最有恩賜，和最優秀的門生之一。那些日子，英國許多教堂，都爭恐後地輪流聘請史百克為講員。

後來，史百克擔任貴橡浸信會（Honor Oak Baptist Church）的牧師；沒有多久，整個教堂起了根本性的變化。一些掛名的教友，包括教堂的文書、執事，一個跟著一個，清楚得救。整個教會的屬靈氣氛煥然一新。這一期間，每星期二，史百克都乘火車到倫敦市區，和兩位追求主的弟兄——一位政府官員伯得遜（George Paterson）和一位元工程公司職員岱勒（George Taylor），一起禱告讀經。

有一天，史百克接到賓路易師母（Jessie Penn-Lewis）的信，邀請史百克參加為期三天的倫敦教牧同工

聚會 (Workers' Conference)，史百克就去赴會，第一晚他坐在最後一排。賓路易師母一講話，史百克就在神的光照下，愈聽愈進入聖靈對基督的豐滿的啟示。不久後，史百克轉來與賓路易師母同工。史百克的功用是這麼顯著，使賓路易師母視史百克為屬靈的接班人，每當賓路易師母往歐洲大陸傳道時，倫敦的講壇就由史百克擔任。賓路易師母和史百克帶領了當時的得勝運動 (Overcomer Movement)。史百克和賓路易師母走在一起的時日不長，一九二六年，史百克和伯得遜、岱勤在奧格夫人 (Lady Ogle) 的支持下，開始在貴橡基督徒交通中心 (Honor Oak Christian Fellowship Centre) 有聚會。

倪柝聲最初是從和受恩教士口中聽到賓路易師母和史百克的名字的。當和受恩一九〇八年再度從英國重返中國時，和教士在余慈度的敦促下，征得賓路易師母的同意，准許將賓路易師母在《得勝報》釋放的信息，譯成中文發表。

在倪柝聲出來服事主後，和教士和余慈度同認為，最適當翻譯賓路易師母信息的人選是倪柝聲，於是在倪柝聲主編的《復興報》，常有賓路易師母的文章登載。倪柝聲後來又從英國的屬靈刊物《得勝者》 (The Overcomer) 知道了史百克這個新人。史百克與賓路易師母後來雖然分道揚鑣，卻並沒有影響倪柝聲對史百克的敬仰。實際上，史百克以基督為中心的亮光，成為倪柝聲末後一段日子的主題信息。一九二九年初，倪柝聲到羅星塔拜訪和受恩教士，事實上這是他們兩人最後一次的晤面。此時，和受恩教士對倪柝聲緊跟《直道》這本弟兄會書籍的教訓，感到不安，她甚至覺察到芮文派弟兄會的詹姆斯·戴勒的教義，混雜著異端的成分。

和受恩把史百克主編的《見證報》 (A Witness and a Testimony) 拿給倪柝聲看，說這一年她從《見證報》得著很多供應。史百克有關十字架的信息，頗有賓路易師母的風格，但是史百克爬得更高。史百克的信息登上高峰，讓基督在一切上居首位。

一九三三年六月，倪柝聲應美國芮文派弟兄會的邀請，到英國訪問芮文派在英國的數處聚會。訪問期間，倪柝聲在百忙中仍不忘和受恩教士的推介，悄悄地跑到貴橡路十三號基督徒交通中心去拜訪史百克。史百克恰巧此時不在倫敦，由其它兩位負責弟兄——伯得遜和岱勒——接待。正如前文所述，倪柝聲和貴橡路的接觸，掀起了軒然大波，芮文派在興師問罪之後，正式宣佈與倪柝聲決裂。

當一九三八年七月，倪柝聲再度訪問英國時，他已經可以毫無顧忌地、公開地與史百克交通。從此，兩人一直有信件往來，倪柝聲並尊稱史百克為年長的弟兄。倪柝聲這樣說：

「神叫史百克看見一件事，即神一切的中心都是在基督身上。基督乃是神的中心，也是神的普及。神所有的計畫，都離不開基督。我們應該少提那些零碎的真理，以及那些引起紛爭的道理，我們應該在各方面叫人看見主是在萬有之上，不讓自己有地位，讓神的旨意——基督——能在我們身上得著成全。」倪柝聲在英國期間，認識了英國一位元貴族的遺孀奧格夫人 (Lady Ogle)。若非奧格夫人奉獻一筆鉅款，買下倫敦東南部貴橡山 (Honor oak Hill) 一所空置的學校，作為基督徒交通中心，史百克不可能在一九二六年脫離賓路易師母之後，一下子就自立門戶，更不可能如此迅速將他在英國的事工，擴展為國際性的職事。史百克所出版的《見證報》，使數十個國家地區的信徒得益。

一九三九年中，倪柝聲結束了對英國的訪問，並在德文蘭 (Phyllis N. Deck) 和巴若蘭 (Elizabeth Fischbacher) 兩位姊妹的陪同下，離開英國。倪一到達上海後，於一九三九年八月，召開同工聚會，信息是「教會是基督的身體」。在奧格夫人財政上的支持下，倪柝聲開始培訓國內各地的同工，先後在上海蒲石路友



華村七號、十二號、十三號和愚園路七四九弄八十一號租下房子，開辦「基督徒交通傳道處」，仿照史百克主持的「基督徒交通中心」。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軍偷襲珍珠港，觸發了太平洋戰事。中國沿海一帶的商業活動，處於癱瘓狀態。同工們的生活，端賴教會的照顧；不過，寄望信徒十一的奉獻來維持，實有困難。倪柝聲給一位同工的信中這樣說：「教會的事務和這世界上的事，都壓在我的身上，超過我所能勝任的，但我仍要靠著主往前走。」

一九四二年初，倪柝聲認為，他的弟弟倪懷祖在澳門經營的生化藥廠，地理位置不適中，不能作全國性的市場推廣，應該遷移到全國的工商業中心上海。

許多坊間傳聞，說倪柝聲訪問英國回來，才成立生化藥廠。事實是，在倪柝聲第二度訪問英國之前兩年，即一九三七年，他的弟弟倪懷祖已經在澳門經營生化藥廠，生產一些家庭便藥。而一九三七年倪柝聲、倪懷祖的母親，當時住在九龍深水埗石峽尾街39號三樓，曾不時前往澳門探訪倪懷祖。

一九三九年五月倪柝聲從英國回到上海時，倪懷祖仍在澳門主持生化藥廠。

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五日，倪伯母、汪佩真和我父親曾從香港前往澳門，會晤了倪懷祖；那時澳門有聚會，參加聚會的就有五位是在澳門生化藥廠任職的弟兄。

一九三九年八月，倪柝聲弟兄在上海主持特別聚會，我父親才離開香港，前往上海赴會。

由於汪佩真，我父親知道生化藥廠在偏遠的澳門，無法開展業務。上海生化藥廠引起是非時，李淵如也有意見，但先父和汪佩真都保持緘默，這也許與他們兩人贊成生化藥廠從澳門北遷上海有關。

英國的奧格夫人（Lady Ogle）雖曾奉獻款項給倪柝聲，但其數目終究有限，不足以作為擴充生化藥廠和添置機器、設備、廠房的龐大資金。生化藥廠的資金來源，不少是聚會處的信徒認股籌來的，但絕大部分來自倪柝聲的堂兄倪樹祖。倪樹祖是上海市中國銀行行長。倪柝聲後來一度沒有專職事奉，卻抽身主持生化藥廠業務，成為他一生備受爭議的話題。

## 第十章職事的恢復

一九三九年底，為了安置外國差派到中國的同工，倪柝聲提議購買了亞爾培路培福裡的凡爾登公寓的兩套房子，作為這些西方傳教士的居所。另一方面，倪柝聲也關心國內同工們的生活需要，在全國兩百位同工中，差不多有四十位是由他直接照顧。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上海聚會處的外國籍同工們全部被日軍關入集中營。至於東北各地的聚會處，因拒絕向日本東京帝宮遙拜，受到殘酷的鎮壓。在上海，日本興亞院牧師阿木、鈴木等籌組基督教華東教團，但上海聚會處同工們、長老們堅持愛國立場，拒不參加，並停止文德裡的所有聚會，長達一年半之久。至於聚會處的擘餅聚會，則搬到常熟路榮康別墅俞成華弟兄家裡舉行。（上海的分家聚會是在勝利後，為了交通方便，於一九四八年，才分到十六家去的。）

倪柝聲一面在經營企業，一面又要以傳道禱告為事。這種角色的衝突，遂引起上海長老們的質疑和困惑；此外，他又將生化藥廠擴展到大後方重慶。在兩年多的時間內，他兩頭奔跑，往返于上海、重慶兩地。

這裡有必要用一點篇幅討論一下，神僕倪柝聲經營生化製藥廠是否恰當的問題。

從實際情況而言，倪柝聲為了照顧同工們的生活和教會的需要，辦藥廠似乎是為勢所迫；不過，事奉神的人不能專一以祈禱傳道為事，很容易被捲入人事的是非問題中。

聚會處的許多同工和一些全時間事奉的負責弟兄，效法弟兄會靠信心生活。對於他們的家人而言，靠信心實際上造成生活上的困苦，所以這些家屬——包括配偶和子女，可能不認同這種信心生活。筆者本人身為同工家屬就有同感，後來我們全家生活也是依靠先母辦企業支撐。同工織帳棚的作法是由倪柝聲提出的，倪柝聲五弟倪興祖的妻子倪徐恩秀姊妹也是以倪柝聲的高尚動機，作為倪柝聲興辦生化藥廠的理由。

倪徐恩秀姊妹這樣說：

「當時教會在各地非常的興旺，同工的需要也日益增長，照著倪弟兄從聖經所教導的和所實行的，在我們中間從來不向人募捐，當然也沒有基金、差會的支持，經常有眾同工在靠信心過生活而生計貧乏，多人因營養不良而生慢性疾病，以及兒女求學因貧困而作罷的情形。倪弟兄為此常常自責。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之下，倪弟兄開始了生化藥廠的事業。」

倪柝聲的二弟倪懷祖，得救後與倪柝聲、倪伯母——他們的母親，三人同日受浸。過了一些日子，倪柝聲才和王載夫婦一同擘餅。許多人談到倪懷祖時，只偏重于他和倪柝聲的親屬關係，而忘記了他是非常早期的一位弟兄。倪懷祖後來成為知名的化學家，有自己的發明，具有豐富的醫藥常識，並擔任上海聖約翰大學的化學教授。倪懷祖雖有學問，在科學研究上有成就，但不會做生意，倪柝聲在這一方面，覺得有必要幫助他，同時倪柝聲心底裡，想以企業的營利，來支持同工。

倪懷祖把澳門生化藥廠結束之後，首先在上海華山路常熟口租了幾間房子，開辦錫安化工廠，廠長由上海教會長老吳錫佑擔任。倪柝聲另從杭州請來張浩然弟兄幫助倪懷祖的製藥生意。

錫安化工廠畢竟是一間小廠，一間小廠擴展為一間大廠，實在需要資金。

許多人傳言，史百克匯給倪柝聲一千英鎊，這種傳言沒有根據。史百克和賓路易師母（Jessie-Penn-Lewis）分道揚鑣，在倫敦東南部的貴橡路開始聚會，在很大程度上因著奧格爵士夫人（Lady Ogle）的財政支持。我本人在貴橡路結識奧格爵士夫人，曾到過她在蘊莎（Windsor）的宮殿式城堡，深知她有雄厚的財力。

不錯，奧格爵士夫人曾匯給倪弟兄一千英鎊，這筆款拿來分派給同工，在當年可說是一筆可觀的數目，但是一千英鎊拿來擴廠，就是區區之數，還需籌措資金。倪柝聲於是在各地的聚會處向信徒招股，為的是積累更充裕的資金，以擴大藥廠的規模。各地的信徒的財力畢竟有限，這時候倪柝聲的堂兄倪樹祖，也出來支持倪柝聲。倪樹祖是上海有名的金融家，當過上海的中國銀行行長。一九四〇年，倪柝聲改組錫安化工廠，正式成立上海生物化學製藥廠，在膠州路三九七號租得大片的廠房和空地，倪柝聲任董事長，倪樹祖為主要投資人，由倪樹祖負責向銀行融資，倪懷祖仍任化學師，又延聘李升伯任總經理。逐漸地生化藥廠在全國藥廠中，論規模和品質，都位於前列了。

現在問題來了：倪柝聲曾是教會的領袖，為同工們籌謀一切，包括起居生活。像生化藥廠這樣的一個大型企業，當家的應是總經理，但倪柝聲出乎好心，過度關心，事事要過問，結果總經理李升伯辭職不幹了。結果，藥廠前後換了六個總經理，順序是李升伯、陸幹惕、楊世潮、梅以琳、殷祖瀾、張汝

勵。一九四二年董事會集體辭職，嚴重地損害了倪柝聲的形象。再下去幾年生化藥廠每年都虧本，紅利都發不出，許多人都到李淵如姊妹那裡投訴。同年倪柝聲到重慶和內弟張宜綸合開重慶生化藥廠，生產 D. D. T 和避倦丸等。與此同時，倪柝聲主動地停止了他在上海的公開事奉。

其實在倪柝聲的事業中，此時已埋下一顆定時炸彈。上海生化藥廠總經理張汝勵，是倪柝聲師母的叔父，實為中共地下黨員，一度被國民黨逮捕，寫過自新書自保。故解放後，張因歷史問題不被中國新政權重用，只任上海市參事。張汝勵為了邀功，不惜捏造各種罪名來指控倪柝聲，誣告倪柝聲為反革命分子。

抗戰期間，倪柝聲和他的妻舅張宜綸在重慶經營重慶生化藥廠。根據張宜綸的憶述：

「我在重慶時觀察倪弟兄作工的方式，從來沒有見過他以老闆自居，從未強使他的權柄。相反的，他親自設立榜樣：每日早起，工作時間有規律，不輕率作出決定，不隨意而行，不怠惰，他不因自己是老闆，便強迫別人去作連他自己也不願作的事。他總是親手作工，並教導職工一同作工時要溫柔、有愛心、忍耐並合作。」

在屬靈方面，張宜綸見證倪柝聲在重慶時如何彰顯了基督的品德：

「倪弟兄是一個完全被主浸透的人，也是一個活在主面前的人。他經過和受恩教士多年親手的培養，他的個性、性格，和行為改變了。他能虛心聆聽別人的說話意見，而不中途打岔。他這人內裡被主摸過，並因被對付而得了豐富的經歷。不然，像他這樣的天才，很難與像我這樣愚拙魯鈍的青年弟兄相處。」

另一位在重慶的張郁嵐弟兄，對倪柝聲在重慶的表現，印象也同樣深刻。

張鬱嵐作見證說：

「有一次，倪柝聲被他在重慶生化的下屬指臉拍桌子責罵，約有四個小時，鬧得鄰居皆抱不平，但是倪弟兄坐在椅子上，手持報紙，面不改色，若無其事，不時還要點一點頭，倪弟兄兩眼常常忽然望天，口中念說，祂是神，含意是人一切的遭遇皆在神的主宰安排之下，甘心接受順服這些遭遇。

「在重慶，弟兄們屢次請倪柝聲弟兄參加擘餅聚會，他卻只是坐在那裡，默默禱告，而不吃餅喝杯。他的原因是：上海教會中的問題尚未解決，不能在此擘餅。」

張郁嵐對倪柝聲在重慶的起居生活，作了細微的觀察，張如此評述：

「我觀察倪弟兄的生活，覺得他已學會如何處豐富，如何處卑賤，隨事隨在都學了秘訣。倪弟兄初到重慶時，住在一間角樓上面，只有一床一桌一凳而已。我去看他，登那角樓之時，木梯還會搖擺，又會吱吱作響。倪弟兄後來住入重慶的生化藥廠大樓，在他沒有兩樣，態度依然如前。關於飲食，他有時一餐只吃一個饅頭，喝點白水，有時也赴豐富的愛筵。這種隨遇而安的生活情況，他都處之泰然，全不在乎。」

倪柝聲恢復他的職事是從福州開始。他於一九四七年九月五日，在聚會中釋放信息。他說：

「我們讀羅馬書五章時，需要注意其中的原則與應用。這一章所啟示的原則，乃是一切皆是神的憐憫。使徒把這一個原則應用在以色列人身上，叫我們看見一切發生在以色列人身上，都是出乎神的憐憫。那裡說，不在乎那定意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發憐憫的神。只有聖靈才能引領人到正確的地步。一切都是在乎神的憐憫。我沒有得救以前，準備留學美國。假如早去兩個月，就不會與余慈

度小姐相會，或許就永遠不會得救。即使後來有機會，我也不一定能信，乃是神的憐憫叫我不早不晚，剛好在那個時候碰見余慈度小姐。……只有神的憐憫才能夠叫人真正的謙卑下來。」

一九四七年九月七日，倪柝聲再度在福州講道。在講道之前，倪柝聲點了弟兄會詩人郝爾頓（Richard Holden）的名作《耶穌基督親愛救主》（To Thee, Dear Lord, O Christ of God）。郝爾頓本是聖公會的牧師，他脫離聖公會，單憑信心，到葡萄牙作差傳工作。一八八六年八月，當郝爾頓在葡萄牙快要病逝之前，他對醫生說，我認識主耶穌共三十八年，我知道我是蒙祂所救贖的，如今，我是何等喜樂的去與祂相晤。

倪弟兄點郝爾頓這首詩時，郝爾頓已在六十一年前逝世，倪弟兄讀出詩歌的第一節

神的基督，榮耀的主，  
你的心慈，你恩溥！  
我們現在全魂、全心，  
到你面前來朝見；  
我敬拜你，讚美你，  
你的道路無可比！

倪柝聲讀完該詩第一節，說，詩歌裡所題的「神的基督」，我們常說神的兒子。神的基督乃是指為神所膏的，被神差遣完成工作的那一位。

那天的經文是馬太福音十一章一至十九節，說到施浸約翰曾為主作見證，卻因基督的工作絆跌了。以前施浸約翰說，他不配為基督解鞋帶，如今他差人去找基督，請祂老實說出來，祂是否基督……人常常預定好一個屬靈的人應該是如何如何，如果沒有合乎他們的觀念，他們就會被絆跌。

倪柝聲在福州恢復事奉之後，許多同工向他討教靈性的問題。一九四八年二月，倪柝聲在福州海關支巷四號召集福建各地的二十多位同工，進行為期十天的培訓。

一個月後，即一九四七年三月，有一件不幸的事發生了：倪柝聲在福州與張啟珍分手。這是倪柝聲在福州與王載、王約翰分裂之後，另一次重大的分裂。由於先父陳則信生前與張啟珍的關係非常密切，其密切程度不亞于先父與倪柝聲的關係。倪柝聲與張啟珍分裂之後，先父保持與張啟珍的交通，直到先父返回天家。

福州原有兩處聚會，一個在津門路，由鄭證光、唐一帆、徐紹華、張詩貞、江遵信等弟兄負責，三月三日，津門路聚會處幾個負責弟兄開會，同意將聚會交倪柝聲等年長弟兄帶領，但沒有通知另一聚會處——即球場後聚會處——的負責弟兄們，受到球場後負責弟兄張啟珍、施希增、倪玉龍等的責備。倪柝聲此時，對事工方面，在已往所主張的安提阿原則上，又提出耶路撒冷的原則。由於雙方不能同心，溝通上有困難，倪柝聲和張啟珍只好各走自己的路。

必須指出，勝利後國內各地教會的復興，是聖靈直接作工的結果。正如筆者在《宋尚節小傳》和《王明道小傳》所稍微述及的，與倪柝聲同代的神僕，曾有過失、失敗和軟弱之處，倪柝聲不是完人，同樣有瑕疵。但神滿有恩典，滿有憐憫，許多人在末了的日子，都得著恢復。至終是神得著榮耀，是神的名得著高舉。

倪柝聲在上海恢復職事之前，各地的土壤已經鬆動，到處結出福音的果子。先說南京的弟兄姊妹，他

們仿效二十年代初期福州大復興的作法，穿著福音背心，上街遊行。不久，南京的經驗被介紹到上海來，參加福音遊行的弟兄姊妹們，買了大鼓、小鼓、喇叭、擴音器等。上海福音隊的總領隊是張愚之，大隊長是交通大學助教萬紹祖，三個小隊的隊長分別為何廣濤、孫務信、張錫康。福音隊一路唱著「需要耶穌！需要耶穌」的詩歌，又喊著口號「上海人哪！趕快悔改！罪惡不去，平安不來！」「信耶穌得永生！」得救人數與日俱增。

在上海起始復興的時候，倪柝聲為了生化業務，不時往返于重慶、上海之間；至倪柝聲在福州恢復事奉之後，倪柝聲又往返于福州、上海兩地之間。倪在上海期間，大多居住在他五弟倪興祖的家裡。那些日子，上海的同工們，特別是汪佩真姊妹，懇請倪柝聲弟兄出來主持大局，帶領各地教會向前。不過，當時仍有許多在上海的同工們不諒解他。彼此之間經過了一些日子坦承的交通，同工們才一致接受倪柝聲的解釋，知道他當年辦生化，實有苦衷。倪柝聲在公開講道之前，先有幾次在華山路錢澤山弟兄家裡和少數兄姊有講話交通。

一九四八年四月初，來自中國各地的四十多位同工，聚集到上海，舉行同工聚會。在聚會時，倪柝聲請大家唱《葡萄一生的事》，當唱到該首詩第十五節時。同工們失聲痛哭。該節詩是：「估量生命原則，以失不是以得；

不視酒飲幾多，乃視酒傾幾何；  
因為愛的最大能力，乃是在於愛的捨棄，  
誰苦受得最深，最有可以給人。」

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日，倪柝聲向同工們交代了他經營生化藥廠的原委，倪柝聲這樣說：「我當年目睹同工們的家庭，經濟困難，營養不良。有些同工的孩子不能上學，肚子餓，在家裡哭。有許多同工因患肺病而逝世——包括福州的沈丁玲、浙江的韓復生等，我們當中一共有五個寡婦沒有人紀念；事實上，算起來，在我們同工中的寡婦，不止五位，有二十多位。這些姊妹的丈夫活著的時候，是拋棄自己的地位，辭掉自己的職業，但他們死了以後，都被人忘記了。同工們，我承認我們有缺欠，在工作，在奉獻，在主的恩典上，都有缺欠。當時我辦生化藥廠的時候，我的情形就宛如一個寡婦，帶著幾個孩子，盼望養活他們，但是養活他們的盼望不幸落空，因此寡婦就改嫁了。遇了一些日子，連孩子都沒有了。我看著一個一個同工的去世，我裡面生氣；也許我作了許多的錯事，但是神知道我為什麼緣故這樣作。」

說到這裡，倪柝聲一面講，一面哭，眾人也當場哭出來，會場裡一片哭聲。

翌日，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倪柝聲繼續帶領聚會，他的五弟媳，即倪興祖的妻子倪徐恩秀姊妹，憶述如下：

「當時倪弟兄住在我們家裡。他自己沒有子女，對我們的孩子特別疼愛。我還記得那天早晨他正要出門，我的次子天賜見到大伯，一定要他抱，倪弟兄滿面笑容地將孩子從我手中接過去，不多久他對我說：『恩秀，快把孩子抱去，我要趕去聚會，時間來不及了。』沒想到孩子用兩隻小手把大伯的脖子抱得緊緊地不肯放，我只好勉強地把孩子抱過來。我看他今早很高興，於是大膽問他說，大哥！我可以和您一同去參加聚會？他回答說，好。我們於是坐上吉普車，到了哈同路文德裡。我隨著倪弟兄進了會所，大吃一驚，原來今天是全國長老及同工聚會，照理我沒有資格參加，只見不一會兒，倪弟兄

站起來，帶著非常的心情，眼中含著淚，輕聲慢語一句一句地說，我開生化是出於不得已，我好像一個寡婦帶著孩子改嫁，因為同工的孩子都長大了，要學費上學，有些同工們因缺乏營養，病的病了，去世的去世了，我心中非常的難過。還有每次買會所都是老寡婦們拿出錢來，於是我對主說，下次買會所，我拿出錢來。倪弟兄講到這裡，全場弟兄姊妹痛哭、流淚。李淵如姊妹站起來請倪弟兄赦免她，李淵如姊妹說：『生化是生活。對我來說，長時間以來，這類的話我聽得太多了，實在是令人無奈。』」

讀了倪徐恩秀姊妹上述的話，讓我們重溫李淵如姊妹當日所說的：

「我從鄉下回來的時候，看見教會裡白髮的人多了。再一次回來，白髮的人更多。……我今天請倪弟兄赦免我已往的態度和言語，我也請負責弟兄們赦免我已往的態度和言語。我對倪弟兄作生意這件事是表同情的。關於生化的話語聽得多，叫我生氣，所以到後來這些氣都歸到倪弟兄身上。倪弟兄說，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我不是倪弟兄，許多的話我不能替他講。人家說倪弟兄錯，我怎麼能夠接受這種話？我不能把倪弟兄一個人提出來責怪，人是想要把我當作工具，來反對倪弟兄。對於生化，我說生化就是『生活』。我的存心對生化是不利的，對倪弟兄也是不利的。我不說我沒有定罪，我的確有過不去的地方，人去了生化，不進則已，一進就倒下去。如果這幾天早上的情形那個時候發生，這些話就不必說了。我巴不得我今天流的眼淚是最末一次的眼淚。」

李淵如說完話，倪柝聲當天就把上海生化藥廠的管理權交出來。倪柝聲說：

「我今天能夠說，我也擺上了。我是一個有感覺的人，我作生意是羞恥。我知道有人在生化這件事上有話，我也知道有人來詰問。但是，我冒著在路上別人不打招呼、不點頭的羞恥，我冒著寡婦出嫁的羞恥。到了這個地步，兒子沒有了，自己也不知道為著什麼在這裡。手裡好像抱著一個死孩子。我八年的工夫在弟兄姊妹面前抬不起頭來，難道我今天不能說一句：我也擺上了。」

原本生化藥廠的管理權操之于倪柝聲兩個弟弟——倪洪祖、倪興祖手裡，上海聚會處委出六位弟兄去接管。即馬萬春任總經理，單亦潔和沈榮慶任副總經理，江睡悟任營業經理，孫務信任廠長，張錫康任審核主任。

倪柝聲既放下了生化藥廠，就更專心於教會的事工，這時他對年青的弟兄姊妹說，奉獻一切，才能專心事奉神。

倪弟兄既然與同工們言歸於好，也就與同工們一起配搭事奉。他對同工們說，我們沒有一個人是為著自己，我們都必須為主而活，為福音而活。事奉神是最高的榮耀，是神高舉我們，優待我們。同工們同心合意的事奉，產生了驚人的效果，上海的得救人數一路上升，南陽路會所擠滿了四千人；另在虹口紫江路買了一個會所，可容一千人。

這次上海同工聚會又決定，成立執事之家。由於倪柝聲早已買下了福州鼓嶺的二十余棟房子，他決定拿來作執事之家，以便培訓同工。執事之家於是又稱鼓嶺同工訓練班。

倪柝聲恢復全時間事奉之前，靠著信心，已經作出了一些具體的、實質上的部署。包括奉獻了在福州的家族物業，購買了鼓嶺的二十多幢洋房。那些洋樓，是戰爭期間西方教士撤退賣出來的。

在臺灣工作的開展，也是首先由倪柝聲啟動的。早在一九四七年間，倪柝聲已在福州找過劉湛庠弟兄，鼓勵劉湛庠作福音移民，到臺灣從事差傳工作的。倪柝聲本人又隨著也親自到臺北視察。一九四八年，倪柝聲本人奉獻美金五萬元，買下臺北市上海路一棟日式塌塌米的房子，這是聚會處在臺北最早的會

所。初期聚會人數有二十多位。

一九四八年四月全國性的同工聚會之後，由於大陸政局突變，許多黨政軍人員，和學界人士，紛紛遷居臺灣，內中不乏基督徒，同年九月，曲鄒民一家到了臺北；十一月間，孫豐露、張晤晨、劉效良、馬癸春、沈嶽等抵達臺灣；一九四九年張郁嵐、張振也抵步，臺北聚會人數增至一百五十多位。在這一年，菲律賓的信徒林光華、劉碧人奉獻了一筆款項，購買了仁愛路二段的一片土地，建造了一個可容三百五十人的木建會所。

在倪柝聲的一生中，一九四九年二月，是一個關鍵性的月份，當時他第二次親臨臺北，住在張晤晨家裡，印證了趙靜懷、張郁嵐、張晤晨、孫豐露、劉效良五位弟兄為臺北教會的長老。

臺灣的禱人，在所著的《四十年來的回顧與前瞻》一書中，確認倪柝聲是神忠心的僕人，另一方面，榮耀卻該歸給神。禱人寫道，「倪弟兄的榜樣和他撒下去的種子，這四十年來在世界各地和中國不斷地發芽、生長和蔓延。究竟今天發展到什麼程度？真實數字沒有人能清楚，只有我們的主知道，相信有一天主會讓它顯明的。由此可見，主的工作是主自己借著祂無往不透的聖靈，運行在眾聖徒裡所作出來的，並不是什麼人可以特別居功的。若有人確是主忠心的僕人，在眾聖徒的良心和靈裡也是雪亮的。同樣，那些假冒或變質的工人和其工作，遲早也會敗露。」

倪柝聲從一九四八年六月至十月，在福州鼓嶺主持第一期同工訓練班。筆者的父母親，一起由暹羅的曼谷，前往鼓嶺接受倪柝聲的培訓。

訓練班實行家長式的管理，總家長為倪柝聲，下設分家家長，按房屋原主人的姓氏為各分家的名稱。一、白家家長為黃履銓弟兄，管理浙江、溫州地區來的學員；二、禪家家長為繆韻春姊妹，管理女學員；三、沙家家長張子潔，管理華北地區來的學員；四、何家家長為先父（陳則信），管理港澳及海外地區來的學員；五、吳家家長為魏光禧，管理三對夫婦及其孩子；六、倪家則為總家長倪柝聲的住處，倪柝聲常在倪家，召聞各家家長會議，商討培訓的有關事宜。此外，鼓嶺又設有診所，負責西醫的，是周康耀師母周李碧霞；負責中醫的，則為黃國斌弟兄。至於招待所，則由郁瑞姊妹和左弗如姊妹負責。

先父在他所著的《倪柝聲弟兄簡史》中，敘述了他在鼓嶺第一期同工訓練班時靈性上的轉變：

「我開頭參加兩次聚會，倪弟兄都是講到以弗所書第一章復活的信息。主立刻就給我看見：『不是養病，乃是復活！』並且那一個復活的大能，已經在我裡頭了！我相信這話，我感謝主，很稀奇，我的屬靈情形，就如同從死裡復活，立刻有了大的改變！我繼續參加聚會，主實在逾格地恩待了我。那四個月，成為我一生最蒙福的日子，也是我流淚最多的日子；我所得到的造就和供應，遠超過我所求所想的！我們在鼓嶺山上的生活，除了參加訓練聚會外，其它時間都是各人單獨地親近主，有的人在家裡安靜，有的人就在樹下或草地上，專心讀經、禱告，或唱詩。有一天，我在樹下尋求主的時候，主叫我遇見了祂。我從前真像約伯一樣，乃是風聞有祂，到了那一天，我才親眼看見祂！倪弟兄很注重個人親近神，注重每個人直接從神那裡得到啟示和光照。只有經歷的人才知道，他所說的是何等重要！並知道他的帶領是何等正確！」

## 第十一章 中國的耶路撒冷

鼓嶺第一期的作息時間是這樣安排的：每天早上八點聚會到十點，稍為休息後，再聚會到十二點，下午休息到三點，即分派工作，晚間亦有聚會。

倪柝聲在開始聚會時，說出了鼓嶺執事之家的功用：

「我們在鼓嶺怎麼作呢？是各地教會把當地有追求、有意事奉的人送來，給他們幾個月的幫助，再把他們送出去，讓他們在各地教會負責任。」

從人數上來說，上鼓嶺最多的是來自浙江的平陽地區，其次是廣東的汕頭地區。倪柝聲器重平陽地區的前輩弟兄黃履銓，以他為白家家長，又安排在汕頭負責過的先父為何家家長，實際上這些安排是順理成章的。

在鼓嶺第一期的學員中，來自浙江溫屬一帶的同工，占與會人數的最高比例，是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是具有代表性的。單是溫屬一帶，共有一百多處教會，還不包括其它浙江的縣份。浙江一省，也就被稱為中國的耶路撒冷。

以黃履銓為家長的白家，被稱「鼓嶺第一家」，學員人數多達三十多人。這些在鼓嶺被培訓的平陽同工，包括黃履銓、薛崇新、周達卿、蘇梯升、範佩真、周清玉、張悟生、林維中、吳新造、蔡琦、陳敬超、徐榮三、陳寶華等男同工，以及林金菊、蘇美秀等女同工。

這裡概述一下溫屬一帶教會成長的經過。

一九二五年，當倪柝聲主編的《基督徒報》在上海出版後，一些愛慕主的溫屬信徒讀了，大得幫助。神就借著倪柝聲在《基督徒報》釋放的亮光，開啟了浙江一帶一些弟兄們的眼睛。

一九二八年，倪柝聲在上海帶領第一次得勝聚會時，王天佐、張悟生兩弟兄前往赴會，會後把復興的火，帶到平陽，開始了南港鄉和蒲門鄉一帶的聚會。隨著復興的火的蔓延，更多的人得著聖靈的光照，決定走完他們從前所未走過的道路。

與此同時，陳欽法、王雨亭等弟兄，又在平陽的北港鄉、萬全鄉、江南鄉相繼建立教會，更把聚會點，擴展到鄰省福建的福鼎。

一九二八年秋天，在溫屬的橋墩門，有第一次的特別聚會，由於各地的同工們同心合意，聚會很有震撼力，與會者都得著生命的供應，參加聚會的同工，包括王天佐、張悟生、蔡際清、毛慶詩、蘇梯升、金子芳、蘇潔民等。

一九二九年正月，平陽地區的第二次特別聚會，增加了三位很有屬靈份量的同工——陳欽法、黃履銓、戴雲章，一九三〇年的第三次特別聚會，又多了林維中、王竹友、鄭盛助等弟兄前來參加。

曾參加過這三次溫屬特別聚會的，作見證說：

「三次的特別聚會，都有聖靈的同在，都看見聖靈在運行和作工。每次聚會參加的都是淚如泉湧的向神呼求，求神開眾聖徒屬靈的眼睛，能以看見神的計畫和心意，好使眾聖徒在真道上同歸於一。」

必須指出，倪柝聲的信息，一直是浙江一帶同工們的支配思想，和靈性的供應泉源。陳欽法於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二日給倪柝聲的信這樣坦述：

「弟兄靈中，環繞著一個甘美的思想，就是『基督的中心與普及』。在作工的時候，每逢提起這個信息，總是覺得有一種新鮮的意味和能力。哦！這個榮耀的真理，真是一般信徒靈性的泉源，尤其是同工們



作工的焦點。」

到了一九四八年，平陽一帶的教會，一方面蒙神祝福，增加到一百多處；另一方面，許多同工，息勞歸主，包括蔡際清、王天佐、王錦義、張明華、潘活靈、李樹人、傅宣羔等弟兄，和黃蘭如師母。最可惜的，是很有恩賜的兩位前面同工，王雨亭和陳欽法，也同樣離世與主同在，留下黃履銓，有獨木難支之感。

在鼓嶺，身為平陽地區的負責同工黃履銓，於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一日率先作見證：

「我是在無意中得救的，得救後我喜歡讀經禱告，自己想要作標準的牧師。後來我進神學院讀書，三年後畢業，被派出去作傳道工作。我讀到倪弟兄出版的《基督徒報》，得著很大的供應，看到了亮光，對真理有更透徹的、深入的認識。我於是前往上海，在哈同路文德裡倪弟兄面前受教。有一天，倪弟兄講到約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節，一粒麥子落在地裡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我聽了以後，就認識到什麼是復活，認識到復活的生命，所釋放的是莫大的能力。張光榮弟兄曾在浙江平陽佈道，說到事奉之人的標準，我個人實在覺得不配。我禱告主，使倪弟兄能帶領全國同工有聚會。主果真垂聽了我的禱告，在上海起始有全國性的特別聚會，我過去多有患難，遇見海盜三次，土匪一次，內戰兩次，自己又多病；但感謝主，都蒙主保守平安，我覺得年老，許多事可讓年輕人來作。但在事實上，教會的責任又在我身上，我不願意作，又不得不作，這是我的難處。」

黃履銓作見證時，在鼓嶺的全體學員屏息靜聽。這些年來，黃履銓長期駐守浙江平陽宜山耶穌堂，巡迴溫屬一帶講道，並探訪軟弱的和年老的弟兄姊妹。黃履銓熟讀聖經，查解聖經時，可說深入淺出，層出不窮，滿有亮光，實在是神賜給浙江的祝福。在他作見證時，吐露了時日不再的唏噓心態。

倪柝聲在黃履銓作完見證後，就對黃履銓作了屬靈的判斷和評語：

「黃履銓弟兄在浙江溫州一帶，是主要的負責人，絕不能退去。這些年間因著國內的戰事，同工們之間確實缺少交通。你對主的工作，天然的興趣減少了，這是好現象。一面你能由你的天然脫離出來，這是好的現象；一面你需要在復活的能力裡更積極。在主的工作，是會出現矛盾的情形。在黃弟兄身上，這種矛盾的情形更加突出和明顯。在這種矛盾的情形之下，你就會看見，你到底為著主有多少。然後，你才能清楚那一樣是更單純的事奉神。一面來說，你的事奉不是出乎天然的興趣，你作也可以，不作也無所謂，這是『死』的經歷。但光有死，沒有復活也不對，所以在另一面，在積極方面，你必須有復活生命的扶持，好使你比年輕時作得更多。我所擔心的是一個人重工作，但拿不出果效來。我們在神面前事奉祂，堅持為主工作，是責任的問題，不是喜好，而是責任。保羅說，若不傳福音，我就有禍了。若可以作，就有賞賜；若不可以，責任卻已經託付我了。這種矛盾加強了是好的。」

「一個人若是太重工作，就難以放手；若放手，又容易變成消極。神在許多時候，乃是領人經過暗的幽谷。王雨亭、陳欽法等帶頭的弟兄先後去世，平陽的教會缺少同工，黃弟兄頓覺擔子過於沉重，教會實在有難處。我要告訴黃弟兄，當你不喜歡工作時，正是要顯明〔你是否真正為著主。一個人年輕時，喜歡作這事，喜歡作那事，這乃是天然的力量。如今你年老了，情形就不一樣。只有在許多黑暗的日子裡，才能看見你有多少是為主的。恐怕少年時熱心所作的，沒有多少是為著主，許多是為自己，或者是為人。惟有當自己退出來時，才是主在裡面工作的時候，使我們越過越單純地事奉神。」

「黃弟兄，你要注意兩點，一是面對矛盾的生活，特別是在工作無興趣的時候，仍要堅持地作工；二

是在復活的生命裡剛強。對於第一點，你作時可能是失去天然的興趣；但對於第二點，你總要覺得我有責任，有託付，許多事非負責不可，不能讓教會塌下去。你要從死裡爬起來，面對教會的危機。有的人作工是有狂熱的，是有情欲的，若不讓他作，似乎是要他的命。弟兄，你要從工作狂、工作欲中出來，把這些天然的狂熱和情欲置於死地；但另一方面，你要在復活的生命裡得著能力，得到加強，要知道你乃是主的僕人，祂有要求、祂必加力。我們到年老時服事主，不是自己樂意與否的問題。就如彼得，主對他說，你年輕的時候，自己束上帶子，隨意往來；但年老的時候，你要伸出手來，別人要把你束上，帶你到不願意去的地方，正如約翰福音二一章所記載的。這時乃是一個主僕受試驗的時候。看見主的工作的需要和迫切性，而為主擺上，為主工作，這是奉獻最大的試驗。這時不是我高興作或不高興作的問題，乃是恩主要我作的問題。我為主而作，在我不高興時作，甚至比我高興時作，會作得更可靠。」

「我們為神工作，不是高興就作，不高興就不作乃是要在復活裡作，需要仰望身體的供應。復活是在教會裡，所以復活生命的供應也是在教會裡。你要靠著身體的供應，與眾聖徒一同沖過去。不要理會有興趣，或沒有興趣；有情感，或沒有情感。眾弟兄姊妹，就是那樣在教會中，靠著復活的生命，全體一同沖過去。保羅有一次也似乎是灰心了，好像說，工作要停一停。但使徒行傳十八章記著說，當西拉和提摩太從馬其頓來的時候，保羅為道迫切。保羅每逢安息日，都會在會堂裡辯論勸化。或者他曾經受挫，想停一停，或者他有時受壓，力不能勝；但當西拉和提摩太來到時，他就為道迫切，又講基督，題目不變。在此我們看到，在保羅似乎灰心的時候，兩個年輕的弟兄一來，保羅的靈又剛強起來了。對於你，黃弟兄，目前或者沒有兩個年輕弟兄來，但盼望以後會有。你現在若是退去，情形並不好。你若多看難處，又沒有得著復活的能力，那個難處就是死的，一無用處。你若能得到身體的供應，雖然你生活中的矛盾加增，天然的興趣在死去，但就是在這種死的情形下，能有復活能力的彰顯。」

在鼓嶺，倪柝聲在倪家召集家長會議時，擔任白家隊長的黃履銓和擔任何家家長的先父經常碰頭。黃履銓和我父親陳則信都是正規的神學院畢業出來的，他們若不是與倪柝聲同工，黃履銓會是內地會的牧師，我父親會是長老會的牧師。

鼓嶺第一期同工訓練結束之後，黃履銓回到平陽一帶，繼續牧養那裡的教會。過了沒有多久，倪柝聲又差派我父親到溫屬一帶去主領一次特別聚會。此時，兩位鼓嶺「家長」又在異地重逢。

一九五六年一月，倪柝聲在鼓嶺對黃履銓說的預言應驗了，黃履銓就如彼得，伸出手來，讓別人把他帶到不願意去的地方。黃履銓雖然被捕，溫州一帶的教會仍然蒙主祝福不斷茁壯成長。

為了撰寫這本倪柝聲傳，我翻閱了浙江各地部分同工於一九九四年編寫的《耶路撒冷遭難的日子》。這本小冊子出版時，已經與鼓嶺第一期的時間相隔四十六年，但他們的信仰還是那麼純正，對真道的認識還是那麼正確，對倪柝聲弟兄還是那麼敬愛，那麼懷念。他們在扉頁引述《耶利米哀歌》的話：

「我的眼多多流淚，總不止息，直等耶和華垂顧，從天觀看。耶和華啊，求你紀念我們所遭遇的事，觀看我們所受的凌辱。耶和華啊，求你使我們向你回轉，我們便得回轉，求你復興我們的日子。像古時一樣。」

最感人肺腑的，是這些在中國的耶路撒冷——浙江的同工，在《耶路撒冷遭難的日子》仍日夜思念著主，仍唱著感傷的《自伯大尼與我們分手後》（Since Long Ago at Bethany）這首詩歌。這首詩是倪柝聲

改寫的，原作者是波拿（Horatius Bonar）。

波拿於一八〇八年生於蘇格蘭的愛丁堡（Edinburgh），是長老會中最有恩賜的聖詩作者。波拿與倪柝聲有許多共通點，他們的一生都渴慕主的再來，他們的一生都對教會忠心耿耿，不貪愛屬世的名利地位，絕不看風轉舵，出賣原則。

倪柝聲的生平最喜愛的詩人中，波拿是其中之一。倪柝聲點唱詩歌時，經常點唱他親自翻譯的波拿的聖詩，包括《沒有血，沒有壇》（No Blood, No Altar Now）、《我們從前所有》（All that We Were）、《為著這餅和這杯》（For the Bread and for the Wine）、《主，在此，我要與你面對面》（Here, O My Lord, I see Thee Face to Face）、《求你揀選我道路》（Thy Way, Not Mine, O Lord）等。

時至今日，在浙江——中國的耶路撒冷，不論是在擘餅聚會中，或者是在禱告聚會中，都不時點唱波拿創作、倪柝聲翻譯的詩歌，思念波拿和倪柝聲的忠貞與敬虔。

這些鼓嶺第一期同工的遺民，在《耶路撒冷遭難的日子》中強調：

「這就是純正信仰基督教會的歷史，猶大為區區三十塊錢枉死樹下，千萬聖徒面對餓獅猛虎，焦黑刑柱，染血的鋼刀、長矛。只要他們說一句否認主的話，就可妻兒團聚，但他們眼望天上，神情安詳，站在前一位聖徒灑血的地方，安然等候那「最上算」的時刻來到，因為他們早已坐下算計好了。

在本書《倪柝聲傳》餘下數章仍未縷述之前，茲錄下中國耶路撒冷的遺民在《耶路撒冷遭難的日子》的哀鳴：

「苦難中的中國教會，剛有十多年的喘息，在傷痕累累中稍有建造，卻被那意想不到的飛來橫禍，弄得千瘡百孔，一片片尚未完工的耶路撒冷城牆，又紛紛被推倒在地。剛從被擄之地歸來的百姓，凡有心建造耶路撒冷的有誰不哭？有誰不向耶和華呼求呢？」

概括一句，讀了《中國的耶路撒冷》這一章，就知道倪柝聲的屬靈影響力，無遠弗屆，甚至可說是深入到世界上的每一個角落。

## 第十二章在鼓嶺所見所聞

在倪柝聲的一生中，他在鼓嶺對同工的兩次培訓是他事奉的高峰。

來自甘肅省天水縣的李因信這樣敘述鼓嶺第一期的聚會：

「每天第二個聚會，是個人的見證，和倪弟兄對個人的評語。每次只限一個人作見證，跟著解決他的難處，好像是神家中審判之實際學習。我自上山后，靈在神面前，漸漸蘇醒，近來有點往上爬。盼望我不再掙扎在消極對付中，而能在積極方面得到加強。」

再談談史祈生在鼓嶺的感受，史祈生被分配到沙家，家長是來自青島的張子潔，滌然在《主僕史祈生》中這樣撰述：

「一百多人聚集的場合，倪柝聲並不站在高高的講臺上大聲疾呼，而是坐在眾人面前，一杯茶在手，用慢慢聊的方式，娓娓道來。祈生形容倪柝聲的講道，好像剝洋蔥。你跟著他一層層的往裡剝，從一節聖經引進另一節，無法不服從他的帶領。剝下的洋蔥，片片可吃，香味撲鼻。」

從廈門前往鼓嶺，參加第二期一小段時間培訓的同工柯憐憫這樣追憶：

「倪柝聲弟兄在鼓嶺，一天三次，每次兩、三個鐘頭交通，連說了四個月，哪裡來的豐富和力量？我們想也想不來。但是看到生命的能力，吞滅了人的軟弱，我們的靈、魂、體，都蒙了恩，就不能不俯伏敬拜神。真的，若不是蒙了恩，人是受不了的。神的愛的價值是算不出來的。」

「有人以倪弟兄的工作為題寫論文來問我，要我提供資料。我告訴他：他的信息你還可以寫出來，可是他講的話有一個靈。這個，你寫不出來，如果你摸著這靈，你就得著造就，也得著光照。有一位姊妹，和我同是在鼓嶺受訓的，一回想當日在鼓嶺遇見的情形，就說，那些日子，天與地是連在一起的。」我的父親（陳則信），在他所著的《倪柝聲弟兄簡史》中，述說他在鼓嶺受訓的親身經歷：

「他所釋放的亮光是過去聞所未聞的。話語的能力有如利刃紮人心坎！聽完信息在禱告時，常有多人流淚痛哭！有好幾次他講完了道，全堂幾乎都僕倒哀痛著禱告，其情形宛如五旬節的再臨，聖靈同在是如此明顯，真像大風吹過能感覺得到一般！參加那次訓練的人，實在是太蒙恩了！」

鼓嶺兩期的同工訓練班開支龐大，沒有經濟上的實質支持是不可行的。當時在上海一些比較富有的弟兄，有李升伯、孫佳如、許石泉、楊世潮、楊玉樹等，也體會到倪柝聲經營生化藥廠，不是為了私利，而是為了教會事工的需要，此時也希望生化藥廠能夠有長遠的收益，就籌款借給生化藥廠買原料，生產 D. D. T. 和肺病特效藥 P. A. S.，並在報章大作廣告，來促銷這些產品。此時因倪柝聲已將管理權，由他兩個弟弟移交給六位主內弟兄，有關生化藥廠的閒言閒語頓然消失，倪柝聲本人可以全心全意地、專心地在鼓嶺領會；生化藥廠賺來的現鈔則定期地由孫務信和張錫康親自從上海坐飛機帶到福州，再捎上鼓嶺，應付鼓嶺執事之家的需要。

鼓嶺第一期於一九四八年十月結束，停歇了半年之後，一九四九年四月，第二期同工訓練又開始。第二期同工訓練在鼓嶺只舉行了三星期左右，就遷移到福州南台海關支巷四號，那裡原有三棟樓房，是倪家奉獻出來，作為執事之家之用。當時局勢動盪，吳仁傑、柯憐憫兩位同工提前回到廈門。從學員的背景資料進行分析，看出第一期和第二期的明顯分別。在鼓嶺第一期受訓的，許多是浙江平陽一帶的老同工，包括黃履銓、周達卿、蘇梯升、張悟生、蔡琦等；來自山東的同工有張子潔、孫豐露、張晤晨、劉效良、趙避塵等；來自上海的弟兄們幾乎絕跡，除了作記錄的周行義，只有作短暫逗留的俞崇恩、張錫康；但是在上海女同工繆韻春的率領下，上山的女同工，有左弗如、倪規箴、劉慧芬、吳佩雪、桂如玉、郭孩真、紀鐘毓等。此外，汕頭地區加上香港和廣州兩地，同工們的人數也不少。第一期的受訓同工，在區域上擔負責任的，除了四位家長，黃履銓、先父陳則信、張子潔和魏光禧，還有來自北京的閻迦勒、來自重慶的徐仲潔、來自新加坡的陸忠信，和來自菲律賓馬尼拉的繆紹訓。

在鼓嶺第二期，閩北一帶的有分量的同工，成為被培訓的同工的主流。聚會處在福州開始，但是倪柝聲在福州長期受到排斥，更曾一度被福州某些同工們開除。倪柝聲雖然諸多遷就，卻先後在原則問題上，與許多福州的同工們不能走在一起，包括王載、王連俊、丁素心、張啟珍等。在鼓嶺第一期同工聚會之前，福州教會又出現了分裂，津門路的聚會的負責弟兄，包括鄭證光、唐一帆、徐紹華、張詩貞、江遵信等，接受了倪柝聲的帶領，而球場後的聚會，在張啟珍的帶領下，加上倪玉韻、施希增等負責弟兄，表明要堅持自己的既定立場。

所以在鼓嶺第一期，閩北一帶的同工們不多，比較單薄，弟兄方面計有林維中、余篤信、黃國賦、鄭

光濡，姊妹方面則有郁瑞、周寄塵、黃安慧。

倪柝聲常引述聖經的話，說先知在本土往往不受尊敬。

正如上文述及，當倪柝聲在當年被福州同工們拒絕的時候，閩南地區和潮汕地區的同工們一致地支持了他。由於倪柝聲出生於汕頭，在某種意義上汕頭不啻是他的第二故鄉。

此外，從經濟的角度來說，在聚會處的心臟上海，即使來自南方一帶的弟兄們，在上海也非常樂意奉獻，包括來自汕頭的孫佳如和來自閩南的楊世潮、許石泉；至於上海聚會處在購買南陽路地皮時，來自菲律賓的閩南籍弟兄張興榮，就奉獻了那筆關鍵性的十萬美元。

在鼓嶺第二期，可喜的現象出現了：閩北一帶甚有分量的同工，一反第一期的現象，成為聚會的主力軍和有生力量。光是福州一地，就來了二十多位同工，計占第二期全部受訓同工的三分之一，包括陳恪三、陳必蔭、鄭證光、陳希文、陳貞藩、林子隆、鄭光弘、葉逢生、包幼道等。上海方面，則由靈性方面很有追求的俞成華弟兄和汪佩真姊妹領隊。

至於在地方上擔負帶領責任的，來參加鼓嶺第二期的，計有來自武漢的藍志一弟兄、來自長春的華天民弟兄、來自廈門的蔡志崇弟兄、來自南京的季永同弟兄和一位非常前面的，來自青島的女同工侯秀英。

以屬靈的年日，靈性上的經歷來講，鼓嶺第二期的學員比第一期的稚嫩，時至今日，由於年日的推移，許多當日的第二期的青年弟兄，至今多已經進入垂暮之年，部分甚至已經離世與主同在。無論如何，倪柝聲在鼓嶺的兩期培訓，以及在聚會時所留下來的文字記錄，不少且已被整理成書出版，供應了世界各地成千上萬的信徒，成為教會的祝福。倪弟兄所傳講的純正信仰，使許多地方的教會，不致落入異端的教訓裡。

### 第十三章在香港的部署

聚會處在香港，從一開始，就有一個好的起頭。一九三七年初，江德茂、陸忠信、魏光禧等弟兄，加上繆安信姊妹，在九龍南昌街一五五號三樓開始有聚會，神動了奇妙的善工，僅僅幾個月，聚會人數就猛增至二百人左右。

一九三七年底，神大用的僕人倪柝聲，樂非力和祂的使女于素真、李拉結也到香港來。一九三七年底至一九三八年一月，倪柝聲弟兄連續三個主日講道。在一月十日，倪柝聲乘船前往上海，留下他的母親和妻子在港，住在九龍深水埗石狹尾街三十九號三樓。當時，于倪柝聲的弟弟倪懷祖，連同張息吾、劉王安等弟兄在一水之隔的澳門經營生化藥廠，大小倪師母似乎有定居香港。

一九三八年一月，由於魏光禧移居雲南昆明，香港教會的主要同工是樂非力，其它同工有江守道、陳主言。姊妹方面，則有於素真，李拉結。

一九三八年二月，廣州的黃若琛姊妹，遷居到廣東中山良都竹秀園鄉郭海珍姊妹家裡，黃姊妹有負擔在竹秀園有一次傳福音聚會。

在黃若琛姊妹的邀請下，香港的樂非力和江守道前往竹秀園佈道。

當時我父親正在汕頭牧養教會，母親和我們幾個孩子則留在廈門鼓浪嶼，那段日子，父親因鼻竇炎，

在汕頭手術後流血不止，自忖在世日子不會太久，正為遺下妻子和幾個孩子而擔憂。這時他忽聞黃若琛在竹秀園有傳福音聚會，就趕到竹秀園會晤年青同工江守道，向當時仍未有小孩的江守道托孤。江守道於是應允先父，若先父有何不測，他會承擔陳家一家大小的經濟責任。

接著一九三八年七月、一九三九年五月、一九四〇年初，先父都到過香港佈道，最後與江守道前往新加坡。其後江守道從印度前往昆明，先父則由馬來亞轉入暹羅南部的那汶、宋卡，然後北上到暹羅京城曼谷，在浸信會的心聯堂講道。

一九四九年八月間，同工訓練班第二期在福州海關巷結束之後，倪柝聲重臨香港。

倪柝聲和香港有不解之緣，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底，一九三八年二月下旬，他都在香港釋放過信息，帶動了教會的興旺。此番到港，預感到香港在中國的歷史上，將起著關鍵性的推動作用。先父陳則信在《倪柝聲弟兄簡史》中如此敘述：

「神的帶領及管理，是何等的奇妙！倪柝聲到了香港，看見香港教會的光景，覺得這一個地方，必須加強，這裡的教會和事工。為此，他就寫信給我，要我離開廈門，來到香港。那封信好像是一道命令，也沒有徵求我的意思。同時一連好幾次打電報催我從速來港！我接到他的信，心中也非常清楚，覺得這是神的旨意，所以就立刻應命而來。」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八日，我父親帶著我祖母、我與兩個妹妹，和在鼓嶺受訓過的女同工柯翠瓊，乘船來到香港。接船的是父親多年的同工江守道。最初幾星期我們一家借宿于九龍佐敦道七號二樓的會所，住了沒多久，其時身在香港的倪柝聲，就為我們一家安排了居所。為此倪柝聲自己付出一筆可觀的頂手費，約等於六個月的租金，這筆款退租時結果不能取回來。當時倪柝聲安置我們一家住在九龍鑽石山上元嶺十七巷的菁社別墅，而倪柝聲夫婦則住在附近的寄廬。

倪柝聲在安頓好我們一家之後，就迫不及待地跟我父親商討省港澳一帶和海外的事情。

菁社別墅分兩層，我們租的是地下那層，中間是客廳，前頭兩間睡房，分別由我父親和我住，我的睡房搭兩張床，其中一張床是給張興榮用。後面兩間睡房，一間是我祖母（陳李蕉姊妹）住，後來張寶珠姊妹搭多一張床，另一間是我兩個妹妹（秀瓊和秀美）和柯翠瓊姊妹用碌架床擠在一起住宿，後來更加入了許美蓮姊妹，有時候張興榮自己下廚，請倪柝聲和一位英國女傳教士芮智英（Joy Betteridge）到我家來吃飯，我們三個小孩子要等大人們吃完了才能進食。我兩個妹妹比較調皮，曾搬凳子爬高去看倪柝聲的耳朵，我責問她們為何如此作，她們答說，有些弟兄姊妹說，倪柝聲弟兄比一般人聰明，因為他耳朵裡長了一顆黑痣。我聽了不以為然，認為這說法不科學，純屬迷信。

我生性較敏感，總覺得倪柝聲夫婦因膝下猶虛，後繼無人，在潛意識上多少若有所失，在這方面倪柝聲似乎有意對妻子張品蕙作出補償。

一個明顯的例子，是倪柝聲囑咐我改稱倪師母「裸母」。我母親（陳張雅淑）從鼓嶺下來後，一直逗留在泰國曼谷，在香港只有我父親照顧我們三個小孩子，但是父親身為教會主要負責人，要照管教會許多繁雜的事務，形成我們三個小孩子乏人照顧，這使我有空就多往寄廬那邊跑。住在寄廬的，除了倪柝聲夫婦，還有倪師母的弟弟張宜綸、張師母和他們的兒子張振融。由於張振融年齡與我相若，振融也就成為了我的玩伴。

我有一項喜歡的娛樂，就是下象棋；剛巧倪柝聲的堂兄倪承祖，也喜歡下象棋，我常常不理會倪柝聲

是否在意，就和他堂兄倪承祖在寄廬客廳下起象棋來。有一天，當我贏了象棋興高采烈時，作為裸母的倪師母從廚房走出來，完全忽略了他們的堂兄倪承祖，只管稱讚我聰明，又贊我小孩子說大人話。我雖小，卻也明顯覺得是倪柝聲叫他妻子要與我搞好關係。

倪柝聲和我父親都是香港教會的重要同工，當然有許多倪家的年長姊妹們，經常有事要找他們商量，碰見她們時，我為了討人歡喜，學會口乖，也稱呼倪柝聲的姐姐陳倪閨臣姊妹和倪承祖師母（倪陳慧宣姊妹）裸母。

沒有多久，倪柝聲即告別妻子，獨自回上海去。在他離開香港之時，他覺得香港教會的難處是信徒奉獻不徹底。香港弟兄姊妹相當富裕，多人擁有洋樓，而九龍佐敦道七號二樓的會所，卻連門口電鈴都沒有安裝，僅靠一條鐵線拉動小鐵鐘叮噠作響。倪柝聲認為，不是弟兄姊妹沒有錢，而是對神的教會漠不關心。

倪柝聲恢復職事後的一些表現，說明他對自己當年辦生化藥廠，並不認為是項錯誤。他認為自己當年辦企業的動機是為了神的工作，不是因著拜瑪門，並不是失去見證。因此，幾年前他與上海同工們冰釋前嫌，澄清誤會，消除間隔，完全是為了職事的恢復，是為了教會的合一，絕不是一項對罪的悔改。事實上，當他在鼓嶺主領同工訓練班時，之所以不必為錢擔憂，可以專心講道，完全得助於上海生化藥廠的盈利。當時多虧張錫康和孫務信輪流把現鈔從上海帶到鼓嶺，培訓工作才得以維持下去。故此，倪柝聲從香港北上上海後，又在上海開設了以琳印刷廠，以任鐘祥為廠長；又開辦翠華化工染料廠，以谷羽蒼任廠長；倪柝聲並在華中的武漢，設立璐珈藥廠，並以何廣濤、孫務信為正副廠長。

當倪柝聲重返香港時，他的頭髮長得很長，我父親問他原因；倪柝聲才說，因為在上海時太忙，甚至忙到了連理個發的時間都抽不出來。

倪柝聲跟著對香港的教會企業，作出了安排，即決定成立香港生物化學製藥廠。在興辦香港生化藥廠時，倪柝聲再三強調，香港生化藥廠的利潤，是為了支持國內的同工，及作推動國內福音工作之用。

香港生化藥廠總經理一職，由我父親（陳則信）擔任；家父不在港期間，由第二經理魏光禧（也是鼓嶺第一期學員）頂替；執行經理一職，由張興榮負責，張興榮是菲律賓的富商，負責籌集香港生化的資金。香港生化藥廠廠長一職，由倪的妻舅張宜綸出任，會計是倪柝聲的姐夫陳賢璋（即陳終道、陳供生的父親）。此外，倪柝聲又成立香港生化藥廠的營業部門——合一行，營業經理為廖作新，主任為楊志堅。

倪柝聲對香港企業的安排和部署，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因為我父親在香港負責教會工作，並沒有領取薪水或津貼，同樣家父在生化藥廠也沒有領薪水。我們一家的經濟來源，是靠我母親，她在泰國曼谷經營家宰兩合公司。

在香港，倪柝聲提到，事業應當怎麼辦才能得主的祝福？他說要根據使徒行傳二章四十五節、四章三十四節，按著各人所需的分給他們。當時定下的薪水，張宜綸、廖作新為港幣三百元，楊志堅為一百五十元，其它員工，包括倪連生（倪承祖的兒子，倪的侄兒）、陳慰中（我的哥哥）、林雙木等，一律為一百元。

一九五〇年二月二日，倪柝聲開始在九龍佐敦道七號二樓有聚會，他開頭就說：「這次來香港，我要說出真話，我對香港教會這幾年停滯不前的光景不滿意。我對香港教會一直未能復興，有些失望。」倪

柝聲這樣宣佈，是為十多日後安排我父親為第一長老定調子，並從側面批評魏光禧多年來未能帶領教會往前。當晚，倪柝聲又說出，從廈門調我父親到香港作教會領頭的原因：

「在神的工人中也有領頭的職分（leadership），許多人以為這些職分是因著年齡和恩賜，但我要說，這不在乎年齡、恩賜等，乃在乎在神面前的奉獻有多少。神面前奉獻得多，自然在神面前就有職分的顯明，你就能帶領神的教會或工人往前。你有神的光，你領頭了，人自然跟著，不會不服，你割自己最深，流出的生命就最豐富，人也能從你得著最多的供應。」

接著幾晚，倪柝聲談到奉獻，他說，神若肯悅納我們的奉獻，是祂的憐憫，是我們的榮耀。又說，我們就是跪著、爬著、俯伏到神的面前，也要求祂讓我們能事奉祂。祂若肯收納我們的奉獻，乃是祂憐憫我們，恩待了我們。奉獻是我們蒙了祂的恩。是神優待我們，肯收留我們。

當時許多弟兄姊妹紛紛寫字條，交出自己的財物、前途、一切。我雖然只是十七歲，也寫了一張字條給倪柝聲弟兄，表示要把自己所有的，包括所有的時間，所有的前途，所有的未來事業，交在主手裡。有一天晚上，倪柝聲對我們這些仍在學校讀書的青年弟兄姊妹講話。他說，你們要從現在起，就起首保守自己的清潔。你們要定意：有許多事我不願意碰，不願意摸，我站在外面，求神施恩給我，保守我清潔。我盼望你們能唱小姊妹達拉（Dara）的詩歌，這首詩乃是說到一個屬乎神的人對世界該有的態度。達拉可說是過去五百年中，靈裡最乾淨的人。約在五六百年前，白小姐（Miss Bride）為主大用，能行異能神蹟，有一次白小姐為小姊妹達拉按手禱告，使她天生的盲眼複明，那時達拉才十幾歲，當神蹟臨到達拉，達拉眼睛能看見了，她就大大欣賞日月星辰和世上一切的景物。但幾天後，達拉跑到白小姐那裡，滿臉憂愁；白小姐於是問達拉，你要我為你作什麼？達拉說，請你再為我禱告。白小姐問達拉，你還有什麼病嗎？達拉說，請你為我禱告，使我的眼睛複盲，因這些美麗的景色叫我偏離主的喜悅。後來白小姐就把達拉的話編成一首詩歌，倪柝聲又把這首詩歌，譯為中文，照錄如下：

一 世上景色我已一閱，求主使我目複盲；

不然我怕祂的喜悅，不如從前的顯彰。

（副）世上景色我已一閱，願你使我目複盲；

不然我怕祂的喜悅，不如從前的顯彰。

二 晨曦、晚霞、星光、雲錦，留等樂園再接觸；

今天在此祂的憐憫，已可滿足我盲目。

三 離開苦刺我今不望，甘心軟弱望加恩；

幔內交通無上榮光，依然照亮無眼人。

四 黑夜沉沉何等美麗，用心摸索不用眼；

祂受欺侮，祂被諷譏，我見祂的發光臉。

五 超過月亮，超過日頭，超過星河並雲霄；

乃是聖者披荊的首，所顯無比的榮耀。

儘管倪柝聲對我們在校的青年弟兄姊妹說，你們要保守自己的清潔。我卻由於天性敗壞，未能清潔，我在寄廬的客廳，找到一份小報《上海日報》，該報常登載有關上海的軼聞，倪柝聲來自上海，關注上海的動態，是必然的事。我在倪柝聲走出大門，就翻閱《上海日報》的副刊，內有鴛鴦蝴蝶派的言情



小說，我讀了津津有味，由於小說是連載，我每天例必在倪柝聲出門之前，從菁社別墅走到寄廬，等到倪柝聲出門，我才開始翻閱《上海日報》的副刊，追讀連載的言情小說。

有一天，我讀到言情小說的半途，倪柝聲突然折返，不說一句就從我手中拿走了《上海日報》，我覺得內心的隱秘被他識穿了，滿臉通紅。從這宗小事，可看出倪柝聲一直希望弟兄姊妹們存心清潔，以便毫無隔閡地親近神。

倪柝聲住在寄廬，起居簡樸，除了屬靈的書籍，和新聞報紙刊物之外，沒有任何不潔的誨淫的書籍，否則張振融和我，完全可以在翻箱倒篋中，找出他的把柄來，但他非但自己清潔，也期望我們這些後輩心裡同樣清潔。

對那次的特別聚會，倪柝聲要求很嚴格，每晚要點名，點名時要答出聲來，一沒有回應，大家就會留意到誰缺席了。

我記得一九五〇年二月八日晚上，那天是星期三，我想連連數晚有聚會，想放鬆一下，沒有去聚會。到了張興榮聚會回來，就對我說，倪弟兄對你很關心，在連連叫福中的名字之後，聽不到你答到，又重複地呼喚你的名字好幾次，顯出很焦急的樣子，倪弟兄對你的關心，超過對一般人的關心。我就查問倪柝聲當晚信息的內容，後來也借來講道記錄，想探測該晚是否有涉及我的內容。

該晚的信息，是說到青年人在前途上容易失敗的問題，倪柝聲要求青年人注意三件事：旅行、婚姻、職業。由於我當時才十七歲，還未考慮到婚姻和職業問題。那年，我正讀高中一，由於香港當時沒有中文的大學，我打算高中畢業後離開香港，到外地求學，看情況可能遠行。只是當時我作夢也沒有想到，過了兩年，在將高中畢業後，倪柝聲和我父親，會送我到遙遠的英國，並把我交給他們最敬仰的年長弟兄史百克（Theodore Austin Sparks）撫養。

一九五〇年二月十四日，倪柝聲弟兄對香港的長老和同工作出安排，他安排的五位元長老，順序是陳則信、魏光禧、曲子原、許駿卿、鄭謙原。倪柝聲又指出，長老們只負責香港地方的事務；但是同工們則要兼顧區域的事務。我父親身為同工，也就要兼顧廣東一帶和泰國各地教會的帶領。

不久，香港每主日晚，又有分家擘餅聚會，我們一家，被安排到九龍太子道二百九十號鮑志成醫生的家裡，這樣一來，我和媒母倪柝聲師母的關係更加密切了。我除了到寄廬串門之外，連聚會也和倪師母在一起。有一次，上海的汪佩真姊妹到寄廬住，我一到寄廬，倪柝聲師母就說，福中，過來，你小時在上海汪小姐都看到過你。想當年我才兩歲，舉家住在上海，我的二妹秀美就在上海出生，事隔十四年，我已經長大了，連汪小姐見到我也驚歎說，則信弟兄的兒子已經這麼大了。我父親身為香港的負責弟兄，見到汪小姐顯得很敬重，當汪小姐在佐敦道七號二樓向姊妹們講道時，我父親隔著布簾，細心聆聽，並且作了筆記。

一九五〇年三月中，汕頭教會致電倪柝聲，通知他倪伯母安息主懷；在這關鍵時刻，上海教會也來電報，催他回上海處理教會面臨的諸多難題。根據中國人的習俗，安葬母親，誠屬大事，這時他在家事和教會事務之間，必須作出抉擇。結果，他打了一封電報到汕頭，電文只有短短的六個字：「就地安葬謝謝」。下款並無署名。他先交代妻子倪張品蕙和大姐陳倪閨臣前往汕頭料理母親葬事。在她們兩位姊妹奔喪之前，倪柝聲於三月十二日獨自先回上海。（倪師母和倪大姐遲至三月十八日，才與林雙木弟兄乘搭「英航」客貨輪返港。）

在倪柝聲動身回上海前幾天，我父親勸倪柝聲不要回上海。我父親以哀求的口吻對他說，只怕你此番回去，再也出不來。我父親又直言，你將來必後悔。

在我父親苦苦勸諭之下，倪柝聲遂答應我父親說：「讓我打一個電報到英國去，請問史百克弟兄，因他終歸是我屬靈的兄長。」

恰巧在這時候，史百克患嚴重胃病，危在旦夕，正為是否聽從醫生意見，進行胃部手術，仰望神的帶領。後史百克接受手術，整個胃被切去三分之一，此後，史百克每餐不得進食太多食物，一餐要分成多次吃。

大難不死的史百克在手術後這樣說：「我感謝主耶穌留下我的性命，但我不知道主耶穌因何留下我的性命。主讓我多幾年存留地上，一定有其原因。」幾年後，史百克才恍然大悟，神留下他的性命，純粹是為了中國。

話說回來，當倪柝聲從香港向史百克致電的時候，史百克遠在倫敦，因患重病未能向倪柝聲提出自己的看法。在香港的倪柝聲於是單獨尋求主的心意，仰望主在環境上的帶領。末了，他作出決定，要與國內眾信徒同甘共苦，一起走主所命定的道路。臨離香港前，倪柝聲說，我的結局，不是被提，就是殉道。

#### 第十四章遭到了挫折

倪柝聲回到上海之後，重視屬靈的文字工作，加快了屬靈書籍出版的速度；另一方面，在人事上，也擴大了上海福音書房的建制。福音書房總編輯一職，由李淵如擔任，另外增聘唐守臨為總經理，汪以存為編輯，藍志一為會計。在書房任職的還有周行義弟兄，紀鐘毓姊妹、蕭自若姊妹、李銘約弟兄、陸耀華姊妹、黃得恩弟兄等。

在教會問題上，倪柝聲開始探討各宗派合一的問題。他所提及的合一不是口號性的，而是真誠的、實質的。他開始認識到，已往所強調的地方立場，不啻使聚會處成為宗派中的宗派，是一種閉關自守、眼光狹窄的作法。他竭力爭取楊紹唐、金罕、姜蒙光為同工，好一致對外傳福音。他真正爭取到的同工，有陳本偉、高晨光等。

倪柝聲還帶著唐守臨到上海新聞路內地會總部，與內地會的傳教士們交談。從歷史淵源上說，上海聚會處，從一開始，就有內地會傳教士祝康宥的參與；而後一階段，倪柝聲的得力女同工之一，就是內地會出身的巴若蘭。內地會既決定從中國撤出所有的西教士，就將一些內地會聚會點移交給聚會處。在內地會眼中聚會處是本色化的、信仰純正的教會。

一九五〇年六月，朝鮮戰爭爆發，中國展開抗美援朝戰爭。基督教的新派成員吳耀宗，聯絡基督教各宗派，成立「三自革新委員會」，以劃清和西方帝國主義的界限。倪柝聲的超政治立場，並不適應新的政治形勢，這給他內心帶來了極大的痛苦。

單純從信仰方面來審視倪柝聲，他是個十足的清教徒，清教徒主張政教分離，倪柝聲所傳的信息，在一般人看來，帶有濃厚的奧秘派的色彩。至於他所帶領的聚會，弟兄姊妹們之間的關係，具有平等的，互相關懷的特色。他們取消居間階級，不盛行牧師制度；在擘餅聚會、交通聚會、禱告聚會中，每個

信徒都有權利和機會禱告、分享，和交通。

不過，有一點必須指出，自從倪柝聲恢復職事之後，在教會中安排了長老、執事、家負責，教會實際上有了組織的雛形。在新政權的眼中，這種無形的組織，或者說這種沒有組織之名的組織，這種繁殖力強的有機組織，更需要納入國家政治的軌跡，這些聚會不應享有超政治的、不受政權操縱的超然地位。另一方面，倪柝聲復出之後，對他從前所著的《工作的再思》，作了補充。《再思》所揭櫫的地方教會立場，倪又作出了全新的修訂，即在安提阿的原則之外，加上了耶路撒冷的原則，從而使聚會處在中國政府眼中，蛻變為一個由上而下的金字塔組織。

倪柝聲在信仰上是清教徒；在政治上卻是新丁。換言之，他對政治的認識模糊，不夠清晰。

有一件事他處理得不好，給人留下把柄。原來倪柝聲為了保留鼓嶺的房產土地，好作教會未來培訓同工之用，就發動全國各地四百七十五個聚會處的信徒簽名。這件事做得不夠智慧。在倪柝聲個人來說，他這樣作是出於高尚的、純正的動機；在政府當局看來，是糾眾要脅政府，是違抗新中國的土地改革政策。更加離譜的是，為了迎合新政權的政治需要，倪柝聲和少數的同工們，又在各地信徒不知情的情況下，把這份32782人的簽名名單，作為各地信徒贊同加入三自教會的表態。這種移花接木的作法，倪柝聲固然有責任，其它在上海有分參與和獻計的同工們，也難辭其咎。

在解放初期，全國房屋登記管理方面仍未完善。倪柝聲當日號召信徒保護公民合法的財產權無可厚非。只要聚會處的反革命罪名得著洗刷，冤案得著平反，憲法已捍衛了聚會處的業權。

這樣採用人的辦法和頭腦，以移花接木的辦法來解決問題，並不討主的喜悅。當時一些不負責任的刊物，毫無實據地，抓住機會，憑空捏造一些消息，來攻擊倪柝聲。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二日，於同月出版的《敞開的門》第二十二期發表《幾句迫不得已的話》，全文如下：

「近來外面有的刊物，責難到我們的見證，並攻擊我們的同工倪柝聲弟兄。我們對於這樣的刊物，一向是抱靜默的態度，不樂於爭辯。因我們一面願在主面前學功課，一面也願讓主自己來替我們證明。總之，將來在基督審判台前，各人的心懷意念都必要顯明出來，但願主憐憫我們，叫我們不敢不敬畏祂！不過對於倪弟兄個人，我們在主面前都能同心見證，他是神的一個忠心的僕人。他雖然經營生產事業，但他的目的從來沒有為著他個人的什麼，在真理上，在事奉上，在經營生產的事業上，我們和他都是同心合意的。特此敬告凡關切到我們的弟兄姊妹，也請你們為我們代禱。」

唐守臨 俞成華 張光榮 江守道  
杜忠臣 許達微 朱 臣 張愚之  
繆韻春 李淵如 汪佩真 張耆年  
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二日

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二日上海軍事管制委員會辦理「接受外國津貼的宗教團體」專門登記時，倪柝聲對上海的各長老說，過去我個人曾接受過弟兄會芮文派和貴橡路督徒交通中心的奉獻。但這是我個人的事，與教會無關。南陽路的教會一直是自治、自養、自傳。在這一點上，倪柝聲所說的符合事實，絕無欺騙成分。因此，上海聚會處的長老，包括俞成華、朱臣、杜忠臣、唐守臨、張愚之、顧柏濤、任鐘祥等，發表聯合聲明：「按本教會是中國信徒自行設立的宗教團體，一直自治、自養、自傳，亦未

與任何外國差會發生關係。」

政治局勢演變之迅速，遠遠超過倪柝聲的想像，實非他所能適應。不過，倪柝聲為了追上時代，學習新思維，儘量調整自己。問題在於，他所持守的信仰和概念是如此根深蒂固，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變的。何況，要在基要的信仰上不妥協，他需要確定自己的底線。這確是一場痛苦的思想掙扎。

一九五一年四月十六至二十一日，政務院文教事務組宗教事務處在北京召開了「處理美國津貼的基督教團體會議」，參加的基督教領袖有一百五十一人，倪柝聲也被邀請，以觀察員身份參加。會後所發表的宣言，說明了一件事，即基督徒不能置身於政治之外。新的政治環境，不容許任何基督徒置身度外，以超政治的身份自居。截至一九五一年四月，在全國有一千多個聚會處，弟兄姊妹人數高達九萬多人。一九五一年八月二十日，倪柝聲在上海的弟兄姊妹面前，作了一次石破天驚的講話，他說：

「從北京會議之後，我回到上海，我裡面起了一個極大的爭執，或者說是起了一個極大的思想鬥爭，就是到底我們『超政治』可以不可以。……你們知道在這三十年中，我們完全傳宗教，不摸任何其它的事。我們好像對於所有的事，都不感興趣，只感覺宗教的事有興趣。今天呢，好像三十年工夫中所有的一切都起了搖動。我在北京所聽說『超政治』是錯誤的，這叫我覺得非常為難，因為我沒有認識超政治是錯誤的。我是心臟有病的，這一次心病又發。我在這麼多年之中，經過了許多的事情，卻從沒有作過絕望的禱告，但是這一次我禱告，求主接我回去。還有一個難處，就是最近的時候，聯絡員特別提起應當控訴美帝國主義如何利用上海地方教會。我覺得如果要我起來這樣控訴，是叫我撒謊。弟兄們，我實在是難過，我覺得我如果為要避免人的審判，而落到撒謊的地步，那是我作不到的事。所以又有一個禱告：『主啊！求你接我回去！』……這幾個基本的問題，叫我覺得非常困難，困難到盼望早日離世。」

在這篇《我是怎樣轉過來的》的講話中，倪柝聲的結論改變了他多年來所持守的理念。他說：

「我現在是轉過來了，但是這也不是一下子轉過來。我們已往認為信徒是能夠超政治的，如今我看見信徒是不能超政治的。一個人是自然而然的，不管你知道也好，你不知道也好，你覺得也好，你不覺得也好，總有某種政治的觀點。你不能說你相信了耶穌，就沒有政治的觀點。……就如我們的三自，從宗教的觀點上去看，我們的確確已經三自三十年了，但是從政治的立場上看，我們的三自，連一天都沒有起頭。……從我們基督徒的角度來看，有許多東西是神聖的，聖經是神聖，禱告是神聖的。從帝國主義的眼光來看，沒有一樣是神聖的。任何東西能夠達到它的目的都可以利用。在帝國主義的眼睛裡沒有一樣神聖的東西，只要能達到目的就要利用。……所以你們必須有反帝的立場，有人民的立場。」

有的人為了本身的政治立場，在海外不承認倪柝聲曾發表過《我是怎樣轉過來的》。但事實終歸事實，最近靈石出版社編的《王明道日記選輯》一書中，也述及倪柝聲曾寫《我是怎樣轉過來的》，是為佐證。另有一班人，說倪柝聲全盤抹煞了西教士對中國教會的貢獻，抹煞了和受恩教士和其它西國傳教士早年對倪柝聲的幫助——靈性上的和實質上的，其實不然，倪柝聲在政治立場上進行再思時，並沒有出賣福音派，也沒有全盤抹煞了某些福音派宣教士歷來對中國教會的貢獻。他在《我是怎樣轉過來的》，這樣結語：

「但是我們要清楚，反帝不是排外，不能把一切西國傳教士都看成是帝國主義，當然百分之九十以上

的傳教士是站在帝國主義的立場上，但那些徹底奉獻一切，撇下一切，為愛人民的靈魂來傳福音的人，不至於站在帝國主義的立場上，但這是極少數的人。」

倪柝聲雖然轉過來了，但是轉變得不夠徹底，政府當局對他仍有保留，仍在密切地觀察他。另一方面倪柝聲發覺到聚會處後繼無人。這時他幡然覺醒，已往他反對神學院，認為辦神學院是錯的，此時反而覺得要盡速成立神學院，為教會培養新一代的教牧同工。他為此專誠拜訪了楊紹唐，想與楊紹唐聯手創辦神學院，為時已晚。

實際上，倪柝聲也無法完全否定神學院的功用；倪柝聲的幾位重要同工，汪佩真、家父陳則信、閻迦勒、黃履銓、繆韻春，都來自神學院。倪柝聲的恩師和受恩教士也出身于神學院。不錯，倪柝聲生前來不及辦神學院，但鼓嶺第一期和第二期的訓練，就具備了神學院的雛形。他晚年與楊紹唐辦神學院不遂，至今多數人不知這個歷史事實，也就不見報導。

倪柝聲除了在政治立場上的再思，承認已往超政治的立場是錯誤的，連帶地，他也立意從生意中抽身，不再介入企業上的經營。已往，他贊同使徒保羅織帳棚的作法。不過，保羅織帳棚畢竟是個人的操作，是個人的兼職，如今生化藥廠這類大型企業，涉及數百人複雜的人事關係，無法避免一些是非問題。此外，大企業還要面對股東的質詢、董事會的監管、政府對逃稅漏稅的查究等等。因此，轉變後的倪柝聲，完全贊成把上海生化藥廠合併到東北製藥廠，以正面的態度，積極地回應新政權所推動的公私合營運動。

在上海生化藥廠併入東北藥廠之前，上海生化副經理史濟湯以三萬美金買進一台高壓鍋，用來製造 P.A.S.。當時愛國心切的倪柝聲，一心一意要突破美國禁運封鎖，在國家外匯短欠的情況下，向香港的陳錫日弟兄借三萬美金，倪柝聲向陳錫日聲言，會以美金歸還。當年美金和人民幣官價的比率是一比二，黑市是一比十。在高壓鍋送達瀋陽的東北藥廠時，東北藥廠也同意付倪三十萬人民幣。一生謹慎的倪柝聲，就在東北藥廠進行五反運動時，被人檢舉他盜竊國家資財達人民幣二十萬。事實上，他在購買高壓鍋上並未得益，三萬美金悉數歸還了陳錫日。

有一件事，是別人罕有提及的，即前生化藥廠總經理李升伯，為上海紡織界購入數百萬美金的紡織機器。機器到達香港時，大陸變色，不義的人會扣押這批昂貴機器在香港，藉以牟利。此時李升伯適任香港永生布廠董事總經理，當時他與在港的倪柝聲常有接觸，在倪柝聲的愛國教育下，加上李升伯本人也是一個民族意識甚強的資本家，他既愛國，又公義，決定把全部留港的紡織設備送到上海。此項行動，為新中國的紡織工業，作出了極其重大的貢獻。

倪柝聲固然轉過來了，認識到超政治是錯誤的。中央政府也再三強調，說明共同綱領保障宗教自由。只是有一樣令人擔心的，即政府作出一項保留，聲言宗教自由為擁護政府的人所享有，而不為反革命份子所享有。這時，一些新派處心積慮地要把倪柝聲打成反革命分子，好使他不能享有共同綱領為他提供的宗教自由。有人首先要倪柝聲控訴芮文派弟兄會和貴橡路基督徒交通中心。倪柝聲控訴不來，他與芮文派來往時日甚短，早已斷絕了關係；至於他和貴橡路負責人史百克，從未談到政治的話題，史百克一直是一個主張政教分離，信仰純正的清教徒。

在摩登派的眼中，倪柝聲思考過多，不肯輕易就範，是不服從黨的領導的表現——此時新派控制了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他們一旦認為倪不服從領導，就予以無限上綱，說他陽奉陰違，是與政府

對抗，認定他是反革命份子，應該予以控訴揭發。

上海青年會的劉良模，於是發動一次控訴倪柝聲的集會，他搞來一個守真中學的學生吳維樽。吳維樽在會中站起來控訴倪柝聲所創作的詩：「我若稍微偏離正路，我要立刻舒服。」與會的弟兄們聽了，說這根本不構成罪證。有的弟兄姊妹動了義氣，非常激動，齊擁向前，搶去吳維樽的發言稿。王大和弟兄跳起來喊：「你控訴我們的信仰了！」劉良模也和吳耀宗一樣，屬摩登派，他們仇視福音派。在基要派眼中，摩登派的信仰不純正。

倪柝聲預感到，不久，自己將失去自由，有感而作了詩，共七節，茲錄下第一節和第三節：

一 自從當年橄欖山前一別離，  
至今你仍未向我們呼召；  
曆世歷代我們都求看見你，  
但你好像不聽我們禱告。  
景色雖美，你我何日才相聚？  
山水雖佳；你今在天何方？  
花香鳥語，不能使我有情緒，  
因我正在思念你的容光。

副歌 你來！你來！我們呼求你快來！

我們的心所有盼望是你來！

我們等候你快來！

一九五二年四月十日，倪柝聲在上海江西路生化辦事處被來自瀋陽的公安人員逮捕，被送到東北囚禁。五反之後倪柝聲又被押回上海，繼續審查倪柝聲的其它問題。

從一九五二年四月到一九五五年中，海外的信徒不知道倪柝聲在監獄裡的實際情況，時至今日，仍有許多有關倪在獄中的傳說是無法予以證實的。主要原因是審訊過程中，沒有任何律師為他辯護。許多罪證不是在現場搜查到的，是否栽贓，成為案件的關鍵。

## 第十五章深入研究傳記人物

幾乎所有的屬靈人物，都喜歡研究傳記人物，希望從其它屬靈偉人的生平和教導得著幫助和鼓勵。整本聖經羅列了許多傳記人物，四福音更集中述說了主耶穌的生平，可說是主耶穌的傳記。

我們若閱讀倪柝聲著的《七個金燈檯》（原名《教會的正統》），和《我們是什麼》，讀者們會發現，倪柝聲博覽群書，對傳記人物有廣泛和深入的研究。倪柝聲甚至對天主教中的奧秘派和敬虔派都有涉獵。這裡錄下他在《我們是什麼》中的一段：

「在天主教中間有一個新的發現，有一班屬靈的人被興起來，其中有莫林諾（Michael Molinos），為他們中間最屬靈的人。他於一六二七年出生于西班牙的沙拉歌沙（Saragossa），死於一六九七年十二月。一六七五年他所著作的《靈程指引》（The Spiritual Guide）出版，教導人如何捨己、如何與主同死。這本書在六年之內譯成西歐幾種主要的語言，包括義大利文、西班牙文、法文、拉丁文。這本書成為當

年一本極有影響力的著作。與莫林諾同時的有蓋恩夫人 (Madame Guyon)，她生於一六四八年，死於一七一七年，是法國歷史上罕有的屬靈偉人，她對於如何與神的旨意聯合，如何捨己等，更有認識。她所寫的傳記《馨香的沒藥》，是一本很好的、很屬靈的書。她的見證著作，非但影響了法國，也影響了全世界。

「此外還有法國的芬奈倫 (Francois Fenelon)，是法國甚有威望的主教，他竟肯為主受苦，付出重大代價，與受盡迫害的蓋恩夫人同工。神在天主教內部興起了這些人，釋放了很多屬靈的亮光。在當時的世代中，屬靈生命最深的人物，都是產生於天主教中；更正教在初期所著重的，主要是因信稱義的道而已。除了以上三位，尚有亞爾諾德 (Arnold Gottfried)，他曾著作了許多書，論及教會問題。亞爾諾德認為當時的教會已偏離了真理，而正確的教會，必須回到新約聖經的立場上，才能被建立起來。在這裡你看見有兩道水流：第一道水流是

從莫林諾、蓋恩夫人、芬奈倫等人流出來；第二道水流是從亞爾諾德所代表的人流出來。這兩道水流，以後匯合在一起，成了一七〇〇年間興起的非拉鐵非教會 (Philadelphia Church)，非拉鐵非就是弟兄相愛的意思。」

以上摘錄的是倪柝聲在《我們是什麼》一書中的片段，重點在於說明，他閱讀傳記時，思路清晰，邏輯性強，能夠融匯貫通，說出歷史是一脈相承，說出歷史是有其明晰的脈絡和軌跡的。

倪柝聲又在《怎樣認識自己》一書中，引述了一系列傳記人物。在該書裡，他說：

「在教會的歷史中，我們能看見許多最聖潔的信徒，因著他們看見神的光的緣故，知道了他們自己的軟弱和敗壞，我們底下要引述的人，誰能說，他們不是教會中最突出的人物呢？但是他們對於自己的看法，卻是這樣的卑微。這無他，乃是因為越親近神的人，就越知道自己的軟弱；越得著神亮光的人，就越知道自己的敗壞。驕傲、自是的人，都是因為沒有看見神的光。」

接著倪柝聲在《怎樣認識自己》裡，引述了歷史上的八個偉人，他們是馬丁路德 (Martin Luther)、約翰·諾克斯 (John Knox)、本仁約翰 (John Bunyan)、喬治·懷特腓 (George Whitefield)、亞古士督·托普雷狄 (Augustus Montague Toplady)、約拿單·愛德華滋 (Jonathan Edwards)、大衛·布萊納 (David Brainerd) 和戴德生 (Hudson Taylor)。

由於篇幅關係，這裡不轉載倪柝聲在《怎樣認識自己》一書中，對這八位屬靈偉人的簡介。我在基督徒出版社的《屬靈偉人小傳系列》中，已經出版了八位偉人中的六位的小傳，還有亞古士督·托普雷狄和大衛·布萊納的小傳仍未推出。

倪柝聲既熟讀了歷史上許多屬靈偉人的傳記，又盡其所能把他所學習到的心得，與弟兄姊妹們分享。一九五〇年二月三日晚上，倪柝聲在九龍佐敦道七號二樓講道，當晚我也在場，他介紹了一位華人佈道家樂非力，內容如下：

能很坦率地向你們見證說，樂非力是很早就把自己奉獻出來，變賣一切為著主的人。他在屬靈上是一個很強、很肯出代價的人，他有許多東西是信主的第二天就交出來或者了結的，包括他擁有的煙廠結束了。樂非力在東北三省被號稱香煙大王，轄下的煙廠沒有一間是小規模，共有二十七處分公司，一百多處代售所，但他信主後一兩天就不計代價地把全部煙廠關門。在此之前他所拖欠的債他都償還，至於別人欠他的，他一概不討還。樂非力弟兄是一位頂會給人的弟兄，有一位弟兄向他借一百元，那

時他口袋中只有二十元，他就把家中僅有的一張俄羅斯製造的、頂好的絨毯子拿到當舖當掉，湊足了一百元給那弟兄。等一下樂師母回家了，到臥房裡一看，絨毯子不見了，就追問樂弟兄，樂弟兄就安慰她說，我們乃是給主。我們是主的僕人，乃是事奉主，理當盡我們所有的奉獻給祂。樂非力作為我的同工，在配搭事奉時，顯出他是捨己的人。他在好多年前曾到香港服事主，在經濟上不知道受到多少的試煉。他原是東北的大財主，竟甘心為主自願成為貧窮。樂非力弟兄不僅愛主，許多人能見證他真是愛弟兄姊妹，是徹底脫離自己的人，神借著他，拯救許多人、造就許多人。在此我們看見有一位弟兄脫離瑪門，就能愛主、愛弟兄姊妹。斷沒有一個弟兄是斤斤較量而能愛弟兄的。」

倪柝聲在不同的場合，說他虧欠樂非力弟兄，說他多年來在生活上照顧樂非力不夠，倪並承認樂非力是一個非常有能力的佈道家。

一九五〇年二月十五日晚上，倪柝聲弟兄在九龍佐敦道七號二樓續談傳記人物。在講道之前，他領唱羅伯斯（Evan Roberts）的詩歌《我王必定快要再臨》。該首詩共八節，這裡僅錄下首二節：

一 我王發定快要再臨，天空都滿了祂！

待贖宇宙快見光明，主要完成救法！

我已聽見祂的腳聲，在那彩雲中間；

我已看見祂的榮身，隱約顯露在天；

二 我今仰望我主「同在」，不敢懈怠一點；

我今等候我主再來，使我得著所天。

除了我主此刻就來，接我與祂同在，

除了這件美事以外，我心別無所愛。

唱完這首詩歌的第八節之後，倪柝聲開口說：

「這首詩歌的作者是羅伯斯，他帶進了威爾斯（Wales）的大復興。威爾斯大復興乃是從羅伯斯起頭的。羅伯斯沒讀什麼書，不過是個礦工；但是他帶進世界第一大的復興，就是威爾斯大復興。威爾斯是一個頂大的地方，羅伯斯則在一個小禮拜堂裡；他沒有講整篇道，也許只講五句話，或者禱告幾句。但會眾都是又哭又跳。他們沒有開會的時間和地點，無論在哪裡都可以聚會，無論什麼時候來，都可以有聚會，半夜可以，清晨也可以。幾乎在每一個家庭裡都有復興會，都有禱告。講道者在哪裡也不知道，因為有時候這一個人起來選一首詩讓大家唱，有時候有人起來讀幾節聖經。

「賓路易師母（Jessie Penn-Lewis），有貴格會背景，對自己很嚴緊，她也跑到威爾斯去看，看見那一個聚會真不像聚會，有的母親在那裡抱著孩子餵奶，有的人在那裡吃飯，有的人禱告，有的人唱詩歌。外面亂極了，好像作買賣似的。但賓路易師母見證說：不知道為什麼，在那裡有個頂莫名其妙的東西，是頂特別的；外面聽起來是頂吵，但在裡面他們是合一的。這是發生在一九〇三、一九〇四年的事。到了一九〇九年時，有弟兄們從英國去那裡訪問，有某城的牧師告訴來訪的弟兄說，我們這裡得救的人數一年少過一年，到這一、二年簡直就沒有人得救。訪問者說，那豈不是說，這復興退步了嗎？那牧師回答說，不是的，乃是因為這裡的人全都得救了。

「今晚我們在這裡唱羅伯斯的詩，能夠從詩裡摸著歷代以來最剛強的靈。羅伯斯能帶進這樣的復興，因為他是什麼都能擺上，什麼都能捨得，什麼都能不顧念的。」



「羅伯斯作的這首詩的第二節，『同在』在希臘文是 parousia，是指因著主的降臨，主的顯現，享受主的同在。主固然還沒有再來，但我們能夠把主的同在移來。這樣的同在，要使我们受捆綁，受祂愛的約束，不敢稍有懈怠。但願我們所有的生活工作，都受主同在的圍困、制約，不敢稍微偏離。」

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二日晚上，倪柝聲在九龍佐敦道七號二樓領會的時候，他首先點唱了英國的傑出詩人約翰·牛頓（John Newton）的詩歌。

這首詩分三節，照錄如下：

一 主，你得勝，我今服矣；恩典強迫我的心意，奉獻一切於你。

你的可怕我能久排，但誰能抗你的大愛？愛大，我無能力。

二 你若命你萬鈞雷霆，輦我靈魂向我施刑，我仍固執不悔；

但是憐憫征服我心，以往抵擋銷化淨盡，現今我恨我罪！

三 我今羨慕單獨歸你；主，來，佔領這個陋器，作為你的所有。

我既脫離撒但暴手，就願全人毫無保留，服事你到永久。

弟兄姊妹們唱完這首詩，倪柝聲開始說話：

「這是約翰·牛頓的悔改詩歌。雖然也有些人把這首詩歌當作福音詩歌用，然而這首詩歌在信徒聚會中吟唱時仍然極為有用，許多人從這首詩得著啟發，得著幫助。」

倪柝聲接著說：

「牛頓於一七二五年生於英國倫敦，他父親從事航海事業，常年在外，教養的責任全落在他敬虔愛主的慈母身上。她常帶著約翰·牛頓屈膝在神面前禱告祈求，她並教他讀聖經，牢記詩歌。當他七歲時，慈母突然因操勞成疾而病逝，這打擊使他步入歧途，十歲起就跟隨父親航海，在異鄉他過了二十多年流蕩的浪子生涯。他少年時就效法其它水手放浪形骸、酗酒賭博。他曾多次聽福音，每次聽時，就倍感紮心，憶起兒時慈母的容顏與教導，但他始終無法自拔，仍舊沉溺在罪惡之中。之後他在非洲從事販賣黑奴的勾當。結果卻鬧出事情，反而自己被賣為奴隸，遭到苦待、折磨。肉體與精神的雙重痛苦曾使他企圖逃亡，但卻換來剝衣鞭撻之苦。幾年後他父親才探知其下落，用錢把他贖回。

「就在他坐船返鄉途中，有一天忽遇暴風，眼見小船就要傾覆，但主耶穌就在這時答應慈母在他幼年時將他奉獻給主的禱告。一陣陣暴風猛烈的吹襲，竟吹熱了他冰冷的心。那激浪的搖撼，搖醒了他死沉的靈。他想到自己過去的犯罪作惡，想到年幼時慈母對他所講述的恩主愛他的故事，就是主耶穌是神的愛子，卻為他流血受死！這恩是如何的大！他不覺大聲地呼求主的名，向主禱告，悔改認罪而信主，接受主耶穌作他的救主。日後，他將自己完全奉獻，事奉主一直至死。

「約翰·牛頓寫了許多很好的詩歌，包括《奇異恩典》（Amazing Grace）。我們今晚選唱的這首詩，是他悔改時寫的詩。這首詩是關於悔改寫得最好的詩歌。這裡說，人雖然說地獄可怕，雖然說神的刑罰多可怕；但我不怕，你將奈我何？但神不是用祂的刑罰來威嚇人，乃用祂的恩典、祂的大愛，強迫人悔改。許多人信主進來，不過就是信主而進來，但是約翰·牛頓乃是順服而進來。保羅的悔改乃是被打倒了，順服而進來。約翰·牛頓也是這樣。我們如今吟唱這首詩歌，是應用在難以奉獻之時。」

筆者再三地述及倪柝聲在九龍佐敦道七號二樓介紹傳記人物的事蹟，因為這對本人有多重的意義，影響了我長大後也研究傳記人物。

一九五一年初，九龍天文臺道五號會所建成，佐敦道七號二樓，這個倪柝聲傳講傳記的歷史性場所，竟奇妙無比地成為我們一家七口——祖母、家父、我和四個妹妹——的住宅。每當我站在倪柝聲傳講傳記人物的位置，留連這年前的講臺，感慨萬分。我望向窗外，看到對面的佑靈堂（Union Church）——一九三九年七月九日王明道在該教堂講道時，我父親曾為王明道把國語譯為汕頭話。

我非但從倪柝聲口中聽到許多傳記人物，我一生也接觸到許多屬靈的偉人，同時也會晤過一些政治上的傳奇人物。在潛移默化中，使我對研究傳記人物情有獨鍾，從而喜歡閱讀人物傳記。長大後也從事撰寫傳記人物的工作，包括主編及撰寫《屬靈偉人小傳》。

## 第十六章 隱秘的事知多少

申命記二十九章二十九節這樣寫道：

「隱秘的事，是屬於耶和華我們的神。」

我的父親陳則信在東南亞作差傳工作時，適逢太平洋戰爭爆發，他於是由馬來亞輾轉到暹羅，戰爭結束後父親才回到福建廈門。

當先父決定攜帶我們全家到暹羅的時候，我只好從鼓浪嶼英華中學輟學。那時我並不喜歡離鄉背井，只是我們的腳步乃是神所規定的，完全不在我們掌握之中。

新加坡聚會處的陳鄭樹莊姊妹，還有她丈夫陳懷天，此時到暹羅教書。透過他們的介紹，我父親把我送到被稱為「暹羅華僑最高學府」的中華中學就讀。陳懷天是該校的教務主任，其妻子陳鄭樹莊則任該校英語教員。

我父母親和鄭張萍姊妹——鄭樹莊的兄嫂在鼓嶺參加第一期同工訓練的時候，暹羅的鑾汶元帥實行排華政策，於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五日查封了中華中學。

中華中學被查封閉時，父母親正在鼓嶺。有一天，我在家時，突然看到自己滿身污穢，由於我從小聽過福音，知道唯有倚靠主耶穌的寶血，我的罪才能得著赦免，我於是向主耶穌認罪並接受祂為我的救主，同時我也把自己奉獻給祂。

為了繼續求學，我就回到汕頭。我一到汕頭，就寫信給在鼓嶺受訓的雙親，請求他們的指引。他們於是把我回到汕頭的情況，告訴了倪柝聲。倪柝聲看著我長，在廈門、在汕頭，在上海，他都到過我家，甚至住我家裡，讀者可以從我父親寫的《倪柝聲弟兄簡史》中瞭解詳情。起初倪要我上鼓嶺與父母住在一起，過了天，他們又覺得一般學校九月開學，而鼓嶺又沒有一所較像樣的中學，遂吩咐我暫時留在汕頭。我於是報讀汕頭的韋懷中學，在韋懷同班的有來自曼谷中華中學的同班同學林少明和羅楚榮。韋懷中學的校長是國民黨的死硬派卓效良，而當時的汕頭又在喻英奇的極權統治之下。我在汕頭，與一些年弟兄姊妹作露天佈道。我當時只有十五歲，一穿上福音背心，就在中山公園傳福音，我說國語，由林雙木翻譯成汕頭話。我也曾到汕頭的醫院，向從前線撤退下來的國民黨傷兵傳福音，內中有一位彭勉奇，聽了福音後信主得救，後來成為我父親在香港的同工。在汕頭，我由蔡寄廬給我施浸，歸入主的名下。

在上述的情況下，我沒有想過——實際上，也沒有必要——向任何人供述我出身於左傾的、進步的中

華中學。至一九四八年七月為止，中華中學校友總人數為一千三百一十七，我是其中的一個，這是一件無法否認和抹煞的歷史事實。這是非常私人的事，更加不適宜向汕頭的任何人披露。而倪柝聲弟兄遠在福建鼓嶺，我更沒機會向他陳述這一切。我個人覺得，我沒有刻意向倪柝聲隱瞞既往的一切，因為隱秘的事，是屬於耶和華我們的神。發生在每一個信徒身上的事，都有神的美意，冥冥中都是神的安排。正如羅馬書八章二十八節所說的，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

黃得恩於一九九六年十月十二日致史伯誠的信中，透露了一個歷史秘密，即黃得恩參加鼓嶺第二期訓練時，他親耳聽到倪柝聲在鼓嶺用兩晚時間，講及倪柝聲在抗戰時期及抗戰後，曾跟中共地下黨組織有接觸。倪柝聲並吩咐黃得恩等人不要寫下這兩晚講話內容的筆記。問題在於，中共中央檔案部門，整理中共地下黨南系的檔案時，有否發掘出倪柝聲與地下黨發生關係的筆記，又中共中央社會部封塵的檔案中，在時機成熟時，會否公開倪柝聲的檔案資料。

我父親在《倪柝聲弟兄簡史》中，提到倪柝聲調到香港的簡單過程：

「第二期鼓嶺訓練結束後，來參加的弟兄姊妹先後離開，倪弟兄也來到香港。神的帶領及管理，是何等奇妙！他到了香港，看見教會的光景，覺得這一個地方，將來可能成為主見證上一個很重要的地方。必須加強這裡的教會和工作。為此他就寫信給我，要我離開廈門來到香港。那封信好像是一道命令，也沒有徵求我的意見。同時一連好幾次打電報催我從速來港！我接到他的信，心中也非常清楚，覺得這是神的旨意，所以就立刻應命而來。」

我在這裡要補充我們一家未來香港之前，在廈門鼓浪嶼發生的隱秘的事。

有一晚，我父親在鼓浪嶼黃家渡的聚會處講道，聚會完，我伴隨父親步行回住宅時，有一位元在廈門中南銀行服務多年的單亞生弟兄突然要我們到他家裡去，說有重要的話要跟父親說。我們到了單家，單亞生對我這小孩子在場，並不在意，其時我才十六歲。從小我就和他兒子單寄平為伴，也曾到過他家裡住宿過夜，故單亞生對我也就絕對信任。單亞生以十分嚴肅的態度對先父說，他實際上是中共的地下黨員，由於廈門的國民黨特務其時正搜捕中共地下黨員，他不日要到漳州避一避。在場的只有三個人，我父親反應平靜，默不作聲，我則大吃一驚，想不到單亞先對我父親這樣信任；另一方面，我更想不到遠在曼谷的中華中學，近在鼓浪嶼的黃家渡，都有共產黨人。

我們一家到香港後，在搬進菁社別墅之前，曾有一段短時間住在九龍佐敦道七號二樓；而單亞生一家，在解放後，也在我們抵港後不久，借道香港和我父親小敘數天，然後北上，後來在中央財政部任職。述說這件事，是要說明：聚會處並不是一個反革命集團，在聚會處的信徒當中，有不少是熱愛國家，忠心於人民的。

一九五〇年二月初，倪柝聲在九龍佐敦道七號二樓開始講交出來的信息之後，我作出回應，把自己奉獻給主，當時並沒有人要求我交代自己的歷史，更沒有人要求我述說自己的思想狀況和政治觀點，何況當年我只有十七歲，我又是教會領袖陳則信的兒子。在教會弟兄姊妹的眼光中，我的出身最為清白單純。

到了一九五二年初，在倪柝聲弟兄失去自由時，我正在培正中學讀高中三，此時突然收到一封信，安排我到英國讀書。我從來沒有想到倪柝聲弟兄會真正留意我的前途。以往，我曾感到倪弟兄在暗中注

意我，暗中關心我，並有意培養我，如今我的揣測被證實為準確的。

更加令我驚喜的，是倪柝聲和家父把我交托給他們一直尊崇和敬愛的史百克弟兄，史百克被委託為我法定的監護人。一九五二年八月二十八日，我乘搭 Corfu 號客輪前往英國，同行的有培正中學和我一起畢業的趙世彭、趙世儀兩兄弟。同船的還有聚會處的王鎮輝，和一位曾在安徽大學任教授的任納（George Rainer）。

在船上，任納對我說：「Cepher（我的英文名），一到英國，我們一起去拜訪陳源，他別名陳西滢，是中國常駐巴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代表。」一切的事，其實都有神暗中的安排。我在到達英國之前，從來沒有想到會和法國結下不解之緣，任納說起陳西滢時，又說到陳西滢人住在倫敦，卻在巴黎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任職。這個新「雙城記」，在年僅十九歲的我，聽起來新鮮，卻沒有想到，同樣的事會出現在我的身上。

原來倪柝聲認識前南京中國銀行程覺民；而倪柝聲的堂兄倪樹祖則是上海中國銀行行長，當然也認識程覺民。程覺民在香港期間，和我父親交往頻繁，當他獲悉我在英國讀書的時候，建議我去拜訪中華民國駐法國大使段茂瀾，說段茂瀾是他好朋友，他會直接另寫一封信給段茂瀾，段茂瀾確是盛情招待我。就這樣我在法國巴黎有了兩道重要的人事關係。

至於國際刑事員警委員會（International Criminal Police Commission），在我出生之前十年——一九二三年是由維也納警察局長約翰·蕭柏博士（Dr. Johann Schuber）發起，約翰·蕭柏曾於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〇年出任奧地利首相，在歐洲甚有威望，順理成章地，當年國際刑事員警委員會的總部也就設在維也納。約翰·蕭柏出任國際刑事員警委員會第一任主席。

戰後的一九四六年，召開國際刑事員警委員會第十五屆會議。會議決定把國際刑事員警委員會的總部設在巴黎，秘書長一職，由路易士·都洛斯（Louis Ducloux）出任。

由於我還未年滿二十一歲，根據英國法律，我父親必須書面授權史百克，為我合法的監護人，而史百克就以我父親的授權書，向英國移民局辦理我的居留。在經濟上，史百克不需要支援我或補貼我，因我母親（陳張雅淑）在泰國曼谷經營家幸公司（Grace Limited Partnership），每年收入可觀。我母親每年把一筆數百英鎊的款項（在當年是筆大數目），直接匯給史百克，而史百克對我監管甚嚴，每星期支付我十先令的零用錢。

在我到英國之前二十年，即一九三三年，當倪柝聲訪問英國弟兄會時，私下訪問貴橡路基督徒交通中心，結果被弟兄會大興問罪之師，導致倪弟兄與弟兄會的關係破裂。當我在英國期間，也作出類似的事。史百克一直嚴禁我與不同教會立場的人有頻密的交往。我剛到英國頭幾個月，曾在米道塞斯郡（Middlesex）的小鎮寶納園（Pinner Green）的徹斯德私塾（Chester House）進修英國語文，主日則往威伯利公園（Wembly Park）一個聚會點聚會，該聚會由赫利斯（David Harris）弟兄——史百克的同工帶領。那裡的負責弟兄之一郝洛衛（Stephen）Holloway，和我談話很投契，不久我們常分享在神面前所領受的福分。

可惜，威伯利公園的聚會，竟不幸分裂，我的知交郝洛衛到別處聚會，但私下仍與我有來往。這事被史百克知道了，大為不悅，寫了一封長達十頁的信件，勸郝洛衛今後不要與我來往。史百克說，他對我有屬靈上的教導責任，他是經我父親親筆授權的，他是我在英國唯一合法的監護人。儘管如此，

我還是拂逆史百克的意思，不完全順服他，因我與郝洛衛私交甚篤，兩人一直保持來往。

另外，我又間中參加王又德牧師（Rev. Stephen Wong）主持的倫敦華人教會。王又德一見到我，便想到他在北京與王明道相處的日子，常為王明道被監禁一事而禱告；我則為倪柝聲被囚禁而求神施神蹟釋放倪柝聲。於是王又德同樣成為我在倫敦另一個可以傾訴的對象。不過，史百克弟兄那裡的聚會雖然常為倪柝聲禱告，卻並沒有和王又德的華人教會有來往。王又德於是不時向我抱怨，說史百克是閉關主義者，說史百克對華人教會毫不關懷、漠不關心。

實際上，我不喜歡在英國的行動受限制，希望有自己活動的空間，在這方面和倪柝聲當年在英國的表現，毫無二致。這並不意味著，我們中國人，對原來的教會組織不忠，有叛逆性；而是我們尋求屬靈交通時，想擴大接觸面，與其它信徒分享更多靈性上的經歷。

此外，由於我從小就有強烈的民族主義思想和愛國心，我非但參加華人教會，也參加倫敦的中國學生會（China Institute）。為了推動世界和平，平息朝鮮戰爭，我又支持在日內瓦所舉行的和平會議，和中國外長周恩來、副外長李克農建立了友好關係。宦鄉到倫敦出任代辦之後，我又和宦鄉、軍事參贊李欣有接觸。由於我太活躍，史百克開始控制不了我。史百克除了講道之外，出版《見證報》，他既不能全時間看管我，就委託岱勒（George Taylor）夫婦分擔看管我的責任。

有一次，鮑志成夫婦帶著女兒鮑俊賢由非洲的毛里求斯島來到倫敦。鮑醫生一家經王又德牧師安排，住在王牧師的「安息之家」（House of Rest）。鮑志成醫生一家人在英期間，曾來貴橡路探訪我，我介紹他們給岱勒夫婦和奧格公爵夫人（Lady Ogle）認識。我又告訴貴橡路的人說，倪柝聲師母，和我們一家，在九龍就是在鮑志成家裡參加主日擘餅聚會的。

一九五四年，我報讀麥德西學院（Battersea (Polytechnic)，每天從貴橡路坐火車往返，太過勞碌；我於是向史百克請示，可否讓我暫時到麥德西公園（Battersea Park）附近住宿，這樣上課方便得多。由於我找到的房間是聖公會的牧宅，史百克也就放心，讓我在上學期間，暫時搬離貴橡路。

一九五五年中，臺灣浸信會的張容江牧師突然到倫敦參加世界浸信會大會，我征得房東聖公會牧師巴威爾（Rev. Edward Bardwell）的同意，在我房間多搭一張臨時床，安頓了張容江。張容江的妹妹張寶珠，是我父親在香港的同工，曾住過我們的家（菁社別墅）。張容江的姊夫趙君影，則是我父親的朋友，當我搭船經新加坡時，曾拜訪了趙君影。

在世界浸信會大會上，我遇到了來自香港的代表，一位是我在培正中學的校長林子豐，一位是劉光升——培正中學的宗教主任。浸信會大會期間，每晚巴威爾牧師、張容江牧師與我共進晚餐。張容江牧師很健談，滔滔不絕，三人的交談又涉及廣泛的問題，每晚都盡興才回寢室。

有一天下午，我在森林山（Forest Hill）一人獨處時，忽然痛哭起來，想起我於一九四八年得救時，我向神許願要作傳教士。當我在一九五〇年回應倪柝聲的呼召時，我寫下紙條，白紙黑字寫下要奉獻一生事奉神。當倪柝聲、我父親把我交給史百克教導時，他們原是盼望我成為屬靈事工的接棒人，誰料到，我的複雜社會關係竟然不能取悅于史百克，這個變化太大了，粉碎了我原來的心願。至於我所素來敬仰的屬靈啟蒙大師倪柝聲，此時卻身陷囹圄，下落不明。

一九五五年秋天，史百克訪問香港。見到了我父親，史百克問我父親有否倪柝聲的最近消息，我父親答說沒有。史百克又談起，貴橡路的巴若蘭小姐（Miss Elizabeth Fischbacher）和鐘瑪利小姐（Miss Mary

Jones)不久會到香港作宣教工作，他們會在屬靈事工上，襄助我父親。巴若蘭小姐曾是倪柝聲得力的助手。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我由倫敦飛回香港，在我抵步前，史百克已由香港飛到臺灣，在臺北仁愛路聚會所有一系列的講道聚會。史百克在臺北期間，接到倫敦史百克師母的通知，說我在倫敦行蹤飄忽，不留宿貴橡路，另外巴若蘭和鐘瑪利兩位傳教士又有信息傳來，說她們兩位在倫敦 Peckham Rye 的萊恩餐廳 (Lyon Restaurant) 和我碰頭，勸我要回貴橡路教會，要我親近主，她們只見我支吾以對，似乎心神不定。

史百克在臺北的聚會一結束，和女婿金彌耳 (Angus Kinneer) 一起飛到菲律賓的馬尼拉，和菲律賓的同工們——吳仁傑、繆紹訓、莊德添等會晤。他們在機場匆匆數語後，史百克就返回旅館房間，寫信到香港給我父親，述說我這浪子，在倫敦顛沛流離，不受他師母的管教約束。史百克信件到達香港時，我父親已飛到曼谷。那段日子我母親正在管理家宰公司，而我哥哥慰中在辭掉香港生化藥廠的工作後，在曼谷幫助我母親數年後，其時慰中正在美國留學，所以我父親不時要到曼谷探訪我母親。

史百克給我父親的信寄到香港，我乘父親不在，就拆開來看，發現史百克向父親說我的不是，我心裡十分難過。我不責怪史百克，是我行動不會拘束所致，我於是作出一個決定，要親自到上海，在現場審視倪柝聲的案件，因為這案件牽連甚廣，並與我休戚相關。

## 第十七章這是一樁冤假錯案

我是於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從羅湖進入大陸的。

這是一九五五年底，從北方至南方，最後輪到上海，倪柝聲弟兄在聚會處的其它同工，紛紛受到逮捕。人數高達數千人，計有北京的房愛光、天津的夏習靈、青島的張子潔、西安的李因信、煙臺的趙旭初、南京的季永同、杭州的徐明、馬迪生、蘇北的邱日鑑、牛文淦、吳名灰、蘇州的俞崇恩、溫州的黃覆銓、南京的丁榮施、重慶的陳希文、福州的陳必蔭、餘篤信、福清的林子隆、廣州的餘道勝、鄭德爾、汕頭的孫律典、廈門的王燈明、蔡志崇、柯憐憫等等。

這場政治風波是建國以來的一場大冤獄，結果構成了一系列嚴重的冤假錯案，被逮捕的數千人，都是一些撫塵不染，不知政治為何物的清教徒。他們有如中世紀在歐洲的重浸派和貴格會，被定性為反政府分子，實際上他們完全沒有本錢，也沒有能耐，去推翻政府當局。許多聚會處的信徒，在牢獄中被折磨了許多年——有的達數十年，不少甚至命喪獄中。正如南京的丁榮施所言，當局始終找不出真正的反革命罪證來。

對上海聚會處同工的逮捕，開始發生於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九日，先後逮捕了李淵如、汪佩真、張愚之、藍志一、朱臣、陳本微；稍後又逮捕了俞成華、左弗如。

黃得恩親歷其境，作證說：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九日，南陽路那座樓，上上下下一片哀哭，許多人痛不欲生，都切望自己也被捕，甚至有人要求政府逮捕。」

翌日，一九五六年一月三十日，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和市宗教事務處在天蟾舞臺召開了二千五百名基

督徒的大會，大會由市宗教事務處處長羅竹風主持，市公安局副局長盧伯明當眾宣稱破獲了倪柝聲為首的反革命集團，並宣佈了所謂的首惡份子李淵如、汪佩真、張愚之、藍志一的罪狀。此外，公安部門又委派邵洛羊任肅反隊長。邵洛羊在五反時期曾任上海生化藥廠五反檢查隊隊長，深獲上海市公檢法部門的信任，南陽路聚會處，特別成立了信徒學習委員會，由劉約翰任主席，張錫康任辦公室主任，許梅驪任秘書、張主懷任《通訊》刊物的主編，在其它幾十名委員中，還有同工左弗如。

一九五六年三月中旬，正當我往日所認識的周康耀、張主懷、俞崇信等在南陽路學習之際，我來到南陽路，告訴他們我從英國、法國回來。

我甫到上海，一下火車，就投宿在天目路的嘉露旅館。在南陽路遇到俞崇信時，他很有愛心地要招待我住在他家裡。其時俞崇信的父親俞成華剛過世沒有多久。我壓根兒不相信俞成華會如他們所說的是反革命分子。在俞家，俞成華師母對我的愛心款待，使我有賓至如歸的感覺，至今我對他們一家的愛心，仍感激不已。

不久，我從俞家搬到上海外白渡橋的上海大廈六〇五號房，在那期間我更冷靜地思考整個聚會處數千弟兄姊妹被逮捕的案件。我出身于聚會處，而我的父親更是倪柝聲有數的最重用的同工之一。

在約翰福音九章二十五節，瞎子作見證說：「他是個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從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見了。」

我無法找出倪柝聲的任何罪證。所以倪柝聲有沒有犯許多不可告人的罪，我不知道，不過有一件事我知道，從前我沒有委身給神，沒有奉獻，感謝神，借著倪柝聲，我把自己的一切獻給神；借著倪柝聲，我被送到英國，接受史百克的屬靈教導。即使我日後獲得尊榮，我也絕不應忘本。

在上海，我還分別見到了許美蓮、張主懷、張錫康、唐守臨、周康耀等，還曾拜訪了上海宗教事務處處長陳一鳴。上海召開控訴大會時，我還未到上海，但控訴倪柝聲的十人中，有兩個和我有直接的或間接的關係。其中有一位是張主懷，他的女朋友王光霞，是我在香港的朋友王明理的妹妹，王光霞後來前往倫敦，成為我在倫敦的知己王又德牧師的義女，而張主懷的母親張林元德姊妹，是我母親在鼓浪嶼的好朋友，我從小就認識張主懷和他弟弟張主恩。一九四九年我到香港的幾個月，我曾在鼓浪嶼張主懷的家裡，向其時還未得救的張主懷傳福音，張主懷在倪柝聲被捕之前從未與倪柝聲見過面。所以張主懷控訴倪柝聲賦予他特殊的任務，又說倪柝聲差遣他到廈門從事反革命活動，是彌天大謊，是絕不真實的。

另一名站出來控訴倪柝聲的是許梅驪姊妹，她是香港高秉衡的未婚妻。一九五二年，我未往英國之前，曾與高秉衡、陳供生、單既惠、陳錫日前往淺水灣游泳。那時候我不知道倪柝聲就是因為向陳錫日借過三萬美金，以黑市價套匯人民幣而被東北的公安人員拘捕的。我當時作夢也沒有想到，高秉衡和身居上海的許梅驪不能遂願成婚，後來秉衡竟娶了我的第二妹妹秀美，成為我的妹夫。

從許梅驪在南陽路會所舉行的上海基督教青年大會上的發言，可以看出，許梅驪和聚會處的許多青年弟兄姊妹一樣，具有典型的清教徒的心態，在潛意識裡，實際上他們已受到倪柝聲所宣講「不要愛世界」的影響，這種意識，是這麼根深蒂固，塑造了這些青年弟兄姊妹的性格。他們是以極其痛苦的心情，控訴他們心目中原本最敬重的年長弟兄倪柝聲。

茲錄下許梅驪的控訴：

「我積極，我愛祖國，但我是一個基督徒，我所信的神是我多年所認識、所事奉的。自從我蒙恩以來，多少次祂吸引我，激勵我，多少次我曾把自己獻給祂——這一位奇妙的救主。這一個愛是我沒有法子離開的，但我嚴格要求自己做一個真正對祖國對人民有益處的人。這一個要求是實際的，也是嚴謹的。需要主的恩典和支援，我願意好好工作學習，我願意把自己獻給祖國的建設事業，一面我也有心在教會中擺上我的時間、力量。有時候我會感到負擔太重，感到力不能勝，但我總有一個意念——我不是屬於我自己的，我是一個奉獻的人，我沒有權利為自己有任何打算或保留，我整個的人是屬於主的。我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我的神。但是主的命令不停在這裡，還要我們愛人如己。所以我整個人也得擺在祖國的建設事業上，為廣大人民的幸福貢獻自己的力量。因此，在屬靈方面，我感到需要更多的恩典，更深的捨己。捨己的路必沒有錯。今天的捨己是真為著神的心意，為著眾人的益處，我們所信的、所盼望的、所走的道路仍然是神在聖經中所命定的，不能有所改變。奉獻、捨己、仰望主，求祂純潔的愛充滿我們，叫我們用祂的純愛來愛世上的眾人，渴慕主的顯現，盼望神永遠的計畫成就，並願祂的國度早日顯現。這是我的路。如果看不見這些，恐怕不可能做一個真正愛國、愛教的基督徒。但願神借著實際生活，借著新時代對我們實際的要求，使基督的愛得以流露，使基督的生命得以彰顯、成長，使教會裝飾整齊，預備迎接基督。」

從許梅驪的控訴言論，察覺到聚會處信徒的一個特點，就是單純和童真，不喜悅塵世的虛榮，富有濃烈的出世思想；但最令人可惜的，是這些信徒脫離現實，不敢面對現實，以至不知道現實的殘酷——特別是政治現實的殘酷。

這種性格，也出現在我身上。在我身上，也就難以避免地出現了多重性格。

在上海，我有許多可信任的朋友包括俞崇信、許美蓮等，他們認識我時，只知道我是一個天真爛漫的小孩子，是香港聚會處負責弟兄陳則信的兒子；他們哪裡會想到，經過了短短的六年，我已經被殘酷的政治現實所壓碎，無法適應突如其來的變化。

一九五六年四月，我離開上海，前往北京，然後又回到福州。我在福建逗留了一年之後，於一九五七年中，重返上海，這次我有充分的時間和嫗母倪柝聲師母敘舊。

有一晚，我請倪師母到錦江飯店吃晚飯，吃飯時她向我查詢了許多有關貴橡路的信徒情況，我一一回應她，並說出她所查問的伯得遜弟兄（George Patterson）已經逝世。從倪師母的反應，我發現我所說的貴橡路情況，與倪柝聲平時對她說的，毫無二致。從我口中，她證實倪柝聲已往對她所言的一切屬實，並證實他們夫妻之間無所不談，非常坦誠，絕不虛假，從不向對方隱瞞一切。我對此感到驚奇，這與我父親對我說過的，倪柝聲不向家人說及工作的事，並不相符。談話中，倪師母有時重複發問，我顯出我不滿這種盤問的態度，偶而也就發急了，於是我對倪師母說：

「嫗母，倪弟兄在貴橡路住了十個月，而我在貴橡路住了三年，我對貴橡路的瞭解還不可靠嗎？還會少嗎？何況，經過了這十幾年，貴橡路湧現的新一代的青年弟兄姊妹，為數不少，他們是倪弟兄所不認識的。」

說到這裡，我突然想起倪師母在香港時，和我一起到九龍太子道鮑志成醫生家裡參加主日晚的擘餅聚會，就對倪師母說：

「嫗母，你還記得我們參加鮑師母家的主日擘餅聚會嗎？他們在毛里求斯島住得厭倦了，過到倫敦，



住在我朋友王又德牧師的招待所。鮑志成醫生、鮑師母、鮑關柔馨姊妹，和女兒鮑俊賢曾來貴橡路看我，我介紹他們給貴橡路的弟兄姊妹認識，只是那時史百克不在倫敦，卻遇到了奧格公爵夫人（Lady Ogle）。」

吃完晚飯，我送倪師母到萬紹祖家裡，臨別之前，倪師母告訴我翌日她會帶牙醫到提籃橋給倪弟兄檢查牙齒，可見提籃橋看守所對倪弟兄也很照顧。倪師母知道我日後要到北京，就說她會親自到火車站來送行。翌日，當倪師母告訴倪弟兄她與我見面的情況時，在獄中的倪弟兄叮囑倪師母去買一條絨褲送給我，因為北京氣候不日將要轉寒。在火車站臨別時，倪師母又再三叮囑我到北京，要找她大姐張品瑋姊妹，又說林家是廈門人，我若在北京和林家用廈門話交談，一定倍感親切。

在火車上，我用手撫摸著倪師母送給我的絨褲，心裡頭覺得一陣溫暖。在這方面，我不缺母愛，我親生的母親一直寵愛我，一直把她認為最好的賜給我，甚至不考慮到昂貴的費用，要送我到英國留學；而倪柝聲師母，也視我如同自己的兒子，倪弟兄更在返回大陸之前，叮囑他在倫敦的屬靈兄長史百克，要好好看管我，輔導我。如今不爭氣的反而是我，我多年來不務正業，辜負了倪柝聲、史百克、雙親等對我的期望。

在北京，我住在東單官帽司胡同平新我弟兄家裡。我到寬街聚會時，碰到了我父親的同工閻迦勒，閻迦勒是全國政協委員。在寬街我也遇到了倪師母的大姐林張品瑋，由於我和林張品瑋以往沒有交往，她對我不熟，所以我們沒有太多的交談。當時北京聚會處人人自危，為了自保，人人都謹言慎行。

我於一九五七年中再次申請出國。與其目睹同一宗教信仰的人紛紛陷於冤獄，不如我到海外為祖國效力，以促進國家的和平統一，從而向國人證明倪柝聲反革命集團事實上並不存在，證明聚會處根本從未有過反革命的綱領和行動。可惜的是，我的願望終於落空。

一九五七年國務院公佈實施了「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九月間北京市公安局剝奪了我的人生自由，對我進行勞動教養。

我被勞動教養長達七年之久，部分內容在香港的《南北極》月刊登載過。用依華的著名發表，文章的題目為《北京第一號信箱的秘密》。

對於公安部門未經偵察、起訴、審訊而剝奪了我的人身自由，我能說什麼？當我被送到河北省寧河縣清河農場作土方工程時，內中包括北京市的公檢法幹部王文禮、易家岳、周培良等。在勞動教養期間，絕口不談我在歐洲秘密會晤過周恩來，更沒說出我和中央國際活動指導委員會的關係。

一九六四年七月，在澳大利亞的周天承（高秉衡的舅父）寫信給僑務委員會主任何香凝，為我辯護，解釋是周天承說服我回國服務的。事實上，何香凝的兒子廖承志，中共中央社會部的李克農、監察部部長錢瑛，中國駐倫敦代辦宦鄉，全知道我是無辜的。何香凝和有關部門洽談後，決定把其時被關禁在精神病院的我，送回香港定居。

從我離開倫敦算起，轉眼已是九年，我父親在這些年間，一直為我擔憂，晝夜為我禱告，跪到禱告墊子都爛掉了。在貴橡路史百克帶領的聚會，除了為倪柝聲禱告之外，也為我禱告，倫敦華人教會的王又德牧師在訪港期間，找到我父親，查詢我的下落。感謝主，經過了這麼曲折複雜的過程，我終於能夠離開大陸，與我的父母親在香港重逢。

這裡要撥出一些篇幅，來敘述倪柝聲案件的剖析。

許多人指控倪柝聲，是根據倪柝聲所寫的《我生活腐化的情況》。他們振振有詞說：你看，這些罪是倪柝聲自己供出來的，他若自己不這麼承認，別人無從知道。

在這裡，我必須指出，所謂倪柝聲寫的《我生活腐化的情況》，其筆跡與倪柝聲的筆跡完全兩樣，不是倪柝聲親筆寫的，有必要進行科學鑒證。若書寫的人連模仿倪柝聲的筆跡都不屑為之，可謂膽大包天，目中無人。我並不是唯一看到這破綻的人，當年張錫康弟兄看了也有疑問。張錫康的父親張光榮，是倪柝聲在上海最早的同工之一，而張錫康本人曾任過上海生化藥廠的審核主任。這個職位權力最大，生化藥廠總經理開了發票，張錫康不蓋章是無效的，所以他對倪的筆跡應當十分熟悉。

現在請讀者們，仔細地讀一下張錫康四十一年後（一九九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在美國的筆述：

「有一張倪柝聲寫的《我生活腐化的情況》，我看到這張供詞，不像是倪弟兄的筆跡，我懷疑供詞是假的。我問展覽會的講解員，講解員說，是倪柝聲在病中寫的，但不管是否倪柝聲生病時寫，筆跡應該一樣。因為我認識他的筆跡。但許多弟兄姊妹信以為真，跌倒的人不少。」

張錫康是聚會處的第二代，我也是聚會處的第二代，我們兩個人以往所看到的倪柝聲的筆跡，始自倪柝聲寫給父輩張光榮和家父陳則信的書信。而展覽會新聘的講解員，並不認識倪柝聲，卻誣稱所謂的供詞是倪柝聲在病中寫字，以致筆跡發生變化。這一點辯解的理由，在一員資深的國際刑警看來，完全不能成立。正如上文所述，倪柝聲身上百病交集，何時沒有患病？即使在他以往病危，以為自己不久人世，拼著一條命寫《屬靈人》時，筆跡也未曾稍為改變。倪柝聲一生最大的特點之一，就是他的筆跡從未因身體軟弱，而有所變更。

一九五五年四月，當張錫康與我被唐守臨邀請到家中晚膳時。整個晚上，唐守臨都沒有提起《我生活腐化的情況》的筆跡是否冒充的疑點。事實上，不斷受到疾病襲擊的倪柝聲，在上海提籃橋的監獄裡，公安部門給他一間大監倉，有桌子、椅子。他們知道他的英文很好，頗為倚重他，叫他翻譯英文科技書，有時公安人員陪同倪柝聲到上海圖書館找參考書籍。在這種還算良好健康情況下，為什麼供詞的筆跡會與他以往的筆跡迥然不同呢？這一點，不能責怪任何被誤導的人，在專政下的上海，眼看著周圍的人紛紛被捕，誰有膽量去質疑上海公安部門的作法？當年上海的公安部門本身，其實已炮製過潘漢年和楊帆的冤假錯案。

概括一句：《我生活腐化的情況》無法證實是倪柝筆跡，屬於偽證，表面證據顯示是冒簽的。換句話說，既然不是倪柝聲的親筆供詞，倪柝聲的許多罪名也就不能成立。

至於在法庭上擺著許多作證用的書籍，是從哪裡搜查到的？這些書是不是在現場繳獲的？已往他常住的地方，並沒有淫亂的書籍，這些書究竟是怎麼突然出現的？究竟這些擺放的書，是什麼書？是否淫穢，是否黃色，是否低級趣味，法庭並沒有書籍的清單，無法讓聽審的人根據書名，來判斷書的性質。在政治上用障眼法，是慣有的事，若有人僅僅從控訴者口中，聽到倪柝聲藏有幾本淫穢的書，就以控方所灌輸的先入為主的觀念，假定倪柝聲所收藏的書，純屬淫穢的書。這種假定是錯誤的，是斷不能成立的。

倪柝聲初到重慶時，住在一間閣樓上面，只有一張床、一張桌子、一隻凳子而已，張郁嵐弟兄去看他，爬登那閣樓時，木梯會搖擺，又會吱吱作響，但裡面沒有一本不雅的刊物和書籍。倪柝聲後來搬到重慶的生化藥廠宿舍，擺設也很簡陋，張鬱嵐去看他，同樣沒有看見任何不潔淨的書籍。

黃得恩在福州的執事之家是看到幾十本非宗教性的書籍，全是發表新思想的進步書籍，說明倪柝聲為了更多認識新時代的基本理論。覺得需要明白一些馬列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基本理論。黃得恩在一九九八年六月五日的信中寫道：「倪弟兄之全為主，我可以作見證，我在福州整理過他個人的儲藏室、臥房。一句話：簡單、樸素。他做到一切擺上，他在地上什麼都沒有留下，正如一句話：『生前留下一條路，死後留下一個墓。』」

倪柝聲夫婦未到香港之前，在福州是和他大姐陳倪閨臣和姊夫陳賢璋住在一起，有兩年多同住在福州市泛船浦海關巷的一棟房子裡。

陳供生在二〇〇四年初出版的《算是配為這名受辱》一文中介紹了舅父倪柝聲敬畏神的品格。這是陳供生在海關巷家裡親自目睹的。

當倪柝聲住在九龍鑽石山上元嶺的寄廬時，他一外出，張宜倫的兒子張振融，以及與張振融同齡的我，往往在倪家翻箱倒篋玩耍，從沒有發現倪柝聲藏有任何不雅和不文的書籍。正如上文述及，倒是在我津津有味地閱讀《上海日報》的言情小說時，倪柝聲突然回家，把我手中的《上海日報》拿走，以免這些黃色文章，對我產生不良的影響。

倪柝聲一生的最大特點和長處，就是用所能爭取到的每一分鐘，閱讀聖經和屬靈書報，他對聖經精湛的研究，在中國教會歷史上，至今無人可以與他相比。除此之外，他還閱讀潘湯（D.M. Pantou）、郭維德（Robert Govett）、彭伯（G. H. Pember）、賓路易師母（Jessie Penn-Lewis）、史百克（T. Austin Sparks）、達秘（John Nelson Darby）、開雷（William Kelly）、馬金多（C.H. Mackintosh）、杜倫巴爾（Charles Trumbull）、宣信（A.B. Simpson）、慕安得烈（Andrew Murray）、麥敦諾師母（Mrs. Charles McDonough）、亞察爾（C.H. Usher）、麥渴溢（Mackee）等屬靈巨匠的書籍。他多年來服事主，將收入的三分之一，作為家用，三分之一作為奉獻之用——包括說明有需要的信徒或同工，而剩下的三分之一，則用來買書。

他與倫敦的一些舊書店約定，只要有珍貴藏書，就自動寄給他。他搜羅了幾世紀以來的第一流基督教著作，其中有三千多本都是非常珍貴的。在倪柝聲的臥室裡，不論是在他婚前和婚後，床下、床前、地板上，甚至床上，一概都堆滿了書，內中有釋經的書、人物傳記、教會歷史、聖詩的作者生平，種類紛繁。

倪柝聲的住所——從臥室到客廳，沒有多餘的空間擺放那些有傷風化的書，他也沒有空閒去讀這些書，他的思想不是空白的，他的思想裡也沒有位置留給污穢不潔的思想。倪柝聲的講道不是靠天分，不是在一兩天內準備的，也不是臨場即興發表的，他的講章的內容都經年累月，從經歷上得著的。難怪他的話語是那豐富、那麼流暢，那麼有亮光。是的，在他臨場述說時有聖靈與他同在，因此在他釋放信息時，充滿了聖靈的能力和同在。倪柝聲從得救之日至被囚之日，只有短短的二十多年，卻整理出了數十本很有屬靈分量的書籍，這些書籍不是一個骯髒污穢的頭腦所能炮製出來的。最後補充一點，翻閱倪柝聲的往事記錄，會發現，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七日下午，他在福建泉州時，曾這樣說：「我自己有一次搭車，在店旁看見一本有點疑惑的書，就想翻開來看，但因為主禁止，我就不敢去翻那本書了。因為我的眼睛、我的思想，已經奉獻給主，不再屬於我自己了。」

至於那些被指控為反革命份子的聚會處的眾多同工，根本就未曾從事反革命活動，更沒有組織所謂的反革命集團。

被控告為「罪名昭著」的反革命份子陳恪三，為泉州晉江南塘人，生於一九〇三年，信主後被主呼召即辭去縣警察局長，及副旅長職務，出來全時間事奉神，曾任福州聚會處和昆明聚會處的負責同工，是鼓嶺第二期學員。他的歷史清清楚楚，從未從事任何反革命活動。我父親晚年，在香港只和國內三位元同工保持通訊關係，他們分別是陳恪三、張啟珍、俞崇恩。其實中國公安部門早就發現陳恪三根本不是反革命份子，所以後來提前釋放他。

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日在上海召開了一次全國各地區基督徒聚會處的同工聚會，共有來自十七個省、一個自治區、三個直轄市的代表六十九人，加上工作人員，共有八十八人，故稱八十八人聚會。聚會後大家通過了一個檔，是由陳恪三和黃得恩起草，檔全稱是《持定我們所承認的道》，檔內容保留了倪柝聲多年來所釋放的信息和基本真理。

此外，廈門聚會處的柯憐憫也被指為一個罪大惡極的反革命份子，說他組織了一個反革命集團，積極策動各種反政府活動。我對柯憐憫有深厚的認識，自從汕頭市韋懷中學的校長卓效良宣告時局變化，學校提前停課放暑假之後，我告別了其時在汕頭的倪柝聲的母親倪林和平姊妹（又稱倪伯母），及幾位長老（陳方青、蔡寄廬、謝子舜、麥適疇），及其他青年弟兄們，包括林雙本、謝德建、姚鴻儒等，獨自乘船到廈門找我父親。我父親那時住在廈門市中山路蔡志文醫生診所的樓上，再上一層樓便是柯憐憫的居所。我父親在廈門的同工，有王燈明、蔡志崇、韓進修、柯憐憫等。由於我父親比較多時間花在鼓浪嶼黃家渡的聚會處，所以靠近中山路的思明東路聚會處，就較多由柯憐憫等同工帶領，這就造成了我和柯憐憫弟兄有較多接近的機會。不久，柯憐憫把我這個主內小弟當作知交，稱讚我有屬靈的恩賜。實際上這是過獎。

在我與柯憐憫短短幾個月的接觸期間，我發現他實在清心愛主，既敬虔，又熱心，並且經常探訪在軟弱中的弟兄姊妹。柯憐憫弟兄短期參加過第二期鼓嶺訓練聚會。像柯憐憫這樣一位與世無爭的清教徒，竟因反革命分子的罪名而被監禁數十年，實在是匪夷所思。柯憐憫寫的《基督囚徒的一封信》，實在感人肺腑，幫助了許多信徒。

我必須以自己的親自體驗，說明在中國多次的政治運動中，存在著不少冤假錯案。

一九五八年春天，我在河北省潮白河西岸的西荒地，在一片蘆葦雜生的荒地上被強制勞動。

在河北省寧河縣的西荒地，一條新建的五八三村裡，李文華中隊長叫全中隊集合點名，點完名之後，宣佈召開鬥爭大會。我成為鬥爭會的目標，李文華叫大家檢舉我。

我在《南北極》雜誌上所連載的《北京第一號信箱的秘密》中，披露根本不是反革命分子的我，如何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從我個人的例子，說明確有冤假錯案存在，也說明倪柝聲是否反革命分子，是需要再度予以審查的。

以下是我當時被鬥爭時的情況，摘錄自香港《南北極月刊》上刊載的《北京第一號信箱的秘密》。

「許多人都撕開情面，揭發他，痛斥他。一些平時和他多寒暄幾句的，更不敢懷溫情，直向他展開無情的鬥爭。有的說他是某國特務潛回中國刺探情報的，要政府審查他的歷史；有的說他一向散佈資產階級思想毒素。……無數雙手用盡力氣晃動著，揮擺著，高潮終於來到，每一個人放開著嗓子高喊：『逮捕反動份子！』『鎮壓與人民為敵的反革命份子！』『我們要求政府懲辦他！』……此時他垂目望地，茫茫之外一無所見，一種奇異的感覺襲上心頭。」

我本人所親身體驗的冤假錯案，促使我再說一次：我堅信，倪柝聲的案件，一定也是一樁冤假錯案，當局總有一天，會給予平反。

## 第十八章姊妹們的見證

一九六五年一月，我從香港飛往曼谷，協助我母親（陳張雅淑姊妹）——鼓嶺第一期的學員——經營泰國曼谷家宰兩合公司的業務。家宰兩合公司的成立，原先目的是代理香港生化藥廠的藥品，與上海生化藥廠、重慶生化藥廠、香港生化藥廠是同一系統的。我哥哥陳慰中本來任職于香港生化藥廠，朝鮮戰爭爆發後，香港生化藥廠西藥原料缺乏，我哥哥被調到曼谷家宰公司，以第三國名義襄助香港生化藥廠進口原料。

我父親受倪柝聲委託，是香港生化藥廠名義上的經理，而我母親在實質上，則是曼谷家宰兩合公司經理。由於我父親是香港和曼谷兩地教會負責人，如今再執掌香港生化，角色上的混淆有時令他十分尷尬。事實上，是由於歷史原因，我父親才會同時帶領香港和泰國兩地的聚會處。

一九六五年，家宰創立十五年之後，我到達曼谷。當時我母親獨自掌管家宰的業務，因為我哥哥到美國留學已達十年，一時無意返回泰國。我母親作為鼓嶺第一期的學員，對她在鼓嶺所學習到的功課記憶猶新，這正是她為何肯付出如此重大代價，與我父親分居兩地，在泰國經營事業。她在經濟上支持我父親在香港的事奉，又支持我到英國留學，又支持我哥哥到美國留學，和支持我五個妹妹在香港讀書。

我母親記得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四日她在鼓嶺作完見證後倪柝聲對她作出的評語，特別是末了的一段話：

「你回想一生的經過，婚前與婚後的情形，乃是整個的掉了一個頭。你嫁給則信弟兄，知道路是難走的；在五年的抗日戰爭期間，你一人獨立維持一家七口的生計，你受了物質的苦，主又給你預備了另一特別的苦，就是婆婆的苦。你本來想要作工事奉主，幫助弟兄姊妹，但你見婆婆如此抵擋你，弟兄姊妹中又多有批評的話，你就想了了，你連作基督徒都不行，不如在教會中坐在末了的一排。所以從那時起，二十年的光陰，你就在那裡養傷。我不讓你過去，我盼望你今天要解決這個難題，若我們不能帶你過去，這是我們的失敗。你要看見是主的手，在這裡對付你的自愛、你的驕傲。你若不經過這些對付，你的自愛和驕傲不能除掉。

「多年來你有如一個蒙羞的人，受人的批評，受人無理的對待，是相當的難為情。但如果從今天起，你能學習接受聖靈的管治，你就能成為有用的人，若不然，你還像以前一樣，一直覺得苦，一直在那裡自養傷口，怨天尤人，你在神面前就是沒有用的人。你若學了功課，你就能進入別人的感覺裡，就能幫助、帶領那些在你情形中的人。」

「你可能要以為，過去有這麼許多的失敗，今天還有什麼可說的。人在千萬次的失敗中學不好，就以為好像已經沒有了見證，已經沒有了盼望。然而今天在這裡要你來一次末了的得勝，就能把你已往的失敗都得勝了。彼得三次不認主，我們都知道那是他的一個大失敗，當時他若只顧養傷，只顧看自己，那他就算了，然而主對他說，你回頭以後要堅固別的弟兄。今天，你的前途也正和他一樣，現在就看

你如何揀選了。你若能勝過，你就能多幫助別人；別的年幼的姊妹有同樣的難處時，你就能作帶領她們的人。」

直至一九六五年，亦即我抵達泰國這一年，距離倪柝聲對我母親說上述這番話的時間，已經十七年了，但是倪柝聲弟兄對我母親的這番勉勵話語，仍深深地烙印在我母親的腦海裡，成為她工作的推動力。與她同上鼓嶺的第一期學員，那時大半已被囚在監獄裡，其他人也都分散在世界各地，失去聯絡。然而倪柝聲的話增加了她的勇氣和信心，使她在企業上為主站住。她並不因著在事業上薄有成就，而忘了扶持有困難的弟兄姊妹。

許多人知道我父親是倪柝聲帶領信主的，後來倪柝聲的同工，並根據他對倪柝聲的觀察和認識，著述了《倪柝聲弟兄簡史》；但是我母親——陳張雅淑姊妹，也是在廈門聽了倪柝聲所傳的福音得救的，她曾經為倪伯母和倪柝聲準備膳食，和倪家母子熟稔。倪柝聲住宿在我家中時，我母親照應過倪柝聲的起居生活。一九三五年底，我的母親帶著三個孩子到上海住在上海哈同路文德裡後，不久懷孕，生下了我的妹妹秀美——即後來的高秉衡師母，當時倪柝聲剛結婚一年，他的姐姐林步基師母（林倪閨貞）就把服侍他們的保姆梅官讓給我母親作保姆。

我在這裡要說的，不是要強調我們兩家的關係，因為倪柝聲認識的人和交往的人很多。我要強調的，是我母親是一個明察秋毫，富有敏銳觀察力的女強人，她對倪柝聲的觀察和瞭解，絕對不亞于我的父親。她一直對我說，在屬靈上，你要以倪柝聲為榜樣，因為他捨己，徹底奉獻，對神的話語，按正意闡釋，有正確的認識。至於在政治上，我的母親則要我以周恩來為榜樣。我父親在《倪柝聲弟兄簡史》中，如何套用約翰福音九章二十五節的話，這些話也適用於我母親。我母親說，如果有人要問我，倪柝聲有沒有犯這許多罪呢？我頭一個答案就是，我陳張雅淑不知道，不過有一件事我知道，從前我沒有得救，感謝神，借著他，我已經蒙恩得救了，曾有一度我屬靈的情形相當低落，感謝神，借著他，我被帶進很大的復興！在我一生中，主借著倪柝聲帶給我屬靈幫助，可以說沒有辦法計算，這是我陳張雅淑所知道的。

不論是萬小玲，或者是吳馨，都未曾詳述倪師母死時的慘況。目擊者說，倪師母病重時，不准倪師母移進病房診治，她是在上海中山醫院的走廊上離世的，死後連抬遺體的工友都懶得來。

一九六六年，中國大陸爆發文化大革命，我當時居住在泰國，從事經營西藥業，同時，我又落筆撰寫《北京第一號信箱的秘密》這本自傳式的書籍。

「一九六六年夏的某一天，她被一群紅衛兵關在一個小房間裡連續審拷幾晝夜，我們在外面只聽得闊皮帶一聲聲的抽打，並夾雜著謾罵恐嚇聲，一聲聲地像是抽打在我們心上，但卻沒有聽見婆婆一聲言語。過了許久婆婆被押出來，眼睛被打腫得像青饅頭，身上也多處傷痕。那期間她的眼鏡被打碎幾副，連最起碼的人格都得不到尊重，多次她被批鬥，遊街。有一次她同另外兩位老姊妹一起被迫高舉雙手，手上套著鞋子，頭上戴著紙做的尖頂帽子，項上掛著牌子，被責罵，凌辱，勒令她們這樣站著達數小時之久，目的是要他們放棄信仰不再信耶穌。但幾個鐘頭下來，她們三位都一聲不吭。最後紅衛兵忍不住了，分別一一喝問她們：

『你們到底還信不信你們的耶穌？』她們個個都說：『信！』紅衛兵們氣極了，拾起地上的皮鞋，下一個一個扔到她們身上、頭上，說：『帶著你們花崗岩的腦袋見上帝去吧！』感謝神！在所有的逼迫中，神

與她們同在，賜力量堅固她們。事後當她們談到這次遭受的逼迫，都覺得很喜樂，因為她們算是配為主的名受辱。

「紅衛兵把所有的聖經、詩歌都抄家抄走了，但婆婆還是千方百計地藏下幾本。有一次，外面的小孩子爬牆，發現屋簷下有兩本聖經，婆婆又被定罪一次。……每天早晚兩次，婆婆被勒令要打掃弄堂，當時她雖在獄外，卻真是比監內的犯人還要慘遭凌辱和迫害。任何過路人，包括小孩子，都可以隨意過去打她，唾她，因為她是眾人所棄的『反革命份子』。有一次在鬥爭她的大會結束後，婆婆對我說：正如哥林多前書四章九節所說的：外面成了一台戲，給世人和天使觀看。在她所有的逼迫中，她總是在批鬥她的臺上，一直不停的默默禱告，始終是靠主站住，沒有羞辱主的名。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所有見過她的人，都喊她『白頭發』，人人都知道，那位滿頭銀髮的老太太，是為了她和她丈夫的信仰受到監督勞動，和非人待遇的。為了主耶穌的名，她成了眾目所睹的美好見證。」

倪師母生前常說一句話：「如果沒有主，這世界真是太殘酷了！」

張錫康證實說：「張品蕙遭遇的鬥爭是在一九六六年，中國文化大革命興起，紅衛兵去抄她的家，連井水都吸幹掏空，抽查有否武器丟在裡面。她也遭紅衛兵的毒打，戴高帽子、遊街。」

倪柝聲師母對倪柝聲的忠貞和愛護委實令人感動，三十年後，居住在美國明尼蘇達州（Minnesota）的倪柝聲外甥女婿吳馨證實：倪柝聲與倪師母感情一直很好，政府一直要張品蕙與倪柝聲劃清界限、離婚，她不願意，因而她也被戴上反革命帽子，在里弄裡被管制。吳馨強調一點，我們基督徒都是蒙恩罪人，倪柝聲成為蒙恩罪人和成為神的僕人，也都是神工作的結果。倪有犯罪——所有蒙恩的罪人因著舊亞當的罪性，都有犯罪，可是不像當局說的犯那樣的罪。倪犯罪也向神向人認罪，倪師母第一次去上海提籃橋探監，倪柝聲就向她認罪。倪柝聲的甥孫女萬小玲證實說：「當公公倪柝聲被捕時，他們捏造了許多駭人聽聞、莫須有的罪名，來誣陷他，當時蒙蔽了許多弟兄姊妹。但婆婆張品蕙對他最瞭解，婆婆說：他們說他的這些事，都是根本沒有的。」

萬小玲又向我們述說了倪柝聲在一九六七年的情況：

「一九六七年，十五年刑期滿了，政府要他公開聲明放棄信仰，因為此時有人已經對外公開造謠說，倪柝聲放棄信仰了。但這個考驗對他又算得了什麼？主對於他實在是太寶貴了！為了對主忠誠，他再一次放棄所謂的人間自由，在獄中十五年之後，甘心繼續為主作囚徒。這一次公開表態引來了更大的逼迫，公公和兩個流氓刑事犯被關在一起，小流氓的任務就是逼他放棄信仰。他們越是發狠地虐待他，自己就越能立功。曾聽獄中難友說，公公的一件棉背心也被他們打爛。而他的刑期又滿了，公公就被秘密押送去上海郊區的青浦縣青東勞改農場。在此期間，婆婆只被批准去看過他一次。然後又突然音訊全無好幾個月，事後才知道，公公又被押送到更苦的地方——安徽深山裡的白茅嶺勞改農場。」

吳馨弟兄對倪柝聲在青浦縣青東勞改農場的情況作了補充：

「本來倪弟兄于一九六七年刑滿，便可釋放出來與倪師母團聚，正碰上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政府就又加判了他五年勞動改造，從上海市提籃橋監獄出來，安排到上海郊區青浦縣青東勞改農場。倪師母曾去那農場看他，回來對佩心說：大舅說現在他對神對人都沒有虧欠了。倪師母又說，青東勞改農場的場長對大舅很賞識和照顧，大舅有傳福音給他聽，他很有心接受但卻因此受上級批評。不久政府把倪弟兄改調到也屬上海市管轄安徽省廣德縣白茅嶺勞改農場。」

倪柝聲在被囚禁期間，仍然不停地傳福音，一直為主作見證。他在上海提籃橋監獄，帶領了一個難友吳友琦歸向了基督。吳友琦弟兄從上海提籃橋監獄，直至安徽省白茅嶺農場，都和倪柝聲關在一起。吳罄又從倪師母口中，聽到倪柝聲傳福音給中共幹部青東勞改農場場長，場長因接受福音受到上級批評。

萬小玲在《世界不配有的人》一文中透露，倪柝聲在世時，曾為一個難友禱告，在倪柝聲去世後，這個人才得救歸主；這個人將倪柝聲在獄中的一些美德，述說給萬小玲聽。

至於吳罄說倪柝聲加判了五年勞動改造，張錫康解釋說，不是加判五年，而是要繼續剝奪政治權利五年。張錫康這樣說：

「事實上倪弟兄一九五二年四月被逮捕到一九五六年才判他十五年。到一九六七年滿了十五年，因還有剝奪政治權利五年，所以戶口不給他報進市內，以免他與教會中弟兄姊妹接觸，而將他送去上海郊區青浦勞動農場，叫倪師母去服侍他。一九六六年所謂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後，紅衛兵問他，你現在還信不信耶穌？倪弟兄說，信！他們說，你關了十五年還沒有改造好？於是叫二個小流氓打他，將他的衣服都撕破，然後送他去安徽白茅嶺勞改農場去勞改。」

倪柝聲在苦難中，對主一直忠貞不變，實在令人敬佩；正如倪弟兄的甥女婿吳罄所證實的：即使是在監牢裡，倪柝聲仍然是敬畏神的人。

一九六七年，非但對倪柝聲是關鍵的一年；對筆者個人，以至對全體香港市民，也是關鍵的一年。

三年前的一九六四年，當我從北京抵達香港不久，英國殖民地的情報官員拉麥森（A.L. Lamaison）就對我進行多次的秘密盤問。那時候我跟父親住在九龍天文臺道五號教會聚會所的執事室大樓，我每次被英國情報官員拉麥森問話的時候，都不方便向教會裡的弟兄姊妹透露，或透露談話的過程細節。

從一九六四年七月至十二月，拉麥森斷斷續續地盤問了我半年，有一天拉麥森發火了，說我為什麼隱瞞身份，沒有說出我即是十年前在歐洲十分活躍的 Ceper Chen。一九六四年聖誕前，拉麥森把我的個案轉給英國軍事情報第六處（MI6）屬下的情報研究室（Information Research Department）的東南亞區主管史密斯（Leslie Smith）；史密斯認為，我應該將我從歐洲回到大陸的受難過程寫成一本書，又說，既然我即將會前往曼谷協助母親主持曼谷家宰兩合公司，我在曼谷寫成的稿件，可以交由英國駐曼谷外交官王安治（George Wong），王安治再以外交袋將文稿送回香港。王安治在曼谷會晤我時，對我這樣說，至今他負責照料過兩位敏感的人物，一個是鋼琴家傅聰，另一個就是我。

我在曼谷期間，很快地就認識了中華民國駐泰國大使彭孟緝，和大使館的新聞處處長鐘榮蒼。由於鐘榮蒼是培正校友，也是聚會處弟兄。每主日我們都在會所碰頭，我和鐘榮蒼很快地就成知交。當鐘榮蒼知道我正在寫稿給英國的情報研究室，就聯絡了美國方面。不久，與美國中央情報局有關的女作家伊文思（Dorris Evans）就趕到曼谷，說她有意把我的稿件《北京第一號信箱的秘密》譯成英文發表。

在《北京第一號信箱的秘密》這本書中，我隱瞞了我早年和中共學生運動南系的關係。

此外，在《北京第一號信箱的秘密》一書中，我又隱瞞了我和所謂「倪柝聲反革命集團」的歷史關係，因為在我的良心中，這個倪柝聲反革命集團根本不存在。我堅信，聚會處的同工，幾乎是清一色的清教徒，他們不懂政治，他們的錯誤就是超政治，他們根本沒有好好學習倪柝聲所寫的《我是怎樣轉過來的》。此外，我又知道在聚會處的信徒中，隱藏著不少進步人士。



後來《北京第一號信箱的秘密》，就陸續在王敬義、費明儀等人主辦的香港《南北極月刊》上連載。沒有料到的是，一九六七年，香港出現了勞工糾紛，港英政府採取高壓的手段，對付工人群眾。在處理香港的動亂事宜上，國際刑事員警組織根據憲章第三條的指導原則，細心權衡與對待這個富有政治色彩的動亂。

一九六七年九月，國際刑事員警組織在日本京都舉行大會，秘書長鄭芮波（Jean Nepote）提議，為了香港的法律和秩序，中英雙方應該就香港的長治久安問題，進行談判。一九六八年一月，英國外交大臣布朗（George Brown），從倫敦飛抵日本東京，親自簽署了解決香港問題的中英國際協議。

令我慚愧的是，在處理倪柝聲反革命集團這宗冤案上；我卻鞭長莫及、束手無策。一九六八年，我除了管理曼谷家宰兩合公司之外，又擔任新加坡格力斯藥廠董事總經理，兼管馬來西亞境內的五間公司，這五間公司分佈在吉隆坡、檳城、古晉、亞庇、柔佛巴魯。在新加坡，我遇到了倪柝聲的老同工陸忠信、陳主言、周洪寶。與倪柝聲關係密切的前上海生化藥廠總經理殷祖瀾，也不時到我的辦公室坐談。每當我和弟兄們談及倪柝聲時，大家都認為倪柝聲是神貴重的器皿，世界各地有許多人，因著倪柝聲的職事而蒙福。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初，眼看倪柝聲加判的五年勞改刑期就要結束，倪師母滿懷希望地積極為倪柝聲出來後的住處奔波準備。有一天，當她在家中站在凳子上要爬到櫃頂上拿東西時，突然間一不小心，她跌了下來，跟著中了風，三天后，即十一月七日，她回到了天家。萬小玲這樣陳述：

「她患有很嚴重的高血壓及心臟病，知道最後總會死於中風，所以她一直盼望一旦發生中風就很快被主接去，既不拖累別人，也免得受長時間之苦痛。感謝主，聽了她的禱告，成就了她的心願，她從中風昏迷，到去世，僅僅三天，這也正是她在世時向主所求的。她在醫院裡十分平安，全無痛苦地被主接去。」

吳馨補充說：「就在這時，主讓她回天家休息，對她誠然是好得無比的，這世界確實不是她的家，她也實在很難在當時當地替倪弟兄找到合適的住處，中國大陸——特別是處於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國大陸，哪裡是她安身之地？哪裡有她枕頭之處？」

倪師母去世後，萬小玲、吳馨不敢馬上說給倪柝聲聽，因為知道他的心臟很衰弱，恐怕一下子難以承受如此大的打擊；但倪柝聲性格很敏感，他似乎有預感，不斷來信查問倪師母的身體狀況。在信中，倪柝聲十分迫切地表示想早點出來與倪師母團聚，好服侍在病中的倪師母。他對同房的難友說：「我的刑期，像是與我妻子的生命在賽跑，如果我能在她還在世的日子出去，就可以好好服侍她，她為我受了許許多多的苦。」過了一個多月，倪師母的大姐張品琿才從上海寫信通知倪柝聲有關其妻子的死訊。可以想像倪柝聲得知倪師母離世後，是何等的悲傷。

我的母親——陳張雅淑姊妹，在鼓嶺第一期同工訓練班，是鼓嶺三個女管家之一。當時何家家長是我父親，女管家是我母親；吳家家長是魏光禧，女管家是魏師母魏林意天；倪家家長是倪柝聲，女管家是倪師母倪張品蕙。由於我們一家和倪家有悠久的關係，那次在鼓嶺又有長達五個月的相處，加深了我母親和倪師母的情誼，增進了兩位主內姊妹彼此之間的認識。我母親對倪師母的賢淑、順從、溫柔、愛心讚不絕口。幾年後，當我母親知道倪師母在香港、上海關懷我，事事照顧我，更使我母親對倪師母感激不盡。

倪師母逝世之後，難免引起我母親對鼓嶺第一期同工訓練聚會的懷念。事隔十三年，我母親在事業上雖然薄有成就，但她卻把這殊榮歸功於倪柝聲在鼓嶺對她的勉勵和殷望。

根據家母的回憶，倪柝聲一向對於姊妹們的功用非常重視。她說，鼓嶺的禪家，清一色是女學員，由女同工繆韻春姊妹管理；而鼓嶺的診療所，負責人也是一位姊妹，即周康耀師母周李碧霞醫生。

重溫鼓嶺第一期聚會中幾位姊妹的見證，和倪柝聲對這幾位姊妹的評語，實在使我們對倪弟兄更加敬佩，認識到他屬靈的內涵和份量，不是一般信徒所能達到的。

以下是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二日繆韻春姊妹在鼓嶺所作的見證：

「我是生長在一個非基督徒的家庭裡，從小在非基督徒的學校讀書。我得救是因我在所讀的四福音中，看見主的愛。那時，我所在的學校不准人讀聖經，於是我把聖經一卷卷折成一小本一小本，放在口袋裡，以方便閱讀。有一天我讀到使徒行傳六章四節，經文說：『要專心以祈禱傳道為事』。我就接受這個負擔。當時家裡的人並不同心，有人反對我追求主，但神是我的一切，我不理會那些人的反對。以後我去南京金陵女子神學院讀書，但覺得那裡的一切不合我屬靈的口味，課程中也得不著什麼，我就離開神學院。後來，我到了長老會，在婦女中間作工，有一次我從火車上跌下來，第二天吐了血，背脊骨受了傷。我知道這是主的對付，主不要我因為人情的關係，和環境的需要，而在長老會中工作，所以我就離開，我和李淵如姊妹、汪佩真姊妹從南京到上海後，主安排我在姊妹中服事。一九三四年三月，主使我認識到，我若把自己擺在祂手中，成為祂的器皿，祂能使用我們。我在南宿州與姊妹們聚會禱告二十天后，傳福音給不信的，清楚得救的有三十多人。

「一九三七年七月戰事爆發，倪柝聲弟兄、李淵如姊妹、汪佩真姊妹等從上海遷入內地，我則留在上海，在上海福音書房作文字工作。那時《工作的再思》正在排版，我和林光表弟兄、何越樵弟兄擠在狹窄的華豐印刷廠校對，不論如何辛苦，因一切為著主，我沒有埋怨。只是那時同工們中間有摩擦，功課難學，我就灰心疲倦得不能起來，但因主愛的激勵，就忍耐下去，因此我開始學習接受聖靈的管治，將自己放下。

「一九三八年二月底，神在上海的姊妹們中間動了善工，復興了許多人，許多浪子回到了父親的家裡，起初不過是三兩的姊妹同心合意地祈禱，結果主就施恩，大有聖靈的同在，結果復興的能力，在姊妹們中間擴張，增加了許多小團體的姊妹們的祈禱聚會，主在這些小組聚會中，彰顯了祂的作為。有一次在醫院裡，所有護士、醫生，凡有生命的都在一起禱告，神叫許多啞吧的開了口。

「那次神在上海姊妹中所興起的復興工作，是前所未有的。一九三八年五月，上海在每星期六下午，有婦女傳福音聚會，傳福音的事，完全由上海的姊妹們擔任，並由姊妹們傳信息。而例常的姊妹聚會，仍在星期三進行。或者由於我太過操勞，一九三八年七月初，我得著心臟病，整個人毫無氣力，受了許多苦難，我幾乎是病得預備要死，但我總不懊悔走這條路。前些日子，當教會正在傳交出來的信息，我經過一個禮拜的掙扎，不知道到底要不要交出來。我若不交出來。我知道我就會了了，所以我把我和我的一切都交出來。我現今是沒有什麼難處。我的難處就是我這個己，己肯放下就沒有什麼難處。我不是要作什麼工作，我乃是要活在神的旨意中。」

繆韻春姊妹作完見證，倪柝聲就對她的話給予評語：

「從繆韻春姊妹的見證，我們知道她是一個直爽痛快的人。然而只怕這種的直爽與痛快攙雜在靈裡，

成了一件不容易對付的事。人的長處和特點，在神面前影響非常大；人的長處和特點，應該在靈裡，被靈蓋過去。按實在情形來說，繆韻春姊妹在上海時，曾帶領過上海姊妹們空前的大復興，曾在上海福音書房作文字耕耘的工作，上海教會有一個基本的弱點，就是每個人都作個人的事，彼此配搭得不好，身體沒有供應，工作不合一，沒有權柄，沒有安排，一切的事都是隨環境自然而去。這一次我們在鼓嶺聚會，大家所看見的錯，所蒙的光照，若是徹底，就能叫我們的姊妹省去許多痛苦。對繆姊妹個人的事，我要重複的說，在神面前，個人若不能讓主來碰，我們的靈，是不能爬得更高的。求主祝福我們的姊妹，能在她身上顯出主的作為。」

繆韻春姊妹長得高大，具有領袖的風範和才能。在鼓嶺聚會時，她是禪家的家長，管理的是清一色的女學員，包括倪規箴、劉慧芬、吳佩雪、郭孩真、紀鐘毓等。由於上述這些姊妹都來自上海，常年住在上海的倪柝聲師母，在鼓嶺時，也就不時從倪家到禪家串門，並在生活上彼此照應。

根據蔡蘇娟著的《暗室之后》，記述繆韻春曾是李淵如在南京江蘇女師擔任教務主任時所帶領信主的學生。這項記述大錯特錯。繆韻春生於一八九四年，李淵如同樣生於一八九四年。李淵如同樣生於一八九四年。因繆韻春比李淵如早幾個月出生，故繆韻春稱李淵如為「淵妹」。

本人根據一九三八年三月漢口小董家一巷出版的《敞開的門》第五期發表的繆韻春致李淵如信件，得著證實。該信件寫於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一日，信內這樣說：

「淵妹：妹等打算何時返滬？是否等佩真回來再同行呢？韻大約一時不能他往，於前禮拜三已搬到聚會處樓上住。……」

倪柝聲師母逝世之後，仍在世的海外的鼓嶺第一期女學員，除了我母親，還有柯翠瓊、魏林意天等，這些姊妹們述及倪柝聲，總持著尊敬的態度。而在我所認識的外國女傳教士，包括芮志英（Joy Betteridge）、巴若蘭（Elizabeth Fischbacher）、鐘瑪琍（Mary Jones）、Hilda Holmes、也說倪柝聲弟兄為人聖潔敬虔。我在倫敦時，有一次，我因著某一弟兄的話，靈裡受了傷，跑到貴橡路交通中心的地窖，找到女傳教士 Hilda Holmes。她在上海時就認識倪柝聲。她聽了我的訴苦，就責備我說：「你們中國人天性敏感，倪柝聲在英國也是這樣。」當然我不同意把我的敏感性格歸諸於中國人的民族性；但至少我獲悉一件事，倪柝聲也是很敏感的人，很容易受傷，他自稱如蝸牛一樣，一受碰，就縮回去。他早年在貴橡路時，也像我一樣敏感，一樣容易受傷。

再多談一個姊妹的見證，引述劉慧芬姊妹在鼓嶺的見證，以及倪柝聲對劉姊妹的評語。從倪柝聲的評語，可以讀出倪的內心是如何的高尚和清潔。

一九四八年七月九日，劉慧芬姊妹在鼓嶺作見證說：

「我是一九二四年得救，信主後受父母逼迫。我父親說，我不能繼續住在家裡，因為一家人都因我信主而不安，於是送我去南京金陵女子神學院讀了三年多的書。回來後父親不讓我出去，要我在家佈道。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間，我多數是在家裡。我覺得在家中的時間，可以說是糊塗地過去，不過就是學了一點服在家庭權柄之下的功課。一九三七年初我到上海，在哈同路住了將近一年，與弟兄姊妹有交通。一九三七年底，我學習在交通大學難民所，向來上海庇護的鄉下人傳福音，在難民所我也帶領一個姊妹聚會，人數約四十多人。我讀過慕勒的傳記，對於受引導，信靠神，非常仰慕，但是結合到自己身上，我卻失敗了。我後來裡面有種感覺，最好自己有一個小房子，自己一個人住，什麼都不

管。我長期躲開弟兄姊妹，與他們不夠敞開，不與他們有交通。一九四七年上海教會傳交出來的信息，我也在那時交出來，從此就不敢東跑西跑了。教會定規要去取住在福建福州的海關巷後，我就去了。聽了倪弟兄的交通後，我裡頭得著了供應，好像活起來了。在上海時，人說我是一個不敞開的人，自己知道的就知道，不知道的也不問別人。人說我驕傲，但我就是這樣的人，有什麼話可說呢？」

倪柝聲給劉慧芬姊妹的評語特別多，可說是語重心長。

「一個冷淡下去的人，總是喜歡躲起來，不喜歡接觸人。有的人是靠著外面的人活著，外面的活動仍舊繼續，裡面的人卻是沉下去的。劉姊妹就是這樣，是裡面的人下沉。你的靈沉下去，想要靠著外面的人，就是靠著情感、思想、主意而活，那就不夠維持你。你的靈不夠強，這就是你這些年間，變成這種情形的原因。我們的姊妹只剩下屬靈的知識，而沒有了屬靈的實際；僅有屬靈的知識，但裡頭缺少屬靈的興趣，原因是靈和神沒有了接觸，失去了光，你就覺得黑暗，覺得痛苦，你摸不著神。到了這種地步，你就覺得黑暗，神就要作兩件事。第一，神要人萎下來。第二，神要使你靠著簡單的信心而活。神要我們起首學習相信，安安靜靜的相信，相信神的寶座仍舊在天，主耶穌的名仍是有權柄，神的榮耀超越一切，神的得勝不能推翻，主的復活大能遠超一切，撒但已經徹底失敗等。

「在神的那一邊，一切都沒有改變。在這種信心的生活中，你就會像從墳墓裡逐漸爬出來一樣。約伯經歷了家破人亡，連自己的身體也長了毒瘡，但他仍在約伯記十三章十五節說，神雖殺我，我卻要信靠祂（達秘譯本）。約伯乃是在他自己之外，來信靠神。他只憑事實，不憑經歷和感覺而相信，這樣的信心就是乾淨的信心。本仁·約翰（John Bunyan）說，神若是對，讓天堂來吧！讓地獄來吧！我還是相信神。約伯信神，不看環境，不看遭遇，他所經歷的，是完全的破產，兒女的死亡和身體的毒瘡！這是何等的信心，這是純潔的信心。凡這一類的經歷，不管其度數如何，神所要留給我們的，惟有事實，單單是事實，為要叫我們學習有潔淨的信心。一個人事奉神，只要用一個簡單的信心，信事實就夠了。」上面是倪柝聲在倪師母逝世前十三年對劉慧芬姊妹的勸勉。十三年後，這些話同樣適用於仍在囚禁中的倪柝聲本人，這些話也同樣適用於同走這一條道路的弟兄姊妹們。

倪師母去世一個多月之後，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倪柝聲才從大姨張品琿知道了妻子的噩耗。倪柝聲是如此的悲傷，以致于他覆信給張品琿時，用了「五內俱裂……」及「父母去世我也不曾這樣傷心……」等強烈的感傷的字句。

從此看到，倪柝聲到了年老時，在神的管治下，全然破碎了，他的創傷是這麼明顯，再也無法予以掩飾。他猛然發現，他的妻子是這麼忠貞，她對他一直不棄不離，她一直信任他，直到她撒手人寰時仍不改變！

倪柝聲一生的行為見證是像羊在剪羊毛的人手下無聲，不為自己辯屈。他選擇十字架，願為他的主人拿撒勒人耶穌而受苦受難。

倪柝聲的弟媳倪興祖師母倪徐恩秀這樣說：

「倪弟兄畢生從來沒有為自己辯白過一次，這是所有真正認識他的人——包括那些零星的仍然存留在世的幾位——都能見證的。倪柝聲是一個從不為自己表白的人。倪柝聲一生沒有過著好日子，凡事為他人著想，凡事為他人打算，他所背負的，他所承受的，並非局外人可以明白，舉凡所有接近他的人，都能為他作見證。他是一個實踐信仰的人，他不僅教導十字架的功課，他的確有追求，願意接受十字

架的對付。他從來不為自己打算，即使他受誤會，甚至於他被誣陷，我沒有看過他為自己辯白過一次，這是所有認識倪弟兄的人都可以見證的。」

## 第十九章 全球各地宣教士的見證

倪柝聲非但在中國各地的教會中，贏得許多敬虔愛主的姊妹們的敬愛；就是在與他共處多年的西方女宣教士中，亦受到普遍的讚揚。

首先要引證的，是來自加拿大的女宣教士賴恩喜（Miss Lena Clarke）。賴恩喜早年信主得救後，就遠涉重洋，深入到太平洋彼岸的中國西南部作差傳工作，曾在四川省奉節和萬縣這些偏遠地區傳福音。她在上海接觸了倪柝聲弟兄和李淵如姊妹後，在靈命上得著了很大的幫助。她於是在四川省向神祈求說，希望祂差遣倪柝聲到四川省西部的荒蕪地區，向那些初信的信徒進行培訓，用賴恩喜自己的話：「我曾求神差遣你們中間幾位到那邊去，帶著基督全備的福音信息，和神賜給教會那完全的地位，及十字架的啟示、教會是基督的身體這幾點，好讓四川各地神所救贖的兒女們知道的。」

一九三七年賴恩喜回到加拿大，仍念念不忘倪柝聲弟兄在中國的事工。倪柝聲在此期間與她保持通信，賴恩喜常常把倪柝聲給她的信展示給在加拿大的信徒看。一九三八年四月十四日，賴恩喜致信給李淵如時這樣說：

「我現在於溫哥華（Vancouver）一位信主的朋友家裡住。這裡有許多弟兄姊妹。有一位信主的醫生，讀了倪柝聲弟兄的信，覺得裡面充滿了亮光和生命，必須轉給別的弟兄們看。他們很希奇主在中國信徒心中，作了何等奇妙的工作，並且用他們。何等喜樂！我們同一生命，同一希望。願神祝福你！」

賴恩喜回到加拿大住了兩年，仍一直懷念倪柝聲弟兄在中國所帶來的復興，她渴望能再度回到中國與倪柝聲同工。

一九三九年二月四日，她從溫哥華寫給上海同工的信，吐露了她再度到中國作差傳工作的心願。信中她說：請在主裡的弟兄們面前提起我，因為他們總是在我的禱告中，在我的心裡。我活著仍舊把窗子開向著我所愛的地方——中國，但是我等待神釋放我回到你們那裡。請為我禱告，使我知道祂的旨意。使我不太前，也不落在主的目的和祂的心意之後。

史百克的女婿金彌耳（Angus Kinnear）在《中流砥柱》（Against the Tide）一書中，記述了賴恩喜姊妹于一九四〇年從加拿大重回上海後的見證。

賴恩喜（Lena Clarke）前後在上海聚會了七年，她描述一九四〇年上海聚會的情況：

「每逢主日早晨，一到九時三十分，信徒們安靜地聚集在一起，聆聽所釋放的主的話語。姊妹們坐在一邊，弟兄們坐在另一邊。……這裡十字架的信息，被忠實地傳講出來，包括罪與救恩、基督裡的新生命、神永遠的旨意、信徒的事奉和屬靈的爭戰，都毫無保留地被釋放出來。

「當倪柝聲講道時，會眾如饑如渴地聆聽他所講的每一句話。他穿著深藍色的棉布大衣，站在講臺上。他的單純的、溫和的態度，適當的和切題的比喻，使會眾聚精會神地聆聽。他講道從不用筆記，他記得所有的要點，並能背誦所引的經文。……為了使會眾更加清楚他要說的，他甚至會引述自己切身經歷的見證。在他的聚會中，從來沒有人打瞌睡，從始至終，他的講道從不離題。他經常強調：最重要

的，是所傳講的信息所產生的果效。在聚會結束時，倪柝聲弟兄的信息，在信徒中留下了一個難以磨滅的、深刻的印象。」

接下來我們再聽一位美國女傳教士賴蒂瑪（Elizabeth R. Rademacher）的見證。這位美國女宣教士晚年住在美國加州（California）的亨丁頓灘（Huntington Beach），她的見證最有說服力的，是倪柝聲在上海停止了事奉之後，對外國女宣教士所顯出的關懷以及在靈命上的供應。賴蒂瑪這樣憶述：

「我最後一次見倪柝聲弟兄，距今已逾半個世紀，那時是一九四三年二月，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正與日本交戰，我和幾個西國傳教士其時在上海，被日本人拘禁前一天晚上，倪柝聲弟兄不怕危險，到我們住的地方來，事先沒有通知，那些日子他來看望我們西國宣教士時常都是這樣。我們有了屬天的交通之後，他送給我一小瓶濃縮的維他命補汁，是上海生化藥廠製造的，他接著說，每天服半滴夠了。他對我這個即將被囚禁的小姊妹如此無微不至的關心，令我感動不已。

「我第一次聽到倪柝聲這名字，是在一九三四年那時我對他毫無所知。我推想他是一位白髮蒼蒼的長者，四年後，一九三八年初，當我到哈同路參加擘餅聚會和特別聚會時，才發現他不過三十歲左右，只比我大幾歲。一九三八年倪柝聲弟兄領會時，中心題目是內住的聖靈。從前主離開我們似乎很遠，如今祂在我裡面那麼真實，我從此看見聖靈有兩方面的表顯，一方面是外在的恩賜，一方面是裡面的充滿和運作，使人的生命因著更新和變化。

「倪弟兄就此舉了一個例子，一輛載重的貨車若是輪胎的氣不足，無法承擔重負，發動起來會爆胎，使車輛無法行駛，這使我看到，許多基督徒失敗，叫主的名蒙羞，就是裡面缺少聖靈的充滿。」

「一九三八年二月，在倪弟兄動身前往英國之前，我們在一對西國傳教士夫婦的家裡，共有六個西國教士圍著火爐有交通。倪弟兄用流暢的英語講說國度的事，他強調說：『主需要傳講國度的人』。當時我聽了深受感動，倪弟兄注意到我的反應，就對我說：『姊妹，不要懼怕。』就這樣，主借著他說的話，賜給我能力，我改變成為另一個人。為著主使用這樣一個忠信、謙卑、親切的器皿，我讚美神。」

「一九四二年間，倪柝聲弟兄在上海的職事被停止了，我們對他的動向不是很清楚，但是他對我們的愛心和照顧並未稍減，有一次倪弟兄和他師母來探訪我們，給我們西教士每人一床絲棉被，我們不止是身體覺得溫暖，我們的內心也倍感溫暖。」

「那些日子，他因經營生化藥廠惹來許多閒言閒語，甚至被人們定罪，但是在我們這些西教士面前，他並沒有犯罪感，他的良心是乾淨的，他的動機不是為著自己的發財致富。他親自帶著我們參觀他所經營管理的生化藥廠。在他織帳棚的這段日子，不管別人怎樣批評他，論斷他，我們始終信靠他在屬靈上的帶領。我們怎麼能夠審判他？我們乃是因著他忠信的帶領，才跟從主，才認識主的話語，我們乃是因著他的帶領，才被帶進榮耀的聖潔生活裡。」

此外，我談一下英國女宣教士巴若蘭（Elizabeth Fischbacher）的一些經歷。

巴若蘭出生於蘇格蘭（Scotland），信主後獻身作差傳工作，加入內地會，在山西省的曲沃，與楊紹唐一起撫養山西一帶的教會。

巴若蘭在山西聽到山東省各地教會大復興，就親自到山東，目睹神借著兩位西方傳教士，帶動了山東大復興。這二位神的忠僕，便是來自挪威的女宣教士孟慕真（Marie Mary Monson）和來自美國的女宣教士高珍珠（Miss Mary Crawford）。

內地會的傳記作家賴恩融（Leslie Lyall）把巴若蘭在山東的見聞作了詳盡的敘述：「巴若蘭從山東回到山西後，把親眼所見大復興的情形，一五一十地說出來。她又把自己內心的負擔，也向其它宣教士、教會，以及神學生傾吐，結果有許多人嘗到個人與神，與及個人與其它人彼此之間的和好。大家又有更深切的悔改，並且渴慕被聖靈充滿。靈的釋放使他們在主裡的交通充滿新的喜樂和自由，我們在山西省洪洞縣每星期一次的禱告聚會也有了新的釋放，現代的靈恩運動（Charismatic Movement）已是明顯臨到信徒之中了。」

巴若蘭在山東時，對山東省黃縣華北浸會神學院長柯理培（Charles Culpepper）的印象深刻。柯理培的屬靈度量很大，他在一九三一年下半年，邀請王明道到華北浸會神學院講道。王明道回北京沒有多久，柯理培就於一九三二年春天，請倪柝聲到華北浸會神學院講道。在倪柝聲講道之前，神學院的師生，先有一段時間讚美敬拜神，倪柝聲看到了從前沒有見過的會眾的激情和奔夢，他第一次經歷了靈恩的聚會情形。那一次倪柝聲引的經文是路加福音十五章，說到神的大愛。

在本書第五章，已述及柝倪聲受到弟兄會的影響，與芮文派的弟兄會，怎樣從互相接納到雙方斷絕交通的經過。當一九三五年八月三十一日，芮文派的絕交信寄到上海時，倪柝聲夫婦正在煙臺，因此上海的教會就把信件轉寄到煙臺給倪柝聲。這時候巴若蘭姊妹正在煙臺主領奮興會。

巴若蘭在內地會中，是一位很有恩賜的講員。她的信息，曾幫助了楊紹唐，而這次則幫助了倪柝聲；特別是當倪正被芮文派弟兄會孤立和誤解的時候，借著和巴若蘭姊妹的交通，分享了巴若蘭在山東大復興中的領受和經歷。巴若蘭在聚會時，受感而說方言及唱靈歌，這對倪柝聲來說，是完全新鮮的。無論如何，正如金彌耳在《中流砥柱》中所敘述的：倪柝聲雖然曾經對姊妹講道有保留，但是巴若蘭姊妹的講道，確實有真正的能力，以致倪柝聲被傳講的話語所攝住。這對倪柝聲來說，是一個蒙福的新發現。如今倪柝聲得到了釋放，他講道時的枯乾情況一掃而空，在他致電上海同工時對他們說：「我已經遇見了主。」

在巴若蘭姊妹的影響下，楊紹唐認為倪柝聲的事工，有值得借鑒的地方，所以楊紹唐曾到上海哈同路住了兩年，學習如何培訓教牧同工。楊紹唐曾於一九三四年，在山西侯馬成立靈工團。與巴若蘭同期間在山東大復興中被主重用的，還有畢業于南京金陵神學院的侯秀英；侯秀英後來成為倪柝聲的同工，是鼓嶺同工第二期訓練班的學員。

倪柝聲受到巴若蘭姊妹靈浸經歷的影響，持續了兩年之久，這股靈恩的浪潮，從北方各地的聚會處，一直擴展到南方各地的聚會處，即使在一九三五年底，在福建泉州特別聚會時，倪柝聲的講道內容，仍是基督徒的得勝生活，和聖靈的澆灌。

到了泉州聚會的末期，由於有某些作法過於極端和偏差，由於有些信徒受到邪靈的攻擊，某些作法過於極端和偏差，倪柝聲趕快來個急剎車，而巴若蘭姊妹此時也同意趨向保守，作為一個主曾大用的佈道家，巴若蘭此時竟自動完全放棄了公開的講道。

不久，巴若蘭姊妹覺得是時候回到故鄉蘇格蘭，安靜一段時期。她回到蘇格蘭，進一步拉近了倪柝聲和史百克的關係。

倪柝聲知道史百克這個名字，是通過和受恩姊妹的介紹，先後從《得勝者》（The Overcomer）和《見證報》（A Witness and a Testimony）上讀到史百克的文章。一九三三年中，倪柝聲只是以弟兄會的客人身

份，到貴橡路串門。然而巴若蘭和史百克的關係卻非常直接，巴若蘭和史百克同為蘇格蘭人。史百克是在蘇格蘭的格拉斯哥（Glasgow）街頭聽福音信主的；格拉斯哥的聚會一直是史百克最關切的。而史百克在格拉斯哥聚會的首席負責弟兄一直是巴若蘭的哥哥格利斯·巴（Chris Fischbacher）弟兄。

一九三八年三月五日，倪柝聲留下妻子在香港，前往新加坡，再取道印度前往英國。（倪柝聲師母則於同年七月九日，自行離開香港，前往昆明，與倪柝聲的弟婦倪徐恩秀會合。）

倪柝聲亦於七月初到達英國，時史百克在蘇格蘭的克勒格萊根城堡（Kilcreggan Castle）——這是奧格夫人（Lady Ogle）的別墅。史百克既在蘇格蘭領會，就渴望倪柝聲北上，好讓兩人有更充分時間在主的工上互有分享和交通。那時在史百克身邊的同工，同樣渴望和倪柝聲進一步配搭事奉的，就有巴若蘭——三年前倪柝聲在山東煙臺時的宣教同工。

那次北上蘇格蘭，在倪柝聲一生的事奉中，將有深遠的影響。他在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三日給上海同工的信中這樣寫道：

「在此危急存亡之秋，弟真是何等的渴望能和你們同在一起，一同擔當重擔，但是，主引導我的腳蹤。我此次來歐，並無其它目的，就是覺得神要我來此尋找神的選民，與他們聯絡，一同學習禱告，帶進神的國度，我們真是需要復興，看見當初我們所看見的，並且讓我們的工作，受這個異象的支配。」

倪柝聲到克勒格萊根城堡時，除了會晤了史百克和巴若蘭姊妹，還遇見了德文蘭姊妹（Phyllis Deck）。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倪柝聲與史百克在克勒格萊根城堡一同聚會後，一同前往昆布蘭（Cumberland），參加開西大會（Keswick Convention）。在開西，倪柝聲對一些預備出來事奉的年青同工，談及「主為我們的救恩所完成的工作及主自己成為我們的生命。」倪柝聲從羅馬書直講到以弗所書，信息的內容成為《正常的基督徒生活》這本書的第十和十一章的基調。

《正常的基督徒生活》英文版出版後，再被譯成數十種語言，中文版是由鐘榮蒼弟兄翻譯。這本書在世界各地暢銷，總銷量達數百萬本。《正常的基督徒生活》與倪柝聲的另一本書《人的破碎與靈的出來》，被世界上眾多的教會領袖，視為基督教的經典著作。威廉·彼得遜（William J. Petersen）將之列為「改變二十世紀的一百二十本書籍」之一。

倪柝聲參加開西聚會時，有一個早晨是差傳聚會。適逢內地會的本土主管（Home Director, China Inland Mission）姚如明牧師（W. H. Aldis）擔任主席。姚如明知道倪柝聲來聚會，就請倪柝聲為聚會禱告。倪柝聲猶豫了一下，因為那天的講員來自日本，而日本人正蹂躪中國的土地。倪柝聲想不到來到英國，會和來自日本的講員，一起坐在開西大會的講臺上。倪柝聲於是和史百克商量，但史百克鼓勵他禱告。倪柝聲於是禱告說：

「主啊！你在掌權，我們堅定地相信，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在一切事上掌權，祂是萬有的主，沒有任何事物能動搖祂的權柄，這時來自靈界的邪惡權勢正傾其全力，意圖損害神在中國和日本的權益。故此，我們不為中國禱告，我們不為日本禱告，我們乃為神的兒子在中國和日本的權益禱告。我們不指責任何人，因為他們只是神的仇敵手中的工具。主啊，我們為你的旨意的成全而站住！哦，主啊，粉碎黑暗的權勢，它們迫害你的教會，實際上是在迫害你。阿們。」

那一個早晨，所有參加聚會的人，沒有一個人不被倪柝聲的禱告所感動。許多傳記作家，認為這個禱告，是教會歷史上最偉大的禱告之一。



倪柝聲在開西聚會後，與史百克回到倫敦，落榻于倫敦森林山（Forest Hill）貴橡路（Honor Oak Road）的基督徒交通中心（Christian Fellowship Center）。

倪柝聲在倫敦的那段日子，無論是在早禱聚會，或者是在晚間聚會，倪柝聲不斷向在英國的弟兄姊妹們，介紹福州大復興以及神在中國各地所動的善工的實際情況。倪柝聲毫不掩飾地指出一些英國信徒的屬靈驕傲。另一方面，倪柝聲又在史百克面前虛心受教，承認史百克所釋放的基督是一切的中心的啟示，是新的時代所有信息的中心題目。

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五日，倪柝聲埋首在貴橡路的桌子上，向遠在上海的同工們，概述了他在倫敦的親身感受：「弟在此間工作，頗蒙主祝福，讚美主的名。許多的人盼望，我們從主所受對付而學的真理，能夠寫成英文。我自己也真看見這個需要。英文世界實在是很貧窮，不過如果這不是絕對出乎主，我總不願意動。我們自己受捆綁，乃是工作清潔，及價值屬靈的條件，許多的人在這裡很捧我。但是，我的眼睛只望著主。我拒絕受外面的動而作什麼。我是學習了十字架的人，這些不能使我重看自己一點。人如果知道了什麼是效法祂的死，就怎能在人面前求榮耀呢？但是，另一方面，在這裡主實在是恩待了我，讚美祂的名。

「不過有一件事，我多年來所常覺得的，就是弟兄們的易足。他們實在還有許多的路未走，但是，有的卻以他們所已有的為已足！有許多的乾糧，真是有不得其人而傳之感！這次主施恩使我得以遇到好些（雖然不多）主裡很深的人，述說神更深的事。你知道我從來不勉強作人師傅（這是一個最可惡的態度），都是等人要求。這次亦然，主自己感動人來要求。他們得益，我自己也蘇醒。我總覺得如果要寫書，總得先寫中文，後是英文。但是，在這種情形之下，我還不能說，我知道主的心意。數次匯款，俱係二三兄姊，罄其財產以助。此外，普通熱心的人，對於奉獻，更不如國內，有者須有人要求方肯，這些與我們根本就無分。我們無論多難，總要保守我們在主前所持守的。試煉實在多，但是，我們所信的到底是活的神！在主給我看見，主要我在此所應領受的，已經得著了之後，我即當首途回國。哦，我何等的要求，能不早不遲的行走神的旨意中。因為知道時勢的緊要，更叫我們不敢有自己的意思。同工四散，未能聚首一堂，時覺悵然。但願我們四散，都是行神的旨意。讀《敞開的門》，真是叫人讚美神。但是，我向神的呼求是，少年的同工，能知道十字架如何對付肉體，和天然的生命。」

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五日這封信，駁斥了許多人關於倪柝聲的謠言，即倫敦貴橡路那裡提供巨額款項給倪柝聲。在倪寫這封信前的兩星期，即八月一日，新加坡陸忠信寄到上海的信，也證實了這一點，即倪柝聲並非受到史百克弟兄那裡巨額的津貼，陸忠信的信這樣寫：

「日前倪兄由倫敦來信說，在此國內弟兄受難之我心所掛念的，就是同工供給的問題。……我如果肯像有的人一樣，也可以有許多的收入，但是，我們已經學會了十字架，我們怎敢用肉體的手段來幫助神的信實，來拆散自己的信心呢？但願神施恩給我們。」

前文說過，巴若蘭的哥哥格利·巴是史百克在格拉斯哥的聚會的負責弟兄，透過巴若蘭，史百克對倪弟兄在中國所開拓的事工有了更全面的瞭解。巴若蘭回到英國後，又與丹麥的孫文華姊妹有很密切的書信往來。

孫文華曾在香港聚會過，與巴若蘭一樣，都認識倪柝聲在香港的同工樂非力；孫文華回丹麥之前，就在香港約定，來日與返回英國的巴若蘭保持聯絡。

一九三七年八月，巴若蘭回到英國不久，孫文華姊妹從丹麥到倫敦，與巴若蘭住在一起六個星期，在主裡一起有分享、有交通。在這六個星期內，她們兩人不住地為神在中國的事工禱告。孫文華接著參加了史百克在倫敦貴橡路主領的靈修會。靈修聚會一結束，孫文華、巴若蘭姊妹等又繼續為神在中國的工作再禱告了四星期。那些日子，神給孫文華姊妹一句話，即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二十八節：「一有這些事，你們就當挺身昂首，因為你們得贖的日子近了。」

一九三八年七月，巴若蘭姊妹致信寓居丹麥的孫文華，說神應允她們年前在倫敦的禱告，差派倪柝聲到蘇格蘭的克勒格萊根城堡，與史百克弟兄、巴若蘭姊妹、德文蘭姊妹等同工有交通的時候，遠在丹麥的孫文華，立刻寫一封信到蘇格蘭的克勒格萊根城堡，給其時落榻在城堡的倪柝聲，信件述及，她已經把倪柝聲所著作的《工作的再思》，譯了好幾章成丹麥文，丹麥哥本哈根（Copenhagen）有一位福德基牧師（Pastor Fjord Christensen），讀了之後大得幫助。

福德基牧師、孫文華姊妹、裘更生姊妹們於是在丹麥懇切禱告，禱告後一致認為必須邀請倪柝聲到丹麥。一九三八年十月，倪柝聲在巴若蘭姊妹和德文蘭姊妹的陪同下，經挪威抵達丹麥，在赫爾辛戈國際學校（Helsingor International school）主領特別聚會。倪柝聲在十次的聚會中，說出基督徒的得勝生活才是正常的基督徒生活；而失敗的、退後的生活則是不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信息的經文是羅馬書第五章至第八章。倪柝聲在丹麥所釋放的信息，和在開西時所講述的一脈相承，構成了整本《基督徒的正常生活》。

倪柝聲接著從哥本哈根，前往丹麥另一市鎮奧典斯（Odense），他用以弗所書的鑰字「坐、行、站」，講了一篇感人的講章。根據該講章，後來出版了一本書《坐、行、站》。（編者注：基督徒出版社已出版該書）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當倪柝聲從歐洲大陸回到倫敦後，埋首將《工作的再思》譯為英文。幫助倪柝聲從事翻譯工作的，有巴若蘭姊妹和德文蘭姊妹。一九三九年一月，英文版的《工作的再思》譯成，定名為 Concerning Our Missionary。

到了一九三九年二月中旬，自倪柝聲從歐洲大陸回倫敦之日起，轉眼已有四個月，一方面《工作的再思》英文版，終於告成可以付梓；另一方面，這段日子，他有更多時間和史百克相處，從史百克弟兄身上領受了更多寶貴的屬靈功課。

史百克和倪柝聲弟兄彼此之間對真理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都確定基督是一切的中心，基督既是神的方法，也是神的目的。父神預定基督為萬有的承受者，所有神的旨意和計畫就是基督。所不同的，史百克偏重於宇宙性的教會，認為教會包容了古今中外的教會；而倪柝聲則偏重於教會是地方的，教會在原則上必須本色化——自治、自養、自傳。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七日，倪柝聲從倫敦寫信給上海的同工們——他們對數年前弟兄會的決裂造成的心靈創傷記憶猶新。信的內容如下：

「年來弟的工作，自然是注重于貴橡路（史百克弟兄住處）。雖然另外有其它許多工作，但是在弟看來，貴橡路是最重要的。歐洲情形一如中國。許多工作與工人都不錯，但是多非由啟示而來，而一切根據於傳受者比比也。至於肉體的認識，及天然的拒絕，則一如國內，幾乎成為絕響。貴橡路實為今日歐美見證的中心。有見證，有啟示，識肉體，知天然。至於身體生活的亮光，尤為人間少見。但貴橡路

一如其它地方，需要幫助才能完全。而自命來幫助貴橡路者又這樣的多，叫貴橡路不能不小心提防。年來他們待我實在越于常人。他們自然是一面開著，一面提防著。而我也逐漸將我在主前由恩典所受的，而因環境所隱的分點給他們。同時，你知道我是不自為人師的。許多的地方，我知道神是用以幫助貴橡的，但是我哪裡知道我不會錯？人是何等的容易受自欺的夢想的支配，而以為自己是何等的緊要！所以，我等著，我忍耐地等著。我的心是急於歸來，但是我知道我有工作當作，在二月的聚會，神帶領我們——特別是我與史弟兄二人——看見許多同樣的點。我們兩個見證完全合一了。」

倪柝聲寫完這封信之後三個月，一九三九年五月，就動身返回上海。與倪弟兄一起回到上海的，是在倫敦協助他將《工作的再思》譯成英文的兩位英國女宣教士——巴若蘭和德文蘭。

倪柝聲途經印度時，在印度住了兩星期，在印度曾對七十位宣教士講話。六十二年後，即二〇〇一年一月，住在英國德芬（Devon）養老院的老弟兄弗雷克（Fred Flack）寫信告訴我，他對倪弟兄當時感人的信息，記憶猶新。

倪柝聲回到上海後，在蒲石路友華村七號、十二號、十三號設立了同工招待所，後來更仿照貴橡路的「基督徒交通中心」，稱之為「基督徒交通傳道處」，使上海與倫敦互相呼應，互相印證，雙方建立了一種信仰上的和屬靈上的關係。住在基督徒交通傳道處的，有來自英國的巴若蘭姊妹、德文蘭姊妹、H. M. Holms 姊妹、鐘瑪琳姊妹（Mary Jones），以及來自加拿大的賴恩喜姊妹等。

有了眾多的西方傳教士在上海與倪柝聲同工，在上海的聚會，按立了美國原長老會的傳教士單惠泉（Thornton Stearns）為上海教會的長老，單惠泉曾在山東的齊魯大學擔任醫科教授。

倪柝聲乘船由海路從英國回上海，一路上巴若蘭、德文蘭兩位女宣教士都在身旁，算起來三人在一起同工有一年多，倪柝聲的高尚品格和敬虔聖潔給她們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

倪柝聲一個多月在海路上，虔心靈修，為他到達上海後所帶領的特別聚會，仰望神賜他亮光和話語。

倪柝聲於一九三九年七月抵達上海後，馬上召開了為期十一天的特別聚會，在特別聚會上，倪柝聲弟兄把這些日子在歐洲所領受的，供應給弟兄姊妹，他的信息是這麼豐富，如奔放的川河，同工們大得幫助。他所講的基督的中心和普及，明顯地從史百克的 Centrality and Universality of the Cross 得著啟發。被通知參加這次特別聚會的，人數不多，會後趙奇光、張子潔弟兄分別回到青島、煙臺。倪柝聲弟兄特別留下四位弟兄，與他私下作更密切的交通，這四位弟兄是華世賓、張愚之、劉卑皿和我的父親陳則信。

一九四二年六月，倪柝聲停止在哈同路的聚會，但一直維持著他在上海基督徒交通傳道處的事奉和職事。

倪柝聲從未停息在西方宣教士中間進行培訓工作；贏得了他們的稱許，正如美國女宣教士賴蒂瑪 Elizabeth Rademacher 所見證的：

「在他『織帳棚』這段期間，不管別人的感覺如何，我們卻只信靠並信託他的帶領。」

可惜這段甜蜜相處的日子並不太久。一九四三年三月十六日晚上，倪柝聲夫婦邀請巴若蘭和德文蘭到家裡用便飯，飯後他們一起禱告，一同宣告神是信實的。後來兩位西方宣教士回到住所，發現鑰匙不在身上，原來留在屋子裡。德文蘭於是從屋後的視窗爬進去，在黑暗中，她突然跌倒，中風不治。這位非常有恩賜和聖潔的女同工，就這樣告別人世；她離世時臉上仍然帶著微笑。

翌日，三月十七日，巴若蘭等宣教士被日本人關進龍華集中營去。單惠泉的家人先入集中營，單惠泉因為患了重病，被送入醫院，和家人暫時分開。倪柝聲為了照顧醫院裡的單惠泉和在集中營裡的西方宣教士，變賣了一切有價值的東西，來照顧這些西方宣教士，可見倪柝聲是如何的捨己和仁愛。倪柝聲雖然被誤會，被停止了在哈同路的聚會；但他破除了一切族群的、語言的、膚色的隔閡，在合一上活出了榮耀的見證；多年後，這些西方的宣教士，回到歐美各地，到處述說當年倪柝聲如何捨己為人。十年後，我乘搭輪船，於一九五二年九月底到達倫敦。我本以為芮志英姊妹會來接船——她是與我父母親一起在鼓嶺第一期受培訓的，我初到香港也見過她。沒有想到其時芮志英正在美國，史百克安排了赫利斯(David Harris)來接我。赫利斯告訴我，他自己出生在中國山東，因父親其時在中國當宣教士。赫利斯又告訴我，雖然我見不到在鼓嶺與我父母親同時受訓的芮志英，卻可以見到與倪柝聲長期同工的巴若蘭姊妹和鐘瑪琍姊妹(Miss Mary Jones)。

原來此時巴若蘭姊妹與另一位宣教士鐘瑪琍姊妹住在一起，她們的房子也在丹倫路(Dunoon Road)，正好史百克弟兄的住宅的隔壁。

那時候史百克的大女婿金彌耳正在搜集倪柝聲的生平資料，不時向巴若蘭和我查詢有關倪柝聲的事蹟，巴若蘭曾是倪柝聲的同工，知道的比我多得多。一九五五年，金彌耳隨著史百克到香港，認識了我父親，所搜集的資料也就更加豐富了。到了一九七三年，經過了二十年的千錘百煉，金彌耳終於出版了倪柝聲的傳記(中流砥柱)(Against the Tide)。

一九五二年，我在倫敦時，發現巴若蘭姊妹很懷念中國，平日喜歡吃中國菜。有一次，我自告奮勇，到她家裡準備中國菜給她和鐘瑪琍及赫利斯夫婦吃。我在香港從來不必下廚房，結果那次作晚飯是一次大失敗，根本難以入口，結果五個人大笑一場。

當我平時和巴若蘭交談的時候，這位參與山東大復興的著名佈道家，這位在靈性上幫助過楊紹唐和倪柝聲的姊妹，一提起倪柝聲，總流露出一種肅穆的、敬畏的神情，我從來沒有聽過巴若蘭說倪柝聲一句不是。一九五五年十月，當史百克身在香港和臺北時，曾寫信吩咐巴若蘭和鐘瑪琍來找我，希望我回到貴橡路聚會。可是當時我行蹤飄忽，匿居在漢奧弗路十一號(11, Hanover Park Road)，她們曾會晤過我一次。

事隔十一年後，一九六四年，當我從北京回到香港時，我又與巴若蘭姊妹、鐘瑪琍姊妹重逢。這時候巴若蘭已經在香港服事了八年。她和鐘瑪琍，在一九五六年，當我還在中國大陸的時候，來到香港，兩位姊妹成為我父親最得力的同工。在巴若蘭的一生中，與她在中國同工最久的，竟是我父親，因她與楊紹唐、倪柝聲同工都不過幾年，但和我父親同工卻長達十一年。

一九六四年，我回到香港時，和父母親同住在天文臺道五號聚會所辦公大樓的三樓，而巴若蘭、鐘瑪琍則住在四樓，這時候倪柝聲仍在上海的監獄裡。我們當然懷念倪柝聲，在交談時，巴若蘭不時向我講述，倪柝聲是一個誠實的人。她說，倪柝聲禱告時，是對神訴求，不是禱告給阿們聽，因為我們禱告時，其它人若阿們得大聲，就心裡高興，別人阿們得小聲，我們就心裡不舒服。倪柝聲曾說，許多人的禱告都是在人面前，而不是在神面前的。在人面前的，不能代替在神面前的生活。屬靈的生活，只有在神面前的才算得數，屬靈的東西必須是從裡頭生出來，不能拿無花果放在葡萄樹上。

二〇〇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柯翠瓊姊妹和張寶珠姊妹剛從美國回來不久，住在我家下一層樓。時已八

十三歲的柯老姊妹對我說，希望我陪她到九龍城聯合道基督教墳場去探望巴若蘭和鐘瑪琍的墳地。屈指一算，我是在一九五二年十月，半世紀之前在倫敦認識她們的。原先沒有料到，她們會到香港和我父親同工，更沒有料到，她們這兩位獻身中國差傳工作的西方宣教士，最後竟然長眠在香港。

墓碑上刻著：巴克爾（巴若蘭的別名）（Elizabeth Fischbacher），一八九七年三月三十一日生於蘇格蘭，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於香港逝世。鐘瑪琍（Mary Ann Jones），一九〇〇年七月十五日生於英國威爾斯（Wales），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四日於香港逝世。

那天我到過基督教墳場之後，又與柯翠瓊姊妹談到倪柝聲。此時距倪柝聲逝世已有三十一年了。我說，若不是倪柝聲的安排，我父親不會在一九四九年來香港牧養教會，柯姊妹也不會同船隨我們一家一起到香港。柯姊妹則談及她有幸參加了第一期鼓嶺聚會，又蒙恩參加了第二期鼓嶺聚會。那天與柯翠瓊姊妹談話，最使她喜出望外的，是我把三十三年前她在鼓嶺的見證和倪柝聲弟兄對她的評語影印了一份給她。

柯翠瓊姊妹在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日在鼓嶺的見證如下：

「我是生長於非基督徒的家庭，在非基督教學校讀書，跟著同學老師反對基督。一九三四年十一月我參加了宋尚節在廈門鼓浪嶼英華書院大操場上舉行的露天佈道會，有一晚受感動就信了主。信主後因家人未信，我為他們流淚禱告。一九三七年父親（柯俊德弟兄）在福州因生意的事被判坐牢，母親因父坐牢，心中掛慮而吐血。我也憂愁，時常流淚。一九三八年在安海的一次奮興會裡，我奉獻自己，要事奉主。以後我在福建同安教會聚會，一九三八年受浸。那些日子，在同安服事主的同工們有王燈明、柯憐憫、韓進修、陳秉熙等。我父親關在監牢中六年，也信了主，母親病了二年多後，才去世。感謝主，我父親坐監六年之後，被判無罪得以釋放。我卻因父親破產，母親去世，曆二年之久，我不能禱告。有一天主對我說，要服在神大能的手下。曆有三年之久，我在家安靜度日，始終由於裡頭深受刺激，失去了對福音的負擔，不能向人開口。一九四七年四月間我家遇見強盜，感謝神的恩典，救我脫離了危險，以後倪柝聲弟兄答應我來福州受造就，現今能在山上受訓練，實在是主的憐憫。」

當日，倪柝聲對年僅二十八歲的柯翠瓊的評語很嚴厲，但在五十五年之後，柯姊妹已屆八十三高齡，不至於輕易受傷，我也放心把倪柝聲的評語交給她。倪柝聲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日在鼓嶺對柯翠瓊的評語如下：

「在四福音中，我們看見多人病得醫治，卻沒有得著屬靈的祝福。外面的肉眼是開了，裡面的心眼卻未開。四五千人因吃餅魚，得著物質的飽足，但靈性卻未得飽足。這裡有一個基本原則：人可以遇見許多的事，卻未得著屬靈的祝福。食餅得飽的人，以後可以再吃餅得飽，卻未有任何屬靈的益處，這是大難處。在我們姊妹身上，雖有父、母、強盜等難處，固然有一些屬靈的祝福，但我覺得她所得的光不夠。她雖能感謝神的恩典，但不知道恩典有何等大，雖有痛苦，但不知道痛苦有多麼深，更不知道神的手有多明顯。有的人眼中有帕子，看不見，明知許多事可以感謝，但不知如何感謝。就如一個癱子可以起來行走，他卻只知道那個事實，只摸著病症得醫，並不明白屬靈的益處。人有沒有得著屬靈的益處，都在乎他在所遇見的事上，得了多少光照。

「在各種難處和試煉中，有沒有遇見主的大光照，乃是一切問題的所在。有人經過難處，裡頭真是亮了，真知道主所作的是什麼。另外有的人在所碰見的一切事上，只能見到外面的事實，裡面卻一無所

得。那一天吃餅的五千人，或者回到家中也可以感謝主的同情、主的愛心，所說的也許比吃的餅還多，但卻是只摸著餅的一點外面的事，還未在神面見看見夠大的光，就只看見主是豐富的主，有豐富的供應。在每一個試煉中，都有神的光在那裡照。那些蒙憐憫的人，就能看見；這個光是何等奇妙，能打開我們的心竅，正如天雲密集時，大雷一來就能把天打開一樣；有了神的光照，什麼就都看得清楚了，苦難能叫我們明白我們所不能明白的。

「在約伯的事上，神是否只對付他的兒子們？是否只對付他的房子？是否只對付他的牛羊？我不是說沒有對付這些，我乃是說，神在對付這些事之外，另外有一件事，不是兒女問題，不是房子問題，不是牛羊問題，乃是神有一個深遠的目的，要在約伯自己的身上有所對付。約伯的兒女、房屋、田產、牛羊等，不是神對付的目標；約伯自己才是神對付的目標。你要看見，神對付你的父親時，就是在對付你；神對付你的母親時，也就是在對付你。人看見神對付約伯的兒女、房子、牛羊，那是不夠的，必須在這些之外，看見神另有深層的事要對付，就是對付約伯本人。看見這樣的人就是明亮的。如果今天有一個約伯，在一個聚會中，見證他的屋子有三、四層高，是用紅磚蓋的，以後就有大風來吹倒了。這是因為他的房子太高了。這樣的見證指明他還不明亮，他離開神的對付還是老遠老遠的。我們聽了就會歎口氣，說，約伯，神不是對付你的房子，神乃是對付你。約伯有房子、有兒子、有牛羊、有駱駝，這些需要對付；就算沒有這些，約伯本人也需要對付。神所有的對付，都不是直接地指著那些一件一件事上。人的心思若只是停在這些事上，那是何等的可惜。神乃是要借著父母、家庭、四圍的環境等，要對付你，叫你有所學習。

「主在世上時，在變餅的事上，吃的人只看見餅；在醫好患大痲瘋的人的事上，人只看見大痲瘋；在醫好生來瞎眼的人的事上，人只看見眼睛開了。他們所得的恩典太小了。然而在這裡有一個恩典，是超過能看見的餅，是超過一個醫好的大痲瘋，是超過一個能看見的瞎眼者。若是那些人在醫治、吃餅之外，有更多的得著，那時就不只有十二個門徒了。每一個大的對付，要向著大的方面去看，要向深處去看。在這六年中，你若只在事情上轉，那就太可惜了。神若是憐憫我們，神能用很小的事，來對付我們，向我們說很宏偉的、重大的話。神在物質的事上，能對我們說屬靈的話。在人看牙痛是小事，肺病是大事；但在神來看，醫一個肺病的人，與醫一個牙痛的人是一樣的。許多人在醫治的事上轉不出來，在家庭中、夫妻中、兒女中、錢財中轉不出來。五千人吃餅是什麼意思，四千人吃餅是什麼意思，他們全然不知道；他們只在那些事上專注神的恩典。這個是吃餅的原則。我們若不小心，若只注意四圍試煉的事，也會走吃餅的道路，就是只要吃餅的恩典，而不知賜恩的神。我們要蒙拯救，不光是摸四圍、外面的事，更要看見主要對付我們這個人。在約伯所遭遇的事上，神乃是要對付約伯的自義。

「小的看見會攔阻大的看見；小的祝福會攔阻大的祝福；小的恩典，也會攔阻大的恩典。神給我們對付、試煉時，祂不只要對付我們近旁的事物，祂不只要我們注重試煉本身和試煉四圍的事，祂乃是在這些事以外，有更遠的大事，要我們看見。神是要借著四圍的事，說祂屬靈的大事；大事一解決，小事自然會解決。神乃是要我們仰起頭來，看看我們自己是個怎樣的人。我們一旦看見這個，其它的事就容易解決。有的人受鞭打，只注重鞭打，或許也得著鞭打的益處；但有的人受鞭打，卻能得著大光，看見主要的是什麼。這就是由小的事碰到的大事；事雖小，但那交涉是大的。兒子、屋子、牛

羊，都是小的事，為要成全那大的事。你可以向神禱告，求神指示說，主阿，你對付我更深、更大的事，到底在哪裡？按人看，約伯的兒子死了，房子倒了，牛羊沒有了，這是大事；但神手所指的，所作的，不止是那一件事；人若能看見神所真正要作的，那才是一件大事。

「你可以求神給你光，指示你所要成功的大事是什麼。你一看見就夠了，你要看見神一直所對付的。神用這樣對付，用那樣對付；但神的指頭，都是指著那一件。只要那一件被你看見了，就成功了神的旨意。所以神的對付，沒有一樣是零碎的。你若能看見大的，小的祝福就過去了，不然停在小的那裡，大的祝福反而得不著。若是你所有的對付是零碎的，祝福就會停在零碎的事上。主所要指示你的中心大事，你若沒有看見，而只停在零碎的事上，這反而會成為你的驕傲。約伯的意思是那麼的強，他必須一件一件地受對付，然後才能倒下來說，我從前風聞有你，現在親眼看見你。因此我厭惡自己，在塵土和爐灰中懊悔。(伯四十二5-6) 在你過去的經歷裡，你只看見事情表面的事，至於在事情之外神所要對付的，你卻沒有看見。你要知道，神所對付的事情是超過你所想的。你若摸著這個，你就能幫助人。願主憐憫我們，不一直停留在小事上。小的事就算是對付過五十次，還是有第五十一次要來。如果是那一個基本的、大的，受了對付，那麼就是有五十一次、五百次、一千次要來，也都要被打倒。」柯翠瓊姊妹已經于二〇〇四年初回到她的居留地。柯翠瓊告訴我在美國各地，倪柝聲至今仍受到信徒普遍的愛戴，特別是那些以百萬計的沉默的、不知名的讀者群。

現在補述一下另一位熟識倪柝聲的鐘瑪琍姊妹。正如前文所述，我是在倫敦同時認識巴若蘭和鐘瑪琍的。雖然她們兩人在二次世界大戰時同被日本人關進上海的龍華集中營，但是在述及往事時，鐘瑪琍為人謙遜，總是讓年長的巴若蘭姊妹多發言，然後她再作補充。巴若蘭離世之後，鐘瑪琍就和柯翠瓊姊妹、張寶珠姊妹住在一起，也就是住在我家樓下的一個單位。在這期間，從前在蘇格蘭格拉斯哥（Glasgow）的負責弟兄簡恩（Angus Gunn），曾數度從加拿大到香港探訪過鐘瑪琍姊妹。簡恩弟兄與巴若蘭的哥哥格利斯·巴（Chris Fischbacher）早期同是格拉斯哥教會的負責弟兄，一九五四年我在格拉斯哥時就住在簡恩家裡。

當簡恩、鐘瑪琍和我在香港重逢時，鐘瑪琍姊妹經常憶述倪柝聲弟兄在上海時對一班西國傳教士在患難中的幫助——包括物質上的和屬靈方面的，鐘瑪琍再度印證，倪柝聲在上海的教會中——指哈同路聚會處——因被誤會而停止了事奉，但是倪柝聲在西方的傳教士中，卻一直持續不斷地作培訓工作。倪弟兄為了裝備這些宣教士，俾日後在全球各地進行差傳工作，付出了大量的心血。這與我從其它外國宣教士口中所聽見的相吻合。

倪柝聲的弟婦倪徐恩秀姊妹這樣憶述：「在上海哈同路聚會處不見了倪柝聲的服事之後，上海一些弟兄竟勸喻那些從倪柝聲得著供應的西國宣教士暫緩到哈同路。這些西國宣教士靈裡頓覺非常枯乾，有一天她們不得已去找倪柝聲交通，結果倪弟兄和她們談到了國度的啟示。交通後，幾個西國宣教士大得幫助，喜樂異常。有幾個女宣教士們說，不管倪柝聲開生化是對或是錯，我們知道他靈裡有寶貝，他裡面的亮光是他人所沒有的。於是有許多各地來的弟兄姊妹與倪弟兄有交通。這是倪柝聲在另一個範圍裡，恢復職事的開頭。」

巴若蘭和鐘瑪琍晚年在香港時，服侍她們的就是曾多年服侍倪柝聲弟兄的老姊妹梅官。

梅官從小就當婢女，被倪家從故鄉福州帶到上海。正如前文所述，我母親在上海懷孕，生下我妹妹秀

美時，倪柝聲的姐姐林步基師母曾把梅官讓給我母親作保姆；一九三六年九月，我父親南下廣東汕頭服事主，攜眷離開上海，梅官重回倪家，留在上海作保姆。因為她有主的生命，梅官從倪柝聲的《屬靈的權柄》的信息學習，遵從以弗所書六章五至七節所吩咐的，「你們作僕人的，要懼怕戰兢，用誠實的心聽從你們肉身的主人，好像聽從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事奉，像是討人喜歡的，要像基督的僕人從心裡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事奉，好像服事主，不像服事人。」

倪柝聲夫婦在福州籌備鼓嶺第一期同工培訓班和在福州海關巷繼續鼓嶺第二期的培訓工作時，梅官從上海到福州照料倪柝聲夫婦。一九四九年倪弟兄遷居到九龍鑽石山寄廬時，我看到梅官繼續默默地照料倪弟兄的起居生活。

一九五二年，倪柝聲夫婦先後回到上海，留下梅官在香港。一九五六年巴若蘭和鐘瑪琍從英國到香港服事主，梅官便一直服侍她們，是一位很稱職的保姆。特別是巴若蘭姊妹病危時，梅官不辭勞苦，很有愛心地照料巴若蘭——倪柝聲的老同工。巴若蘭姊妹被主接去之後，梅官繼續服事鐘瑪琍姊妹。鐘瑪琍逝世後，梅官雖已老邁，仍不畏辛苦地，為柯翠瓊、張寶珠打掃房子、到街市買菜、燒飯。

梅官自認，她一生最大的福氣，就是倪家帶領她信主，並為自己能夠在神的忠僕們和婢女們家中服事，有若服事主，使她覺得驕傲和滿足。梅官作見證說，她在這些聖潔的家庭中，從未見過過任何有害身心的書籍刊物，遑淪一些污穢不潔的偶像之類的物品。

二〇〇二年冬天，梅官回到天家，享年九十二歲。梅官有一夙願得以實現，即遺體被運回故鄉福州安葬。她離開福州五十多年，一直留在香港，在事奉神的同工家中盡忠，身後其遺體由柯翠瓊、劉雅琴兩姊妹送回福州。當一些與倪柝聲同走道路的人，在福州接到梅官的遺體後，他們借著安葬聚會，向福州的鄉親們傳福音。梅官一直遺憾，她活著的時候，沒有機會向鄉親們傳福音，她一直希望，在她離世之後，能向家鄉父老和同鄉而傳福音，她的遺願終於實現。這位深愛倪柝聲一家的人，終於能在逝世後為主作美好的見證；倪柝聲的學生兼同工柯翠瓊姊妹則在安葬聚會上印證了梅官生前所見證的。

## 第二十章末後的日子

一九七二年春天，倪柝聲的大姐陳倪閨臣姊妹到新加坡探望她的兒子陳終道。我一遇到她，也尊稱她嫗母，一如我稱呼倪柝聲師母一樣。在一個主日下午，我邀請她到新加坡島嶼俱樂部（Island Club）用午茶，作陪的有陳終道，陳終道著有《我的舅父倪柝聲》。在座的還有從香港到新加坡讀神學的黃漢先弟兄和何偉祺弟兄。我們在談話中，對倪柝聲音信全無，感到不安。正是倪大姐在新加坡期間，收到了倪柝聲從安徽省白茅嶺農場輾轉寄到新加坡的信件。信件原是寄給倪師母的大姐的，內文如下：

品琿大姐：

收到你四月七日的信，知道你沒有收到我通知你每次東西都已收到的信。你信上所提的東西，我都已經收到了，實在感謝你。

我身體情況，你是知道的，是慢性病，是器官病，發病就很難過，就是不發病，病依然在身上，只有發不發之分，沒有好不好之分。夏天到了，多曬些太陽可以改變一點顏色，但不能改變病。但我維持自己的喜樂，請你放心。希望你自己也多保重一點，心中充滿喜樂。



祝你好！

述祖

四月二十二日

信中所說的慢性病，是指心絞痛，倪柝聲的心臟擴大到原來心臟的兩倍，不能拿重物，從這裡看到倪柝聲在二十年的監獄生活中，心絞痛仍然折磨著他，也就是說，他一生中被心絞痛折磨長達四十五年。信中署名述祖，那是他的乳名。

一九七二年五月六日，倪柝聲再度寫信給林張品琿姊妹，信件全文如下：

品琿大姨：

明日是蕙妹逝世半周年之期（五月七日）。這半年來，變化實在太大，回首前塵，展撫遺物，叫我不能不一直心感悲痛。二十年來，不能一次伺候她，總是終身遺憾。一切都是我對她不起，害她困難。我病已纏綿，經常反復。生活我儘量簡單化，以免麻煩人家。病中實在想念自己的親屬，想要和他們一起。但我順服環境安排。十余日來，深思蕙妹不能自己。

你身體如何？時常在掛念之中。年老的人只有多加保重。你還想南邊來不想？我不知道如何說才好。

述祖

五月六日

紙短情長，倪柝聲短短的幾行字，吐露出他對妻子品蕙的真摯的愛，特別是那句「深思蕙妹不能自己」令人擲筆哀感。屬靈偉人倪柝聲晚景的孤苦，實在叫人同聲一歎！接著一九七二年五月十六日倪柝聲又給張品琿寫了一封信。

品琿大姨：

你六日北京的信及十一日上海的信，均已收到。你此次來，望能多住一點時間，多休息一點。我病中也望能與自己的親人多接觸。此間山明水秀，有一特點，小孩長得特別好，比上海以前所看到的都好。望多休息一回。

蕙妹骨灰，的確是個問題，你來後再商量決定。

我沒有什麼特別需要。手電筒帶一個來。

祝你好。

述祖

五月十六日

這封信值得咀嚼的，是那句「小孩長得特別好」倪柝聲在安徽省農改農場所接觸的小孩子，不會很多，局限于幹部的兒女、勞改結束後留場職工的兒女等；但他卻說那裡的小孩子長得特別好，比上海

以前所看到的都好。倪柝聲在上海以前所看到的，包括在文革時侮辱他人格、摧殘他人身的小孩子，固然對他不好；在教會中控訴他的張主懷、許梅驪、周強華、沈榮泉等，對他也不見得太好。另一個可能是，由於他沒有親生的孩子，在臨終前，見到別人的小孩子特別可愛。寫到這裡，筆者想起在這之前二十多年，即一九四九年，當倪柝聲夫婦感觸到膝下猶虛時，突然叫那時仍是小孩子的我，改稱倪師母「嫗母」。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倪柝聲再次寫信給林張品琿姊妹：

品琿大姨：

我和領導談過，關於我的出場問題，他說，「北京上海不能去，要去小的地方、農材。只要有證明來，政府要按政策辦事。不必我……談。」

所以請你代我在親戚中，找可以代為掛鉤的人。可以向其說明，我有生活，希望他能收留我，請公社證明我可到他地方，可收納我。

希望能在親戚中替我找人。馬興濤也是可以商量的一人。請你和他商量，或與別人。

拜六夜裡又發一次，好幾小時的心房顫動。後來吃了地戈辛，人能支持，禮拜睡一整天。我在病中心情極想回到自己親人在一起，落葉歸根。我和大家二十年失了聯繫，只好請你。

你來時帶一斤太倉式肉鬆，一斤牛肉幹。我因心肌梗死，醫生說，不可吃蛋黃、肥肉、各種腑髒，以免加劇。故只好吃點瘦的。不吃，又缺少蛋白質的膠基酸補充。很困難。

祝你好。

述祖

二十二日

信中所說，地戈辛的化學名是尼亞辛（Nicotinic Acid），治心絞痛；因心血管收縮時，缺乏血液供應，引致心胸劇痛，冒出冷汗。在信中，倪柝聲明確地和具體地說出自己的願望，希望儘早回到親人身邊，落葉歸根。信中所說的馬興濤，是倪弟兄侄女倪慧宜的丈夫。在倪柝聲監禁期間，倪慧宜及其丈夫馬興濤照顧過倪師母，此時倪慧宜已逝世。倪柝聲感到時不我待，同一日也致信馬興濤。

興濤侄婿：

我的情況，我想嫗嫗在世之日，一定對你談。你知道我是有大姐寄家用的，所以生活沒有問題。我年老病多，極想到自己的親人那裡去，落葉歸根，可以葬個歸宿之處。我迫切希望，你能替我負責辦妥這件事情。一切方面，全依靠你。

嫗母去世至今六個月半，我五內俱摧，過日為難。我希望你勉力為之，將證件寄到此處。嫗母在日多次提到慧宜及其孩子，不知孩子們現在如何？念念。

聽說到浙江去，糧票有問題。我想，我吃很少，有解決方法，不要緊。

二十多年未通信，常在念中。

祝你好。

述祖白

五月二十二日

倪柝聲在同一日發出兩封信，一封致張品琿，一封給馬興濤，兩封信的主要內容只有一個，想回到親友身邊，落葉歸根，尋個歸宿之處。

這時的倪柝聲並不知道，他在海外贏得了成千上萬信徒的敬愛，各方各族的人因他的著作得著幫助，他的著作已被譯成多國文字，無數人視之為至親的親人。

信中透露，倪大姐陳倪閨臣從香港定期寄家用給他，這些款項上的安排，我父親身為教會負責人，當然知之甚詳。誰能料到，此時的倪柝聲在安徽的深山僻壤中，和外界的通訊閉塞，自感孤立無援，四面楚歌？

三天之後，倪柝聲再寫一封信給張品琿。

品琿大姨：

我將於明早調離楓樹嶺到山下坡農場去。你來的時候不要買票到楓樹嶺，要買票到山下坡下車，比楓樹嶺再退一點點，進去第二站。我曾蒙發一信給你，比這封早，不知收到沒有。望早見面。

祝你好。

述祖

五月二十五日

五月二十六日倪柝聲調到白雲山農場，當天就寫一封信給侄婿馬興濤。

興濤：

我在楓樹嶺時。曾寫給你一信，望你能替我辦到公社的一張證明書，說明你們願意收納我，保證我的生活。（你知道我有大姐寄家用。）你們態度要堅決明朗。……

我於今日從楓樹嶺調至白雲山修養組。望你努力而為，給我一封回信，證明要直接寄給白雲山農場第十四隊，抬頭是由公社寫給安徽廣德縣白茅嶺農場，但是你寄來時要寄到安徽廣德縣白雲山農場第十四隊收。

我極望回到自己親人那裡去。請你努力。

祝你好。

述祖白

五月二十六日

倪柝聲於五月二十六日這一天，從楓樹嶺被調到白雲嶺農場的山下坡。即是說，他從集體的勞改隊，被調到關個人的小號子牢房。

一九七二年五月三十日，倪柝聲親自執筆寫了他一生中最末了的一封家書。照錄如下：

品琿大姨：

我調到山下坡十四隊，這裡離開車站還有十裡路，還要翻一夜山。你來實在不便當。可以不必來了。我病中心仍喜樂，請你不必掛心。我仍盡力促使自己，不要因病痛難過。

品蕙骨灰請你處理，一切都拜託你，我都同意。

紙短情長。祝你好。

述祖白

五月三十日

倪柝聲在五月三十日寫這封信，公安幹部說他在同一天逝世，這封信如何能寄到外界，變成了一個歷史的迷。

讓我們細讀吳磬所寫的《取倪弟兄骨灰的一些見聞》。

「六月一日仍住在上海的品琿姊妹收到白茅嶺農場的電報：『倪徹夫病亡山下坡。』於是我們在上海的三個家人便商量如何去料理後事，確定由我和小玲陪伴品琿姊妹帶著那封電報儘快趕去農場，買了六月三日的長途汽車票，由上海直達安徽省廣德縣。但那天我們三人到達廣德縣時，已是下午一時，午後去白茅嶺農場只有最後一班車，且已客滿，又不知倪弟兄新住處離車站多遠，於是確定我一人先去，小玲陪伴品琿姊妹在廣德縣城找旅館住一宿再去。我就在當天黃昏到達白茅嶺農場總部，隨即步行到山下坡倪弟兄住處，那是一個四面環山的小村莊，房子不多，接待我的人說，他們那裡不接待外人，請我仍回農場總部的招待所去過夜，我只得往返奔波，當夜仍回農場總部招待所，由一位姓陸的管教隊長接待。晚飯後，我問陸隊長有關倪弟兄病故情況，他回答說：『五月三十日上午九時已過，還未見倪徹夫從臥房出來，就推開房門去看他，只見他仍臥床未起，並且奄奄一息，於是叫衛生員來診治，衛生員見他情況嚴重，叫人用車送去農場醫院治療，但醫院的醫生打針用藥搶救無效，終於就在當夜去世。』過一會兒，陸隊長又對我說：『看來他是自殺的，因整理他的床鋪時發現在床單下有一份絕命書。』我追問什麼絕命書？他就拿出確實是倪弟兄的筆跡，很大的字寫在從練習簿上取下的一頁紙上：『基督是神的兒子，為人贖罪而死，三日復活，這是宇宙最大事實。我信基督而死。倪柝聲。』我看完對陸隊長說，這不是絕命書，是他預知自己身體不好，不久人世，但至死他堅信所認識的基督；並對他說，你們農場發的電報不也是說他是病亡的嗎？但這位陸隊長，一點不明白那幾句話的意義，他問為什麼要信基督而死呢？陸隊長另外又對我說：『因天氣炎熱，沒等你們來，已將他火葬了。』我告訴他，另有兩位親屬第二天來。

「次日，小玲陪品琿姊妹來到招待所，我們三人就和陸隊長坐談，陸隊長重複了一些昨晚對我說的話，也給她們看了倪弟兄寫的那幾句話。最後，品琿姊妹問起倪弟兄的遺物。陸說，他的現金是筆極大數目（指存監獄銀行的），已收歸國庫了，又說倪徹夫也沒有什麼直系親屬，同時他也不讓品琿姊妹去倪弟兄房間處理遺物，只是寫了一張紙條，讓我去農場火葬場取骨灰，其實那不是什麼火葬場，而是農場燒窯的地方，平時生產磚塊，兼管火化屍骨。我找到火化倪弟兄遺體的農民，他姓茅，我問他倪徹夫遺體情況；茅回答說：他是安詳過世的遺體，一點沒有反常情況。我故意問他，那像自殺者的屍體

嗎？他說他火化了很多屍體，能認出自殺者的屍體，但倪倣夫他可作證肯定不是自殺的。他說倪的遺體很安詳喜樂、很正常。事實上，倪弟兄是始終信基督而逝世，也是始終維持自己的喜樂而逝世的。」與吳馨一起到山下坡的萬小玲對倪柝聲的逝世提供了另一個補充的版本：

「他的難友吳友琦弟兄告訴我們，當時他的心臟病復發，他們在他垂危時，將他放在一台拖拉機上，拖去四十裡外的農場醫院。這四十裡路是石子路，坎坷不平，被拖拉機載著顛簸，就是身體好的人也受不了，更何況是一個最忌震動的、垂危的心臟病人。在途中倪柝聲就被主接去了。」

萬小玲用動人肺腑的話語總結了倪柝聲的一生：

「公公——倪柝聲——去了，他至死忠心地帶著他血染的冠冕被主接去了。雖然神沒有成就他最後的心願，能活著出來與他妻子團聚，但主卻預備了更好的——他們團聚在主前。『這些人都是存著信心死的，並沒有得著所應許的，卻從遠處望見，且歡喜迎接。』（希伯來書十一13）『所以神被稱為他們的神，並不以為恥；因為祂已經為他們預備了一座城。』（希伯來書十一16）

「他們去了，如同許多的殉道者一樣，是神為祂自己的名呼召出來的一班得勝者，是這個世界所不配有的人。如今他們安息了，但是他們的禱告、他們的果子，卻一直在那裡蒙神悅納，在那裡起著不息的功效，他們的腳蹤也激勵我們更忠心向著主。」

必須指出的是，倪柝聲在一九七二年五月三十日垂危時，在多病纏身時，在離世前數小時，所寫出的最後一封信，其筆跡和一九三九年八月三十日為我父親題字時的筆跡幾乎一樣，雖然隔了三十二年，筆跡依然不變。

倪柝聲留下最後一封信的筆跡，留下了破案的線索，為自己洗刷了一切的罪名，鑒證了《我生活腐化的情況》，絕非其親筆所寫。一員擔任國際刑警長達五十年的資深的科學鑒證專家所下的監識判斷最有說服力，也最具重要性和關鍵性。

由於倪柝聲師母張品蕙堅持和丈夫倪柝聲站在同一個立場上和地位上，堅信倪柝聲是清白的和無辜的。她雖多次受勸服，仍不肯與倪柝聲劃清界線，始終不肯與倪柝聲離婚。為著這樣始終不渝的、忠貞無比的愛，她付出了昂貴的代價。一九六九年，上海市公檢法軍管會根據滬軍審（戴）字第四十三號的決定，以張品蕙「思想反動，利用宗教進行反革命活動」等罪，定她為反革命份子。

從邏輯上說，欲平反倪柝聲，必須也要平反倪師母；反過來說，平反了倪柝聲師母，不啻平反了倪柝聲。從程式上說，預先平反了倪師母，也就為平反倪柝聲創造了條件，同時也為他日平反倪柝聲，在程式上掃除了障礙，鋪平了道路。

正如詩篇九十四篇第一節所說，耶和華啊！你是伸冤的神。果然神垂聽了數不盡的信徒的流淚禱告，在倪師母逝世之後十五年，即一九八六年，上海市正式撤銷上海市公檢法軍管會的決定，予她平反，證明她維護倪柝聲的清白的舉措，是合宜的和無罪的。

上海市公安局既為倪師母平反，實質上已詳細審查倪柝聲的案件，業已發現該冤案的偏差和失實之處，相信有關部門有朝一日會為倪柝聲平反。但是神的僕人只討神的喜悅，並深信耶和華是伸冤的神。